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绥中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编委员会

目 录

前言

- 开辟绥中抗日根据地……………李育民口述
李孟起整理 (1)
- 三年争夺战……………维 新 (11)
- 回忆开辟绥中四区根据地
- 年轻的区委书记祝锡田烈士……………曹玄庆采访整理 (29)
- 怀念祝锡田同志……………高际石 (34)
- 董老英雄……………李孟起、魏福刚采访整理 (38)
- 回忆一九四六年的秋征工作……………周治章 (54)
- 马家大岭痛击保安队……………李绍奎、维 新 (56)
- 保安队败走马家大岭……………王士平供稿
陈瑞麒整理 (59)
- 夜袭黄家……………曹玄庆采访整理 (61)
- 绥中县保安队被歼黄家……………张玉林 (65)
- 太阳山战斗……………王兴朝 (68)
- 李家堡保警队被歼……………维 新、王士平 (72)
- 铁厂堡突围……………张士岐、刘守鑫整理 (77)
- 县支队对敌斗争故事两则……………刘志岐 (80)
- 砬子山战斗……………张玉林 (84)
- 绥中四区人民支前二、三事
……………张士岐、刘守鑫、陈瑞麒整理 (86)
- 绥中地下工作片断……………周治章 (90)
- 地下组织“裕民生”……………魏福刚整理 (94)

绥中土改前的三个运动·····	常文玉 (103)
绥中县的土地改革·····	常文玉 (111)
立木沟修械所概况·····	张士岐、陈瑞麒整理 (122)
绥中县驻四区贸易组·····	维新 (124)
破山洞突围·····	刘守鑫 (127)
旧县级政府组织沿革·····	丁树宣 (130)
国民党军对宝庄乡的掠夺罪行·····	白东海 (133)
苏联红军小分队在绥中·····	常文玉 (136)
克服困难就是胜利	
——记随军赴朝的绥中担架队·····	维新 (142)

更 正

本选编第一辑42页第三
行的“塘沽协定”应为“何
梅协定”。

前 言

《文史资料选编》第五辑在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之际发稿付印了！这一辑共收入二十七篇文章（其中有的在收入时做了删改），内容很丰富，主要记述的是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事件，这些文章从各自不同的侧面记录了绥中地区解放战争的历程和片断。此外也有一些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回忆录。特别需要向读者推荐的是，曾经亲自开辟和建设绥中老根据地的革命老干部李育民、高际石、维新等同志，在百忙中拿起笔来撰述文稿，如实写出了他们从事革命工作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资料珍贵，值得一读。

《文史资料选编》已经出到第五辑了，今后还将继续出版。在这里我们向广大读者和撰稿人呼吁：希望多提意见，多投稿件，如能在大家的支持、指导和帮助下，使得《文史资料选编》内容更充实，编选更得体，那正是我们衷心期望的。

1984年9月30日

开辟绥中抗日根据地

李育民 口述
李孟起 整理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日寇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疯狂的“扫荡”，野蛮的“镇压”。在华北和东北交界的长城内外广大地区推行残酷的“集家并村”政策。敌人把方圆三五十里的山区群众赶进各个大围子（群众称“人圈”）里，妄图分割我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阻止我军东进和北上。

一

为适应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十三地委（冀东区党分委）根据冀热区党委的指示，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间在青龙县靴脚沟成立了临（榆）抚（宁）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工委和行政办事处。工委书记是张化东，办事处主任宋国祥，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张仲三。

当时，工委在青龙成立五个总区（未建制前的临时行政区）总区以下设立突击组。绥中突击组组长是潘凯。

突击组成立后，潘凯就带领一部分人到葫芦套、羊岩子、马尾沟和吕杖子一带活动，了解敌伪的政治、军事、经

济等情况，以便开辟绥中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春，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强新区工作，十三地委决定将临抚凌青绥工委和办事处分别划分为临抚昌（黎）和凌青绥两个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张化东任凌青绥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张仲三任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周鸣岐任工委秘书，信修任民政科长（后来提为办事处主任）。

这年的三月，工委将我调到绥中突击组任组长，潘凯调回五总区任区长。突击组成员有谢云青、董保山、高云侠、赵连城等六、七个同志。

我们突击组来到绥中的黄木杖子、周岭沟和马尾沟一带山区。这里山大沟多，树木茂密，便于和敌人周旋，加上老百姓对于敌人的统治和压迫深恶痛绝，容易发动，就决定开辟这一带山区做为根据地。

七月，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继续向东挺进，开辟明水、塔子沟等地。当时要想绕过敌人据点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必须通过一个海拔七百一十二米高的“五花顶”，这里山峰陡峭，树木参天。我们缺乏经验，迷了路，三天也没转出“五花顶”的东南峰。同志们饿了吃点野菜，渴了喝口泉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摸原路又转回根据地。

八月，我们第二次爬越“五花顶”，接受上次教训，带上向导，准备干粮，顺利地通过了“五花顶”，到了塔子沟。

塔子沟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很适合打游击。这里的群众已被赶到十几里以外的围子里去。房子都被鬼子给烧了，我们就靠墙搭了窝棚，住下来。利用白天群众下地干活的机会，联系了曾广文、李长春等人，发动了群众。曾广文为我们

运送和隐藏粮食，做了很多工作。没菜吃，他把自己地里种的萝卜都给我们留下，一个没往回拿。以后又发展了刘福余，这小伙子爽直，积极肯干，很快就成了我们的得力骨干。塔子沟开辟后，就成为我们的根据地，从外边征集的粮食都送到这里，大部队从关内过来，也常在这里住。

接着我们又到明水的跳石沟和盘龙沟一带，找到伪牌长孙长喜、张殿山和赵殿荣等人。这些人虽然当牌长，但都是敌人给安的，家里很清苦。由于敌人的宣传，起初对我们害怕，要去报告。经过我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他们有了正确的认识，向我们倒开了苦水，再也不愿当牌长这个差事了。经过我们解释和安慰，牌长接着干，这回不是给鬼子干，而是给抗日队伍干，他们都高兴地答应了。跳石沟的赵殿荣积极可靠，我们常在他家落脚。时间久了，亲密得就象一家人一样。他为我们搜集明水敌人据点的情报，他老婆站岗放哨，他弟弟赵殿成在村公所当夫役，我们就叫他负责搜集秋子沟据点的情报。一家人都为抗日出力，任劳任怨。

从这里往北一直发展到大、小黄羊沟、板子沟，接近了建昌地区。往西是大横岭沟、周岭沟、李大庄、陆家台和塔子沟，基本上连成一片，骨干们都积极投入了抗日斗争。一些伪甲长经我们教育，也保证不但不给敌人干事，还要为我们做些工作。突击组到绥中，初步打开了局面。

二

最初绥中突击组只设了个党小组，与青龙五区为一个支部。根据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决定在绥中建立支部。一

一九四三年八月间，突击组在羊岩子沟成立了党支部。信修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决定由我担任支部书记，高云侠任支委。这是党组织在绥中建立的第一个支部。支部建立后，我们首先吸收了刘福余同志为中共党员。

一九四三年十月间，凌、青、绥工委决定在绥中正式建区。建区会议在羊岩子沟召开，工委和办事处的领导信修主任和赵一夫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把绥中划为两个区，一区范围是大横沟、时杖子、明水以西地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是我；二区范围是明水以东到梨树沟门（现属兴城）、新台门、药王庙、和尚房子（现属建昌）等地区，以塔子沟为根据地。区委书记兼区长是郭海楼。

随后，又建立武装工作队，将潘凯由青龙五区调来任副队长。

建区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群众开展反“集家并村”斗争，建立武装自卫队，帮助群众安排好回山后的生活。

与此同时，还要大张旗鼓地向上层分子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争取伪甲长、警察署长和国兵，配合搞反“集家”斗争。对那些有民愤的汉奸走狗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

三

在明水、秋子沟、和尚房子一带新区都有敌人的据点，在这种半公开的地方，我们主要做争取、分化和瓦解敌人的工作，尽量争取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抗日。

和尚房子警察署有个署长，家住大黄羊沟。他父母为人挺好，我们就做他父母的工作，让两位老人去教育儿子。一

次，我们在大黄羊沟北部板子沟一带活动，遇到齐英（凌、建、赤工委书记）等同志，他们从北面边打边撤到这里。我们掩护齐书记，甩掉了尾追他们的敌人，撤到了大黄羊沟。当时齐英同志有病，不能走了，我们就把他暂时安排在那个署长的家里休息，打算把他送往关内根据地。署长的父亲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和通讯员以及齐英的通讯员留下照顾，其他同志分散到小黄羊沟去了。可是不久，那个署长带二、三百人突然回家来了。情况严重，我们在屋里做了战斗准备。老头却过来说：“不要紧，出事我负责”。署长进屋后，他爹把情况跟他一说，让他带人赶快离开这里。那个署长果然就要带着警察走，可是他又折回来，要求和我们见面。我们答应了，对他谈了很多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抗日的一些道理。齐书记水平很高，谈得很透彻，署长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最后他表示：“你们说的话我都记住了，今后有事通知我一声就行。”为防止意外，他赶紧出去带着队伍离开了这里。

后来那个署长确实表现很好。

我们到跳石沟一带活动，常在赵殿荣家住。这里归魏杖子管，甲长是魏殿书。他听到些风声，就警告赵殿荣，不要和八路军来往，再来八路军，一定要报告，并且三番两次地说八路军的坏话。他还经常勒索群众，我们对他进行教育，给他捎了几次信，可是，他以为离明水据点很近，满不在乎，我们决定和他见面。

一天晚上，我带了区小队三十多人出发，办事处的王杰同志也和我们一同去。我放了一班人警戒通明水的路口，防备据点里的敌人出来。

到了他家，我们佯说是县里的特务人员来查户口，他又

点烟又让座地张罗。当他终于知道我们是八路军时，可吓坏了。我们严正警告他，给鬼子当汉奸决没有好下场。他连连点头保证，再也不跟日本人干坏事了。那时，我军曾克林支队要开到这一带活动，须事先筹好粮食。我当时就派给他一个任务，要他给准备五千斤粮食，并且不许向群众多要，从中克扣。他表示保证办到。最后，又让他给我们安排住宿，他也答应了，把我们领到赵殿荣家（其实我们是从那里出来的）。赵殿荣还装着害怕的样子，不肯安排。魏殿书反而安慰赵，说出事他负责。我们这样做，叫拿鸭子上架，逼着他死了当汉奸的心，给抗日做事。

以后，魏殿书果然大有好转，经常给咱们部队弄粮食，还提供据点里的情报，表现很好。我曾到他家去过两次，表扬和鼓励他。以后没啥大事，也没再上他家去。

后来，又有几个伪甲长被我们争取教育过来。他们曾把《告伪军抗日救国书》等抗日救国的宣传品带进秋子沟和明水的据点里。

一九四四年十月间，有两个伪国兵从秋子沟国兵训练团跑了出来，一个叫王成飞，一个叫董英魁，带着两支合子枪向我们投诚。接着又陆续跑出五十余名。看来，宣传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水据点里有个姓李的甲长，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以后，敌人一有行动，在出发前我们就能得到消息。敌人的目标、人数、时间和行动范围，我们都能大致了解，根据情报做出相应的对策。有时，接到情报，敌人出去“扫荡”，据点空虚，我们就趁机到里面开展工作。敌人费尽心机找我们，我们却就藏在它的窝里。

对分化、瓦解和争取敌人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尽量团结更多的人一道抗日。可是对那些民族败类就要坚决打击。

当地民愤最大的莫过于“东霸天”骆长恩了。他经常带着敌人进山“扫荡”，群众从围子里跑出后，纷纷要求除掉他，说不除掉骆长恩，老百姓就没法活。我们请示了上级，办事处主任信修同志很快就来了，批准了处决骆长恩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秋后的一天，我们事先侦察好了情况，晚上出发。参加这次行动的有区小队，民兵，还有信修同志的警卫排。区里去的有我、郭海楼、谢云青和李殿刚等同志。警卫排负责警戒秋子沟据点的敌人。我们夹在进山干活回“人圈”的群众中。

到了围子大门口，天已擦黑了，副甲长黄德贵在守大门。同去的群众撬开了大门，我们一拥而进，先抓住了吓得说不出话的黄德贵，然后直奔甲公所。一看没有骆长恩，却有个叫王品一的警长在那里，就先把他抓了起来。接着又奔黄德贵家里，因为骆长恩和黄德贵老婆有勾搭，估计在那里。到了一看，又没有，里外搜查一遍，也没找到。我们就逼问黄德贵的老婆，才知道他藏在后院的枯井里。我们找到枯井，用电筒一照，这小子正躲在下面。把他拽上来，向他宣布了抗日政府的判决，判处恶霸汉奸骆长恩死刑。警长王品一的民愤也很大，也一同处决了。黄德贵吓筛糠了，但是没有杀他，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并警告他，如果继续当汉奸，就象骆长恩一样下场。他连声表示，一定重新做人。

紧接着，又除掉了“北霸天”王占一。当时群众非常高兴，就编了一个歌谣：“消灭东霸天，除掉北霸天，人心大

畅快，再没鬼门关，除掉两个大坏蛋，百姓才能返家园。”

这样一来，群众更加认识到，要想得活命，就得依靠八路军，依靠共产党。此后，从部落里回到山沟的群众更多了。从无人到有人，沟沟岔岔充满了欢声笑语。

四

从一九四四年秋天起，冀东八路军部队就经常越过长城，到绥中山区一带活动，和敌人作战。

这年秋后，从山海关出来一部分鬼子和讨伐队，要通过葫芦套和羊岩子进山“扫荡”。羊岩子和靳家台之间的山沟狭长弯曲，很适合打伏击。当时曾克林所属的一支部队正在这一带。我们区队和董万功自卫队配合部队打了这次伏击，消灭了几十个鬼子，缴获了三挺机枪。这次战斗打得干净利落，敌人吃了不小的亏，大长了我军的锐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敌人用汽油烧了死尸，狼狈地逃回去了。

一九四五年，形势大有好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为了进一步开辟关外工作，冀东地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在绥中大横岭召开会议，撤销了凌青绥工委，成立了十六地分委和十六专署驻锦热办事处。曾克林任十六地分委书记，张化东任组织部长，信修任办事处主任。

同年六月，十六地分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同志带领一个团，来我区检查工作，在砬子山与日军四百余人展开激战，歼灭敌军数十人。战斗结束，部队开到塔子沟。敌人挨了打，恼羞成怒，纠集了四路兵马进军塔子沟，妄图寻我主力部队报复，然而部队事先转移了。塔子沟和张家房子的

群众坚壁了物资，也随部队上了山。

敌人报复心切，来得异常凶猛。塔子沟的民兵队长李长春等三人，给部队带路回来，发现了鬼子，就藏在窟窿山里。敌人搜山时，他们用仅有的一支步枪、三粒子弹，打死了两个鬼子的尖兵。

区小队刘福余当时去明水筹粮，与敌人遭遇。他开枪打中一个敌人后，也不幸中弹负伤，但他仍然坚持掩护送粮群众。粮食运走了，他却因流血过多晕了过去。在抬回来的途中，又与鬼子遭遇，光荣地牺牲了，抬担架的两人（其中一名是刘福余胞弟）也惨遭杀害。刘福余是党的忠诚战士，为革命牺牲了，我们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助手和亲密的战友。

敌人进塔子沟扑了空，又碰上埋的地雷，炸死了好几个，更加恼怒，又不敢往沟里进，就放火烧了群众的小房子和小棚。撤兵回去经过张家房子时，竟放起大火。顿时全村一片火海，群众的房屋财产，全都被化成灰烬。这次大火烧毁民房四百余间。群众回来，见此惨景，都悲痛极了。然而人们并没有屈服，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敌人的垂死挣扎。

五

八月中旬的一天，信修主任来了，召集各区同志开会，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接着信修又说这是特大的喜讯，我们盼望胜利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是全国军民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的结果。现在我们准备接收城市和伪军据点。

当时，秋子沟有个据点，有五百余名伪军。信修当即写信给伪军杨队长（外号杨大巴掌）要他原地不动，清点好武器和物资，等待接收。不然，我们部队就消灭你们。伪军队长很快回了信，说同意我们接收。次日拂晓，信修带领我和潘凯、郭海楼，还有办事处的几名同志，以及区小队，共去了一百多人。

伪军杨队长见人数不多，想要变卦，我们严厉警告他，逼他交出武器。当时捆好了三十多支步枪，七、八支手枪，派人用牲口驮到盘龙沟去了。其余的武器就架在外面，等待分批运走。当接收时，没有见到伪军副队长。原来这个人听到两个特务报告了我们的情况，就偷偷带领一部分人把机枪架上，在后山向我们开了火。敌人地势优越，火力很猛，我们一面还击，一面撤退，安全地突出重围，可惜很多接收的武器没能全部带出来。突围后，我们又组织反击，敌人却抢先一步逃往和尚房子方向去了。后来在那里被我军消灭。

八月二十九日，苏军进驻绥中城，接收了伪县政府和由各地集中来的伪国兵和讨伐队。三十一日信修代表共产党地方政府进城。我和郭海楼及潘凯同来，接收了伪政府（维持会）。

绥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斗争的伟大胜利。

三年争夺战

——回忆开辟绥中四区根据地

维 新

绥中第四区位于县城西部山区（现在永安乡），在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至一九四八年秋东北地区全部解放的整整三年中间，遭到敌人正规军、地方保安队和地主武装还乡团极为残酷的摧残，经过艰苦的争夺斗争，打退了保安队和还乡团无数次窜扰“扫荡”，才终于巩固发展起来。四区处于辽西走廊咽喉要地，有著名的塔子沟抗日革命根据地。它是我绥中解放区的南大门。四区的巩固与发展关系到整个绥中解放区的安危，同时它还直接威胁着山海关守备之敌，关系到逃亡地主的生死存亡。因此，四区根据地成了敌我双方必争的要地。在这三年间，我多半时间在四区，亲身经历了一些跟敌人争地盘、争群众、争武装的残酷斗争，回忆起来，感到很有介绍出来的必要。

一、争 地 盘

八·一五光复后，在李家堡建立了四区区政府，区长郭海楼同志在北部山区立根台，永安堡两处设立了派出机关——分驻所。工作人员一共不到十人。永安堡负责人是郝中谦助理，一般干部有塔子沟人李森等同志。立根台负责人是

人们所熟悉的抗日干部张福生助理。此外，两处还有一些留用的伪职人员。当时立根台分驻所的主要任务，是督促战勤民工，帮助解放军在山南无名口修筑工事，防范国民党军队从这里出关。不料，国民党十三军于旧历十月间越过九门口、无名口，偷偷地由大茅山口闯进东北来了。我们在立根台的工作人员误认为是自己的军队，毫无准备，等到察觉后想撤离已来不及了。当时张福生等人全部被捕，内中刘文会（马鞍山人）牺牲，还有两人挂了花。我驻李家堡的区政府和绥中其他工作人员因迫于形势，暂时全部撤走。不久，国民党就由山海关向北山派出了它的政权机关。

国民党派人到四区立根台和永安堡两地，各成立了一个警察分驻所，统治有两个月左右。时间虽然不长，但也可看出，他的所作所为与伪满那一套比较起来，竟有过之而无不及。担水劈柴要百姓去干，吃粮吃菜找保里要，按地亩要税，按户要人头捐。他们对吃官司到衙门来的人非打即骂，他们高兴了下乡来玩弄妇女，抽大烟……无所不为。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一九四五年腊月十六日那天早上吃完饭，我到屯中北头去，看见有不少庄里人围着几个背枪的战士，问长论短的。又看到财主曹德会家院内绑着四名立根台分驻所的警察。战士们问我“这几个小子坏不坏？”我误以为他们是国民党派来的人，查出警察干了坏事才绑起来的，就顺口说，“坏透了！不到两个月，闹得怨声载道。”对方说，“这回就好了，够他们受的，非枪毙了不可。”我细一看，不对，这些战士穿的戴的不象国民党军队，倒象八路军。心想别惹事，就赶快躲开了。

八路军在曹德会家吃过饭，就由伪“部落长”曹成发派人下通知，说八路军召开群众大会，在家的人都必须参加。人很快集合到学校。讲话的人是区长郭海楼同志。他说：“乡亲们！我们又回来了，人家说我们八路军跑到北海都喂王八了。没有。那是坏蛋汉奸造谣，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又说：“这群坏蛋被我们抓住了，今天开大会就是听听乡亲和父老们的意见，看该怎样处理。”他讲得激动，气愤，非常鼓舞人心。但是，开会前“会长甲长”都向乡民吩咐过，告戒开会的人谁也不许乱讲话。所以会上只有人听讲，没有人搭腔。开完会全部人马都到北沟去，准备在伪甲长范长富家吃晚饭。这时乡绅们急得象热锅蚂蚁一般，忙着撺掇村民出保，说逮住的这帮人来北山不久，没有做下什么恶事，我们民众敢于担保。郭海楼同志答应：“好说！吃完饭就把他们放了。”乡亲们被稳住了，专等饭后谈判。不料吃饭中间，炼木沟的沟门枪响了。乡绅们惊慌地说，“坏了，出事啦。”其实八路军早就研究好了，只留下警察中的王汉章一人，放回去报信，其余的所长刘清元等三人全部处决。乡亲们见此情景，都溜之大吉了。同一天，永安堡的国民党分驻所所长刘树勋和村长朱济盛，还有余文秀等四人也都被处决了。后来听说这次逮捕镇压是有部队配合的全县统一行动。一下子把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政权机关全部拔掉了。紧接着建立人民政权，组织农会，发动群众支前破交，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敌人是不会甘心放弃北部山区的。常常虚张声势，传言恫吓说，要血洗北山。甚至见到北山人进城，不是扣留，就是要罚款。一九四六年农历七月间，趁青纱帐起，保安队大队

长白光来亲自带两个连，从山海关出发，路经李家堡据点稍事休息后，奔赴北部山区直插永安堡。妄图将我区政府人员一网打尽，扩大他的地盘。白光来叫嚷说：“我们这次来一定要把这小股八路军消灭光，在这里永远住下去，安官设治，这是我们最终目的。”

我四区干部和区小队处境十分困难，必须设法改变它。经区主任李联胜和区长徐士贵等同志向县委请示要求派部队星夜赶到永安堡，打击白光来这股保安部队。县委又转请专署，专署考虑到四区地势险要，得失关系到县和专区安危，当即决定命令所属独立一团和县支队，星夜赶到永安堡屯。部队不畏洪水暴发，不顾生命危险（过河时被冲走两名战士），终于拂晓前到达永安堡屯。经过一小时战斗，保安队支持不住，狼狈溃逃。白光来抛下士卒，扔掉战马，混在士兵当中逃回了他的老巢李家堡据点去了。以后敌人纷纷传说，八路军真是天兵神将。老乡们把白光来败走永安堡的事都当笑料谈。保安队逃回李家堡后，精心修筑工事，盘据不出。我方为了控制北部山区有利地势，于一九四六年底曾用主力部队对李家堡进行围攻。此后保安队在很长时间内不敢进犯解放区，我四区工作人员也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开展工作了。

二、争群众

（一）

自从永安堡、立根台两个国民党据点被拔掉以后，区里工作人员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带。人员是一天比一天多。后来

区长徐士贵和建联主任乔占凤同志活动多在西部，区主任李联胜同志在“边外”以下活动的时间较多，人们对他们也就比较熟悉了。他们下令废除反动的保甲制度，重新建立村政权。村长开始主持村政。但是当时村长多出自富户人家或由上层人物保荐的。即或有些同志是由八路军挑选任命，也多与富户有联系，或暗中通气。

区政权建立以后，乡里群众虽然表现出无比激动，但整个局面仍由富户统治。群众对八路军的认识还很肤浅，过去只知道八路军打鬼子，不怕死。但光复后敌伪一些很糟糕的人一度也混到革命队伍里来，给人们带来很不好的印象。同时反动宣传的影响也很深，什么“八路军是魔鬼，共产党活埋人”，等等瞎话到处哄传，因此对八路军普遍存在害怕心理。还有，人们受正统观念影响，总觉得中央军是正牌的，八路军成不了大事。特别是八路军立的机构被撵走过，此番回来又把国民党分驻所给收拾了，人给崩了，有人认为给老乡惹下了大祸。这些想法不只是上层人士有，就是基本群众也如此，他们畏惧八路军，不怕中央军。

(二)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倒向哪一边是根据地能否巩固与发展的关键。发动群众的过程，据我所知，当时打算利用在塔子沟老根据地站住脚的有利条件，先扎下穷根。将边外扛大活的夏德义，花户庄的赵洪如、曹成有，北沟的田永芝、范久贵，小河口放羊讨饭出身的魏文祥等人，先后集中到塔子沟、张家房子开训练班。让他们回来以后联络穷哥儿们准备进行反霸斗争。最早准备成熟的是边外村。一九四六年五月下

旬，在区主任李联胜等同志亲自帮助下，首先提出人们最痛恨的伪“协和会长”恶霸杨午桥（逃亡在外），公开宣布他的罪恶史，把他的松山没收归边外穷人所有，房产浮物由农会处理。扛大活出身的夏德义，大胆地站了出来扛起反霸斗争大旗，亲自组织农会，吸收会员，同时组织起妇女会，儿童团站岗放哨，抓捕坏蛋。这股反霸烈火越烧越旺，影响越来越大。可是谣传也越来越多。有的说夏德义起来造反了，穷人要翻身啦！有的说不知道这小子长几个脑袋。还有的说那是八路逼着他干的不干不行。外屯也议论纷纷，好多话是地主老财从中挑拨离间点灯拨火。

为了扩大影响，边外于六月间主动到外帮翻。曾到了子沟分了恶霸富农老郭家的东西，没收的东西穷人不敢要，据说由帮翻的人带回来了。这一来谣言更多了。有的说，这回夏德义当了穷人头，分大户，可要发大财了。有的说，咱们各屯也有上班的人（即受过训的人），得早拿主意啊。地主老财们活动非常猖獗，里外串通，说什么，我是一切舍到肚皮外啦，宁给家乡，不给外鬼。有的甚至公开挑拨说，到外村帮翻，就是看我们屯里的上班人软弱可欺。花户庄几位受训的人，有的一回来就穿上了老财送的大新夹袄，也有的人未到家粮食已经送上门了。这时有的公开站出来讲话：不怕，他们不敢来，来了，我们也不是好惹的。有的暗中帮助财主分散财物，有的明着与八路军来往，实际自觉不自觉地做老财的代言人。

为了争取基本群众，区上又从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困难入手，七月间发下一些救济粮。粮食分下来不久，区上工作人员就到各村组织领过救济粮的农户开会。我当时误以为是又

来给救济粮，就找曹成有说，“上次发粮食为什么不给我，这次让我参加吧，不然咱就比比看。”寇助理听了就问原由。曹成有说：“他教过书，当过临时雇员，所以没给他救济粮。”又说，“这孩子家穷，人倒正，让他参加不？”寇说，可以。我就这样第一次参加了穷人会。到会上一听，不是给粮食，是选农会小组长。头一个选曹成祥，他不干。在场的干部批评他一顿。郭三大爷提我的名字说，“他念过书，还老诚。”我怕批评，就勉强答应了。不料八月间，八路军下令，西部各村在小河口开穷人会，小组长一律参加，我只好去。会上没讲多少道理，就是说穷人要想不再受穷，要团结起来，要统一行动；各村屯联合起来，自己动手分掉汉奸恶霸的财产。并提出名单，大甸子有油房老杜家，永安堡有伪村长朱济盛，甲长徐殿生，立根台有甲长叶老三，花户村指定分伪协和会长曹子章。

事到临头怎么办？在北沟、东屯、花户三个屯农会负责人赵洪如、曹成有、田永芝率领下，经过与各屯农会小组长碰头之后，决定召开村民联合大会。到花户庄学校集齐后，赵洪如宣布说：八路军指定我们要分掉汉奸曹子章财产，谁不去也不行，若分给谁的东西不要也不行，我们都要和汉奸恶霸斗。说不几句就喊我：“成忠（我当时名叫曹成忠）兄弟，你来给哥哥把八路军讲的话学说学说。”我刚说几句，我的大舅子王宝昌（中农户）着急了，拉着我的衣襟说：“你可会学个啥，这个头你也出的了吗。”赵洪如一看他不让我说，就对开会的人喊：“谁来再说说。”话音未落，三个屯的地主老财争先恐后地往前挤，有的说我向农会献羊十只，有的说献粮五石，也有的说献猪一口，只有财主田永兰献羊一只，被赵洪如骂了一句，“留你那只羊自己上供去吧。”

献给的东西由村长曹成福一一记了帐。然后去分汉奸曹子章。实际人早已逃亡山海关，家里只剩下些破东烂西，箱箱柜柜、坛坛、罐罐，穷人多少分得一些。经过这次大会，群众舆论大不一样了，穷人由怕八路军变为怕中央军。有的说“八路军不可怕，就怕长不了，万一人家（指国民党）回来怎么办？”对八路军不是怕，而是半信半疑。

（三）

正当各村尝试着进行反霸斗争的时刻，国民党保安大队长白光来带领两个连卷土重来，进攻了永安堡，扫荡了边外村。这一来谣言四起，群众热情被压下去了。老财们许下的羊和其他东西也吹了，各村屯两头怕的人忙起来了。花户庄村长曹成福到处找人查问：分出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分到谁手里去了？暗中记了帐。也有的人暗中把分得的东西给送了回去。这时基本群众从实践中也悟出个道理来：为什么八路军来个统一行动，老财纷纷给穷人献羊献米，为什么保安队一来这些人又趾高气扬起来，粮食、猪羊一字不提了呢？细想想就是两个天，八路军是穷人靠山，穷人的天，中央军是老财的靠山老财的天。人们开始觉悟了，谁远谁近多少能分辨开了。赵洪如曾经向我说，“成忠，你跟哥走，不怕，我身上有一把斧子，中央军来了，一个对一个不是哥的个人。”从此他身不离斧子。有时穷哥们到一起见面时，感情比以前大不一样了，显得特别亲近。

保安队在永安堡立脚未稳，就被我独立团打退了，群众情绪马上得到恢复。区政府工作人员抓紧时机，从发动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入党，送到专区学习。在小学教师中开展

宣传教育，动员贫苦农民子弟参军或参加地方工作，一系列活动开始了，工作大有起色。到了八月以后，除塔子沟，张家房子以外，边外，石匣口，立根台，小河口等村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和小组。九月末，区委动员我到十八地委训练班学习（这是我区受训的第二批）。当时去四个人，除我以外有石匣口曹成先，边外桂世昌，陈云博。开的是党训班。第二天开课，没有领导人作报告，只是由指导员刘冲提问，第一句话就问大家是穷人还是富人。大家都说是穷人。接着又问为什么穷？我心想穷谁还不知道，就是穷呗！由于指导员说话很和气，有的人敢讲话了：“穷是老婆不会过日子过穷的”。有的说“穷人懒！”有的说“穷人坟茔地不好”，等等。指导员都说对。这时大家情绪越来越活跃。到第三天头上，他还问这句话。我们想这个人魔障。再问就没人搭腔了。实际上他正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我们进行深化教育。指导员说：“穷是老婆过穷的，对吧？那么有老婆的人举手。”当时是兴、绥、锦三个县人在一起，一共三十七人，举手的只有三个人。其中有我。刘冲同志反问，大家多数人没有老婆怎么过穷的呢？一想不对，有人就连忙说“是因为懒穷的。”接着往下问你们谁懒？问到谁的头上谁也不承认懒。不是说起早，就是说贪黑，有的说夜间还得给东家起来喂牲口。问到我的头上，我说除了租地种，冬天还上山烧窑，哪敢偷懒。那么为什么穷的呢？指导员指出：穷，是被剥削穷的，想要翻身求解放，就要反对封建剥削，封建压迫，封建文化，封建婚姻……。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就要你死我活地斗争。这么一讲好像把窗户纸捅个大窟窿，啥都清楚了。接着训练班的干事贾素平同志讲

白毛女故事，进行忆苦教育，多数人痛哭流涕地表示要跟共产党走。然后由地委副专员仇友文，宣传部长刘南生等领导人分别给讲了革命形势，党的性质，党员的模范作用和纪律，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等，共讲了四课。虽然训练只十八天，可是我们回来以后大多数都象换了个人，逢人便讲，不知道有多少话要说。积极跑到南北各屯给老乡开会，搞宣传。有人说，八路军好象有股邪劲，怎么上几天学，回来人就变了，象魔障一样，啥也不怕了。就在这个时期，曹成先、陈云博、高祥庆和我，还有立根台西沟王希春，小河口于联祥等同志先后都参加了工作。

区干部除几位抗日的领导外。骨干力量多是关内临榆老二区的人。如陈大谋，武林、严文祥、小温子等人。本地方真正贫苦出身的又有点文化的人参加工作以后，对当地群众影响是很大的。有的说人家都参加了，咱可怕个啥。区上利用这个机会广泛开展扩兵活动。一次区委主任李联胜同志从县里领回来扩兵任务，生怕完不成，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反复作动员，讲清道理，还不敢马上揭开盖子。最后才说出来县里要扩九个兵。同志们非常有把握地说，保证三天之内加倍完成。事实上新同志在老同志帮助下完成这个任务心中有底，各村屯亲朋故旧、乡亲邻里中曾表示愿意参加干革命的就有二十多人。为了扩大兵源，决定召开全区大会，并在边外村中心点搭台演剧。各学校教师也发动起来了，有的参加演出，有的组织比较大一点的学生为讲演队，分家到户宣传，形式多种多样，非常灵活。就连过去唱驴皮影的也动员起来，编几句新词搞扩兵宣传，结果这一次全区上下沟动员出来参军的七、八十人。过完旧历年不久，又接到补充部队的

扩兵任务，又出来一百二十多人。从此各村几乎都有了军属和干属，四区形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基本群众是一边倒了。各村屯农会、村政权也相应地有了改变，多数村都建立了秘密党小组和支部。

为了彻底打倒封建势力，取得经验，一九四七年六月全区力量集中在大甸子村搞“五四”反霸斗争试点，这次不是大轰大嗡，更不是凭一时冲动行事，打击的重点都比较准，政策掌握得稳。区主任李联胜同志、新来的副主任王治同志都亲自带队。各村农会主任多数都抽来编进了反霸斗争试点工作队。按自然屯分成三片（曹家房子、大甸子、蔓芝草），由三个小组分片负责，具体领导。通过串联发现根子（即苦大仇深的穷人），对贫雇农进行忆苦教育，改选农会主任。然后在农会领导下，选择民愤最大的为斗争对象，进行诉苦，做面对面的斗争。大甸子杜长德，曹家房子大绝户（曹成文），蔓芝草的王三祖宗，在群众忆苦控诉、说理斗争面前低头认罪。斗争果实按贫雇农困难情况分等领取。这一来斗倒了恶霸威风，给穷人撑了腰，贫雇农得到实惠。群情非常振奋。当时不只这几个村屯组织比较健全严密，整个解放区如果有生人过往，没有路条是插翅难飞的。北部解放区巩固和发展也震动了敌人，他们极力组织伙会和地方反动武装。七月间，杨午桥带领还乡团匪徒突然袭击了石匣口和边外村。严重考验摆在人们面前，广大贫下中农绝大多数走向斗争，越来越坚定了。为了防范敌人袭击，自动组织起联防，在各个村屯山上高处竖立树标，发现敌情树标放倒。积极分子和党员按既定的分工监视坏人，搞除奸工作，在党委领导下四区基本上形成一体（当时党员是秘密分担工作）。这时谁也不疑

虑八路军长了长不了，而是从上到下一条心，想方设法保护群众，带领大家进行斗争。

(四)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绥中地区也在不断扩大。到一九四七年七、八月以后，老干部相继调出，地方工作基本上由本地干部担任。人员不足，又抽调大批不脱产的骨干力量和一部份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实际上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节节胜利，已进入反攻阶段了，困守在山海关的国民党部队自顾不暇，保安队一刻也不敢外出，龟缩在据点之内。只有一、两小股还乡团不时地到北山来窜扰，群众革命热情并未因此受到影响，斗志始终是旺盛的。

四区当时有十六个党支部和两个小组，村村建立起来农会。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整个土改工作直接由农会出面，在县、区土改工作队帮助下很快打开局面。土地还了家，贫下中农扬眉吐气，地主老财的威风一扫而光，土改后的四区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了。

三、争 武 装

地盘拿下来靠武装，站住脚跟靠群众。但是，区干部能开展工作，又能给群众撑腰，关键在于武装。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从一九四六年春四区建立后，县里调来一个武装小组，由张景春任班长，不久，又发下几支步枪，很快就组织起来区小队，这是地方唯一的武装力量。当时即使有枪在手，子

弹也是极端缺乏的，除几位老同志子弹稍多点，一般的手枪子弹也就三、五发，又多是换泡的（即利用旧弹壳再做成子弹）。大枪子弹只要打出去，再想补充上也是相当困难的，小队直接从敌人手里缴获枪支弹药的机会不多，有时只能从南部地主手中强制索取些。枪是啥牌都有，有三八、七九、九九、套筒，等等；后期又发些康八式、水连珠。为了显示威风，常往子弹袋里装假货，看起来鼓鼓包包，实际上只有十几发真的。但是也有个优越条件，县开设的土地雷兵工厂就在塔子沟，四区不仅领取方便，甚至还能得到照顾。平时区一般干部每人手里都有手榴弹，还有装个小地雷的。村屯民兵多携有大地雷，威力是很大的。四区就靠这些维持地面，保卫群众胜利果实。

地主老财们更知道枪杆子重要，为了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不仅靠中央军、地方保安队，他们还自搞武装。从一九四六年春外逃山海关的时候起，就纠集在一起组成了以杨午桥为首的还乡团，以便伺机“扫荡”解放区。

还乡团不过几十人，看到我们武装有区小队，区干部，又有地雷封锁，加上四、八两个区经常联防，也是相当畏惧的。他们经过长时间探听虚实然后才采取行动。

敌人第一次窜扰过后不久，原四区区小队长王中臣就表现不稳：一是他和前卫方面敌人刚一接火，就带少数人弃队逃跑了；二是保安队在永安溃退时扔下枪枝藏在褚家，王中臣知情却未报告，以致后来被敌人取回。我区委领导了解到他的问题，就由县支队将他调到军分区学习，半年后把他派到五区当区长。他借请假探家之机，从四区立木沟，带着手枪叛变投敌。接着他的亲朋好友原区小队通信员王长越，队员

郑文春等四、五人先后叛变。王从此当上了还乡团中队长。还乡团既增加了人，又深知我方军情，如虎添翼，多次窜扰我解放区，抢劫衣物，赶走边外等村牛、羊和牲畜。杀害我村屯干部多人（解放后王中臣被处决）。

敌人的反扑在一九四七年夏秋期间极为猖狂。王中臣亲自带队，不仅在中部窜扰，还东到背荫嶂，北到张家房子，抓捕我区干部郑光烈、村长张国昌和群众多人。在西部由范久长（伪协和会秘书，花户北沟人，于一九五〇年被镇压）带队，偷越锥山岭围捕群众。捕去花户庄村长曹成福，北沟村长的儿子范久义，还有基本群众叶广安等人带回李家堡。临走时扬言：凡是没收他的东西，如下次来不如数交回，定要杀个鸡犬不留。

为了对付还乡团的窜扰，我方进一步加强防范，村村练习爆破，在要道口搞地雷封锁。区干部和区小队到险要地方打伏击，并抽调大批村干部和积极分子，集中起来组成武工队，有时又分散为工作队（后期为土改工作队），发动群众埋地雷，配合区小队打击敌人。敌人如此猖獗，主要仰仗李家堡据点。它是山海关方面还乡团的养息站，又是庇护所，距我解放区边沿只有二十华里，威胁极大。因此上级下决心要拔掉它。一九四七年旧历八月十六日晚，我野战部队终于一举拿下敌人老巢。两个连只跑掉一个排，打死打伤和被俘的共有二百多人，花户庄被捕去的曹成福等人也被解救出来。在打下李家堡之后，随着形势发展，于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县委决定将四区南部，由松岭子至山海关一带划为六区，以此来保卫四区。同时我县支队也常来四区边沿地区活动，向敌人示威。一次还乡团王中臣又带领三个小队进犯我区。区小队在

山南王凤台与敌人遭遇后，很快甩开了敌人，并派通信员叶永旺飞速向县支队报告，正驻在山北康家房子的两个连县支队，在未接到报告之前已听到了枪声，立即出发，在破山洞南山梁上布置好埋伏。当敌人进入埋伏圈时，下令开枪，吓得还乡团狼奔豕突，鬼哭狼嚎。这次除击毙数名外，还生俘了两人。还乡团中伏惨败，跑到山海关之后，士气大落。这时正是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节节胜利的时候，敌人的保安队、还乡团更不敢轻举妄动，这就形成了一九四七年冬土改时期比较稳定的局面。

土改后，还乡团和逃亡地富分子趁解放区政策发生偏向的机会，又大肆造谣煽动，同时见到人就抓，强迫进城当还乡团，外逃地富及富裕中农有些人主动入伙。还乡团从此又疯狂起来。一九四八年春由原本的一两股竟发展到六、七股之多。其中有王中臣、范久长和张士尧队，还有周兴邦、赵兰峰和徐德贵队，分头窜扰袭击解放区。骆台子西沟的王伯君和北沟中农户范长厚，富农分子范长荣等人极力勾结大横岭沟的还乡团头子王希伶、宋福吉等在四区西部也组织起反动武装。这几股敌人对我四区不断进行反扑，打击革命势力，干部和群众被杀、被抓、被抢、被抄，屡屡遭劫，一年时间内杀害我村屯干部和群众多人。如暖泉子农会主任马明，边外村长杨有祥，治安员赵永玉，群众赵永喜（妇女主任的爱人），耿成祥，永安堡治保组长费成印和党员李树清，骆台子村农会主任王文臣，小河口村支部书记魏文祥，区财粮助理郑光烈等同志都先后被残杀。

当时我方面对敌人残酷屠杀暴行，除进行揭露控诉，加强政策宣传和土改后抓紧赔偿中农纠偏工作外，对敌也进行

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斗争。曾经先后处决了永安堡为敌通风报信的周树伯，北沟村甲长范长富和还乡队的特工人员范久祥，杨午桥的哥哥杨桂林，以及大甸村的外逃甲长，还乡队头目杜怀新，李家堡特务佟振声（外号铜子）等反革命分子十余人。

血的教训一再告戒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加强人民的武装力量。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不仅采用地雷封锁，而且更加频繁地使用伏击战和区与区间的联防。杨午桥的还乡团于一九四八年开始疯狂反扑，在多次袭击四区东部、中部之后，又扬言要扫荡四区西部。夺取乡亲们的牲口（当时西部共有一百多匹大牲畜），用来换枪买炮武装他的队伍。四区区委在县委指示下利用有利地形，于一九四八年四月间在锥山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以往敌人多采取二、三十人的小股活动，这次他们胆大妄为，不仅集中了全部还乡团，还加上山海关国民党驻军一个搜索排和白光来驻防大岭的保安队，一共好几百人，没想到进了四区区小队的伏击圈被打得鬼哭狼嚎仓皇逃窜。战后区小队清扫战场，发现敌人遗下的尸体一具（敌机枪射手张世恩），还拾到七、八百发子弹，几十个手榴弹，都是敌人滚礮子逃命时丢下的。这下子吃了个大亏，光抬回去的就有十七个，还有骑驴回去的二十多个。从此南部敌人很少来解放区窜扰。但王伯君、范长厚的还乡团，于同年夏季在四区西部窜犯非常猖狂，由骆台子向立根台、花户庄一带进犯，甚至到手巾沟、葫芦套的深山住户中搜捕村干部，抓群众，抢夺牛羊。四区曾多次阻击敌人，进行激战。一次在骆台子与还乡团交火，战士杜长庆不幸光荣牺牲了。又一次在立根台南山，两名战士被俘。敌人倚仗武

器优势在西部到处窜扰，反动气焰极为嚣张。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根据县委指示，又与六区进行联防对付敌人。六区小队武器配备整齐，人员精干，战斗力比较强。在队长李绍奎同志直接率领下，不仅跟敌人周旋于南部，还主动来配合四区对付西部之敌。敌人这才稍有收敛。

敌人南北夹击我区，西部靠上中坨据点，南部靠李家堡据点。在李家堡拔掉之后，敌人在李家堡南山的马家大岭上又建起据点，修有工事。盘据有敌保安队一个营。大岭敌人的存在，直接对四、六两区构成威胁。一次，我六区队在铁厂堡不幸被包围，二班长王伯山、战士王德本当场牺牲，通信员王宝会被烧死在柴火堆里。由于敌人张牙舞爪，我方也下定了斩断魔爪的决心。一九四八年六月间，由蒙汉联军一举把它拔掉，六区工作这才得以取得新的进展。至于四区的武装斗争，持续时间最长，直到全东北解放，大军进了关，几股残匪先后在石门寨、上中坨缴械投降。逃往岳山沟躲藏起来的还乡团头目、立根台村西沟的王永庆等人，经区上多次去信宣传政策后，才向区政府束手投降，四区内外这才开始安定，群众才放了心。以后经过镇反、肃反，除杨午桥逃脱在外，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一一逮捕归案，得到应有的惩处。后患既除，人民安享太平。

回忆起来，开辟四区根据地的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是与敌人你死我活拼搏争夺的三年，是在县委、区委直接领导下争地盘，争群众，争武装，步步前进的三年。四区地盘所以能争夺过来，而且得到巩固和发展，归根到底，应归功于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和解放军与地方武装的英勇战斗。为了争夺和保卫四区革命根据地，地方同志牺牲不下二、三十

人，地方兵团打永安堡，过河时一次牺牲两人，野战部队最后打李家堡就牺牲二十多人。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被解放出来的土地上搞建设时，既要看到现在，更要想到过去。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不应忘记过去，要继承先烈遗志，踏着他们的血迹，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先烈们解放出来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灿烂辉煌。同志们继续前进吧！

写回忆录有感

游击征战整三年
多半行动在其间
先烈先驱求解放
往事过去几十年
愿为四化献余力
不枉虚度录三篇
拙文虽劣铭青史
留给万千后生看

一九八四年四月

年轻的区委书记祝锡田烈士

曹玄庆采访整理

清明时节，我们瞻仰绥中县的烈士陵园时，在《烈士英名录》中，发现有绥中县一区区委书记祝锡田同志，他为绥中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出于敬仰之心，访问了几位知情的老人，现将祝锡田烈士的事迹叙述如下。

祝锡田，河北省安平县北黄城人。家里有父亲、母亲和三个姐姐。他的父亲、大姐和三姐都是共产党员。他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堡垒户。地下党、武工队经常在他家接头、开会，祝锡田从小就受到革命的熏陶。

祝锡田十岁上学，日寇在他家乡实行“三光”政策，经常进行疯狂扫荡，从反面“教育”了祝锡田，在他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在当儿童团长时，就跟着武工队去端敌人的炮楼。一天深夜，他拿回家来一块红布，一把老虎钳子，对妈妈和姐姐说：“这是胜利品，端敌人炮楼得来的，武工队队长给我做纪念的。”

一九四三年，祝锡田高小毕业，第二年他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做区武委会干事，一九四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才十八岁。

抗日战争胜利前不久，形势发展迅速，祝锡田主动申请到东北来做开辟工作，当时他的小女儿降生还不到六个月。他

趁清明节母亲去上坟的机会离开了家。临走时对三姐说：

“根据革命的需要，我可能去东北，你们不要担心，请姐姐以后转告母亲，做儿的不能尽孝了。”又对妻子说：“你要替我在父母跟前尽孝，好好教养小恋……。”

一九四六年二月，祝锡田同志随王哲等人来到绥中西北山区开辟工作。先任二区宣传委员，后任组织委员，教育助理。他每到一地，总是先到老实厚道的穷苦农民家里，秘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员，建立联络点。他到葛家乡，首先在小西台刘永权家建立了联络点。第一个被接收入党的是刘永权的老伴刘邢氏；第一个交通员是广裕店贫农李树周。

祝锡田始终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劳动，一起吃饭，平易近人，作风踏实，加上出众的讲演艺术，深受广大穷苦农民的欢迎。革命道理讲的深入人心。一九四六年他先后在葛家一带秘密建立起十个党支部。这一带老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几乎都是祝锡田。

一九四七年祝锡田担任一区区委书记，他经常在秀水沟、帽合沟一带工作，废寝忘食地宣传《土地法大纲》，建立农会，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他对革命工作积极认真，对干部群众热情关切，他的群众关系特别好。岔沟李宝山的母亲经常受到祝锡田的亲切关怀，她也就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有好饭给他吃，有重活也叫他做。有一天在杨树沟开会，见一个刁树沟的村干部，到了三九天还穿着破衣服，冻得直哆嗦，仍坚持听会。祝锡田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袄给他穿上，那个干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上级机关按照供给制标准发给祝锡田的鞋袜和衣服，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节

省下来，见到哪个农民兄弟没有，就悄悄地给送去。感情诚恳真挚，被帮助的人不由得不含着热泪收下。对于军属和参加担架队人员的家属，更是照顾周到，使他们完全感觉不到亲人离家后家里有什么困难。除此以外，他还特别关怀同志们的学习和进步。区干部李宝山在他领导下工作，由于从小家贫没念多少书，记笔记写汇报材料错别字特别多。祝锡田每次看到，都要认真地逐一给改过来，而且写得秀丽工整，让人易认易学。祝锡田同志原则性很强，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志谁要是违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处理的严肃认真，毫不徇情。

一九四八年农历七月初，区财粮助理韩祥，同区干部陈士恩到松棚沟去，因为村财粮姬××拖欠三百斤公粮，就把他暴打一顿。祝锡田得知这一情况，和李宝山分别找这两个人做工作，让他俩做深刻检查。他二人坚持错误，不接受批评。祝锡田立即下令下了他两人的枪，停职检查。直到他们写出了检讨，承认错误，才把枪还给他们。

但是，韩祥的思想起了变化。

七月中旬，韩祥到绥中县城找到同乡还乡队副队长郭维同，投了敌，并且向郭维同报告了我一区交通员赴东洼子县政府经常取道平台子南沟的秘密。

七月二十六日，郭维同率还乡队约三十人，到平台子南沟的松树坟设伏。这里小路弯曲，沟壑狭窄，上有松树成林，下有青纱帐起，设下伏兵，外边很难察觉。这一天，我交通员一人走到这里遇伏，但他机警地走脱了。

二十七日郭维同继续在平台南沟下卡子，在老谢东山留下韩祥一人，并在松树坟、西山、南山和河套边高粮地全伏

下了兵。

一区区委书记祝锡田和区长高际石，率领一行八人，要去县人民政府开战备会议。二十六日晚住在西边，二十七日早晨在蒋宝如家吃的饭。因为不知道头一天交通员被截的事，还是照以前去东洼子的路线走。同来的军区三位同志和区长、区委副书记走在前面，祝锡田带着刘国信、何永生走的稍后一点，八点多钟，来到了平台子河套，还乡队伏兵当即开了枪，同志们立即分散突围脱险，可是祝锡田同志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不幸大腿负伤。何永生同志要给包扎，他说：“不用管我，你们俩赶快突围。”

祝锡田同志已感到形势的严重，及至看见战友们都脱险了，自己也就放心了。他认为我已身负重伤，看来凶多吉少。个人牺牲是小事，决不能让敌人得到一点党的机密情况。他一面挣扎着挪往山坡坝墙边上隐蔽，一面撕毁随身携带的所有文件，他倚托着坝墙子，抽出自己的手枪，准备与敌人做最后的搏斗。还乡队匪徒毛庆祥凶狠地跑上来，口喊：“快交枪！”回答他的却是“叭、叭”两枪。由于伤势过重，射击不准，匪徒侥幸不死。可匪徒毛庆祥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祝锡田同志的生命。毛庆祥在这儿欠下了人民一笔血债。祝锡田这位人民哺育出来的好干部，党培养教育的好战士光荣地牺牲了，年仅二十一岁。

一九四九年秋，全国解放之后，祝锡田烈士的父亲、妻子和两个遗孤从河北老家来绥中起灵。一区在东西岔沟开了追悼大会，方圆几十里偏远山村的群众纷纷赶来参加。参加追悼会的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都为失去一位好同志而万分悲痛。

祝锡田烈士永垂不朽！他将永远活在绥中县人民的心中！

1983年4月

• 据李宝山、刘广余、郭维满以及韩祥等人口述整理

怀念祝锡田同志

高际石

我于一九四八年三月调到绥中县一区工作，祝锡田同志是区委书记，我和他一起工作近半年时间。他年轻有为，政策水平高，工作方法稳妥，生活艰苦朴素，对待同志热情，对敌斗争机智勇敢。祝锡田同志是一位好同志，是一区的好书记，也是我的好战友。回忆起来，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一

我到一区后，手枪子弹很少，锡田同志也不多，可他还是送给我一些，在当时真是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感情，超过了古人所说的“雪中送炭”。后来，他从部队换了一支二十响快慢机，因为我经常在白羊沟、土头山、黑水河一带前线活动，他又主动将这支手枪让给我佩带。后来我有一次在炉砢沟遇到了特务，他们误以为碰上了部队的侦察员，没敢打一枪就悄悄地溜走了。

棒槌沟贸易公司小组和税务所是个固定点，还乡团对它垂涎三尺，时刻都想去抢掠。在这种情况下，区里应该支援棒槌沟民兵一些武器。锡田同志说服了持有不同意见的同

志，统一了思想，从区里抽出步枪五支和一分子子弹发给了民兵，这对后来在棒槌沟抗击还乡团、保卫贸易小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

一九四七年，由于敌人封锁，解放区物资短缺，这年夏天，每人只发一套夏装。当地干部由家里补充一点换洗的衣服，可是锡田同志是外地人，他就不具备这个条件了。有些同志想帮助一两件，他又拒不接受，表示决心带头克服困难。夏季天气炎热，汗水多，衣服易脏，没有换洗的衣服，锡田同志的办法是，利用中午时间到河里洗澡，先把衣服洗好、晒好，然后洗澡，洗完澡，衣服也就晾干了。他还乐观而又风趣地说：“这个办法一举两得，既清洁了身体，又干净了衣服，是两全其美的好经验啊！”

锡田同志严格遵守财经制度，不侵犯群众利益，在这方面他是一丝不苟的。一次，区里干部和武工队集中学习，他们要求改善生活，因为没有钱，我很为难。说也凑巧，恰在这时抓住两个布贩子，经我擅自决定罚了一些钱(小米)，买了一口猪。事后锡田同志找我个别谈话，说明这样作不妥。他严肃指出，用缉私提成费改善生活是可以的，但全部占用是错误的。开始我还认为未动用公粮不算原则问题，后来认识到不符合缉私规定，违背财经制度。因此，我作了检讨。

三

一九四八年，绥中一区环境比较残酷，不仅经常遇到当地朱德武、赵海瑞、郭维刚等小股还乡团的骚扰破坏，而且有时还遇到建昌县的“田、阚、赵、姚”等几大股还乡团的“借道”袭击。在这种形势下，区、村干部的思想都有些波动，也比较混乱。有的人还散布过本地区不能坚持的悲观论调。锡田同志对上述动向十分重视，首先在村干部中进行调查，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在区干部中做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一次在讨论形势时，他对一位同志提出的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口号十分赞赏，经常用这句名言鼓舞和教育干部。他在区委会上，以及和区委同志个别谈话时都讲过：“共产党员决不能当俘虏，必要时要与敌人同归于尽”。由此可见，锡田同志在突围负伤后，以身殉职不是偶然的。

四

八月下旬，县委召开区干部扩大会议，总结土改工作经验，部署武装保卫秋收以及战备工作。我们去开会的一行人（其中区干部四人，部队干部三人，另有县支队开小差的战士一人），早饭后，在祝锡田同志率领下，由西边村出发，当走到平台子南沟一块无名小盆地时，遇到了还乡团。从当时情况判断，我们已经进入了埋伏圈。后边有敌人，东山上也有敌人。枪声、喊声连成一片。我们当即进入路西一

块高粱地。因为是白天，不同于夜里或拂晓，来不及研究，便仓促突围。我和刘国信同志等五人，直奔沟里方向，虽然东山上敌人不断打枪，但因为没有机枪，威胁不大，加之迎面没有敌人，因而顺利地跑出了还乡团的包围。祝锡田同志在向沟外突围时，误入敌网，身负重伤后，撕毁了随身带的文件，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二十一岁。

1984年4月14日

董老英雄*

李孟起
魏福刚 采访整理

董老英雄——董万功，辽宁省绥中县加碑岩乡黄木杖子村周岭沟人，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日，农民出身，中农成份。黄木杖子位于绥中西部一百多里的山区，与河北省青龙、抚宁毗连，是三县交界之地，那里山高岭峻，奇峰怪石，树木参天，交通闭塞，形势险要。相传古时山上盛产黄木，不知哪朝皇帝看中了，降旨下来：这一带的黄木专归御用。后来因为山大沟深，道路难修，黄木运载不出，皇帝又降旨放火烧毁满山黄木。董家世代居住在这样的深山老峪之中，靠辛勤耕种过日子。董万功幼时曾念过一年多书，能看懂简单书信。抗日战争时期，他四十多岁，已成十口之家（四子四女、老伴），男耕女织，还养了数十只羊和两匹骡子。但这种靠辛勤节俭维持一家温饱的生活，由于日寇的侵略而遭到了破坏。董万功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一面躲避敌人的“讨伐”，一面偷空耕作、放牧。

一九四二年，日寇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用种种手段压缩我根据地。我党则针锋相对，积极恢复和开辟长城以外的热、辽地区。凌青绥工委派遣了突击组，开辟和建立绥中抗日游击根据地。

日寇采取极野蛮残酷的手段，从滦平沿长城往东七百余里，直至辽西绥中的山区一带，疯狂推行“集家并村”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切断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妄想让八路军在这一带站不住脚。

死也不进“人圈”

一九四三年三月间，日寇开始在绥中西部山区一带“集家并村”，敌人放火烧毁民房，逼迫村民全部迁到“围子”（日寇称部落）里去居住，当时这一带并成十几个大围子，周岭沟被并到三十里外的东稍树围子。

围子里集中着三、四百户人家，鬼子、警察用刺刀逼迫村民昼夜修建围墙和岗楼。深夜里人们就挤在几根木头搭起的马架棚里，寒风袭来，冻得无法入睡，妇女儿童嚎啕大哭，老人唉声叹息。高山深谷，悲声切切，令人战栗。一听钟响，男女老少又被逼着集合，男人拿着棍棒爬上围墙，妇女儿童则被勒令敲着铜盆呐喊。敌人说这是“防空演习”，实质是分离我军和群众的险恶手段。太阳升起老高时，人们才被放出去几十里外的地里干活。太阳还没落山，敌人就命令关上围子的大门，回来稍晚的就被关在外面，群众气愤地把围子叫做“人圈”。伪甲长骆长恩还假惺惺地欺骗群众说，“八路军是青脸红发的妖精，见人就活埋。日本皇军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才叫你们到围子里来住的”。他又恶狠狠地威胁说：“谁不进围子就是私通八路，就是死罪！”

董万功却不相信这些鬼话，他知道骆长恩是个什么东西：这个认贼作父的汉奸平时欺压百姓，敲诈勒索，霸占妇女，无恶不做。人称“东霸天”。他还把一些乡亲（包括董万

功的大儿子董长锁) 抓去密山当劳工。董万功耿直倔强，嫉恶如仇，对骆长恩深恶痛绝。他看透了鬼子“集家”的鬼把戏。决心不进“人圈”。他联系了董长贵(本家侄)，两家十几口人住在山里。房子烧了，剩下两堵墙，他用几根木头就着残墙断壁搭起个小棚子，又升起了炊烟。白天，他站在山上放羊，监视着山下小路是否有敌人进山。抽空还在山上刨几镐，种点粮食。董万功平时为人正直，心肠很热，乡亲们有了为难事，他都尽量帮助，因此他在这一带乡亲们的心目中威望很高，在他的影响下，附近每一条沟里都有不进围子，坚持住在山里的人家。

“讨伐队”时常来搜山，董万功带着一家人绕山躲藏。有从围子出来进山干活的人，见他过得很艰苦，就劝他说，“还是进围子里去吧，这有多难，再说，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你。”董万功却说：我没法在日本人的刺刀底下呆！小鬼子不走不下山。”

董万功心里有数，小鬼子闹不常，他听说关里有专门和鬼子做对的八路军，他朦胧地感到了希望，盼望着八路军早日到来。

一九四三年春有一天，董万功正在山里干活，忽听呼唤，“老大爷，老大爷！”声音是那样亲切。董万功抬头一看，几个陌生人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个个便衣，腰插短枪，脸上挂着笑容。董万功看了一眼，又埋头干活，没有吭声。来人相互对视一笑，为首的一人上前说：“董大爷，您种地啦！”董万功用鼻子哼了一声，“哼，这年头还能种地！”那人说：“不种地吃啥呀？”董万功又狠狠地刨了一镐，说：“今天鬼子来，明天‘东霸天’来，还种地呢，等着饿死

吧！”说完，他扛起镐就走了。来人见他这样倔，都笑了，随后也跟着到了他家。

原来，这几个人就是凌青绥工委派来开辟绥中地区的突击组成员，为首的那人就是组长李育民。他们是来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反“集家”斗争的。他们已经了解到这一带的情况。知道董万功最痛恨鬼子和伪甲长，是这一带坚持不进围子群众中最有骨气，最有威望的一个。做好他的工作，是发动好群众的关键，所以，今天特地来找他，可是初次相见竟是这样尴尬。突击组的同志们并没有灰心，他们主动帮助董万功干活把地种上，遇有情况。同志们把羊给他赶到山上藏起来。看到同志们这样和蔼可亲，他露出了笑容，他明白了，这是日夜盼望的八路军到了。

突击组的同志向他们一家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道理；揭露了鬼子搞“集家”的阴谋，并说：“我们这次就是开辟抗日根据地来了，不打败鬼子，我们绝不离开这里。”董万功听了之后很受教育，他在亲人面前控诉了鬼子和“东霸天”的罪行，叙述了乡亲们的遭遇。他坚决表示：“只要你们不走，我老头死也不下山，和你们一起干。不但我不走，也不让群众走。这一带由我来负责动员！”他不辞辛苦，四处奔走，联系了水泉沟、羊岩子和周岭沟一带没走的群众。这样一来，群众齐了心，谁也不进围子。遇有情况，突击组马上通知大家上山，敌人走了，再下地干活。在突击组的帮助下，几天就铲了一遍地，群众的情绪起来了。董万功的老伴董大娘和同志们开玩笑说：“你们这些青脸红发的妖精还给老百姓干活，真是好妖精。”

随后，董万功为开辟李大庄、陆家台等地做了很多联络

工作。

流动联络站、后勤部

董万功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熟悉这一带的每一条小路和河流。突击组的同志外出工作，他经常主动给带路。上级来信，突击组人不在时，不管是白天黑夜，他都及时给转送到同志手里，同志们分头出去活动，都是回到他的家里碰头。董万功家成了八路军的联络站。

每逢突击组出外活动时间较长，一回到董万功家，大伙就高兴地说：“到家了。”董万功就赶快告诉老伴，做干饭，他们跑了好几天，都饿坏了。吃饭时又告诉同志们“多吃点”。同志们也不见外，象在自己家里一样，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同志们经常钻山林，衣服刮破了，董大娘就让脱下来洗净后又一针针地缝补好。看到同志们劳累辛苦，面目消瘦，董万功很心疼，就隔三差五地给同志们吃烤羊肉，补身子。后来凌青绥办事处主任信修同志来到他家，动员他挑几只羊慰劳部队，他高兴地给挑了十多只肥羊赶去了。

这样一来，风声就大了，董万功不但不进围子，还接待八路军，鬼子异常恼怒，便兵分三路进山“讨伐”。这时，突击组的同志正在董万功家。董万功家的二儿子董长斌和组员赵连成在山梁上放哨，他们发现敌人，连忙发出信号，同志们帮助董万功连人带东西搬上了山，又赶紧把羊往山上赶，可是羊一时受惊不肯上山，老往家跑，圈也圈不住，敌人快追到跟前了，机枪也打响了，人们只好放弃四处奔跑的羊，撤到山上隐蔽起来，人保住了，而五十余只羊却被敌人

虏走了。

敌人走后，人们回来一看，搭的小房子烧了，锅也砸了，损失较重。面对这悲惨的景象，同志们难过地低下了头，可董万功却说：“这没啥，羊没了打完鬼子再养。房子烧了山里有的是木头，咱再盖。”说着就砍木头，大家一齐动手又搭起了个小棚子。董万功风趣地说：“今天下雨又不怕了。”

以后，鬼子讨伐队三天两头来搜山，发现有人住的痕迹就烧就毁。董万功的住处，先后被毁四次。最后一次被毁时，正赶上连雨天，董万功蹲在山头，风餐露宿，忍饥受饿四十天，照样紧跟八路军抗日。后来，在一个十分险要、人迹罕到的瞎葡萄沟的沟底找到了栖身之处。董万功每迁一处，八路军的联络地点也就迁一处，他的住处就成了八路军的流动联络站和后勤站。

不惜毁家为抗日

一九四三年十月间，突击组在绥中西部山区初步打开了抗日局面。凌青绥工委根据上级指示，巩固和扩大绥中根据地，在绥中正式建立了两个区。建区后，反“集家”斗争得到迅速开展，董万功配合武工队串连和发动了周围几个村子很多群众，坚决不进“人圈”，而且，很多已经进去的群众也渐渐地回来了。没有房子，董万功又帮他们出主意，在山上挖洞住，既隐蔽又防寒。当时，关内老根据地人民支援五百多套棉衣、鞋帽运了来，董万功又帮助区上保藏、分发这些衣物。这样，回来的群众就更多了。

敌人见势不妙，便加紧了对山区的“扫荡”。为了壮大我军队伍，上级号召青年参加八路军。董万功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把他的二儿子董长斌送到区上参军，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这一带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有很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加八路军的动人事迹。

一天，信修主任来了，见他不断搬家，牵着牲口赶着猪，目标很大，行动不便，就动员他把骡子卖给部队去拉炮车。董万功高兴地接受了。同时还给部队送去两口猪。

此后，董万功一家九口人和敌人周旋，抽空就在山上开荒种地，尽量多收些粮食，支援抗日。区上同志和武工队经常来这里，吃的都是他们家的粮食。

一次，部队有临时任务来到这里，事先没通知区里，区上粮食不多，部队又等着开饭，区长李育民就找董万功想办法。董万功听了说“跟我来”。他扛着锹镐就上山了。李区长奇怪地跟他来到山上，在一块草地下埋着一口板柜，柜里藏着满满一下子粮食。李区长高兴地说，“你藏这么多粮食，咋没和我说过呀？”董万功神秘地说，“不到时候说它干啥，我这是应急用的。”

董万功自己家平时生活很艰苦，一年有大半年以糠菜度日。家里养着羊，自家没杀过一只。一件衣服破得不象样子了，干活时光着膀子，舍不得穿，他要留着早晚披着御寒。就是这样，勒紧了全家人的裤带，硬是为抗日献出了三千多斤粮食，十六只羊，两匹骡子和两口肥猪，几乎荡尽了家里的全部财产。

武装自卫队

回山的群众逐渐多了，日寇“讨伐队”进山骚扰也更加频繁了，群众时常遭到损失，上级决定组织武装自卫队，与敌人展开武装斗争。因周岭沟的群众基础较好，区里决定要董万功首先成立。一九四三年的冬天，第一个有二十多人的武装自卫队成立了。没有武器，他们就集中了一些猎枪。董万功又找出了早年打土匪用的三支大抬杆（即土炮），修好备用。没有火药，自己动手造，凌青绥办事处又发给他们三、四支步枪和一些造火药的经费。不久，火药就造出来了，他们把大抬杆装上火药，一点火，很好使。

武装自卫队开始活动了，他们站岗放哨，给八路军带路、送物资，夜间还配合武工队活动。敌人来了就打，敌人走了，他们就下地干活。这样，群众更加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抗日，才能有活路，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多地方都组织起了妇救会、儿童团，男女老少都参加了抗日斗争的洪流。

一九四四年春天，董万功又接受了造地雷的任务，在办事处派的行家教导下，他们很快就学会了造地雷。开始没有铁，他们就用土办法，用瓶子、木头匣子、石头造土地雷。董万功是个半拉石匠，他绞尽脑汁，做成了各种各样的石雷，恰巧这时伪甲长骆长恩领着敌人“扫荡”来了。区小队配合董万功自卫队，在陆家台狭长的山沟里埋上了石雷，敌人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做梦也没想到会踩上地雷，只听轰的一声，好几个敌人一命归西，敌人吓得跑了回去。

一九四四年的秋后，群众纷纷要求除掉“东霸天”骆长恩，这小子甘心充当日寇走狗，在围子里又刁钻古怪地祸害老百姓，确实恶贯满盈。办事处批准了区上处决骆长恩的报告。但这小子作贼心虚，平时老是龟缩在围子里不出来。董万功便向李区长建议，把骆长恩从围子里掏出来，并派武装自卫队员协助区小队处决了骆长恩。这一下，别处的伪警察和汉奸甲长也收敛了不少。

不久，董万功率领自卫队配合区小队和部队，在葫芦套打了一次伏击，消灭了八十多个鬼子，缴获了三挺机枪。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大雪封山，在山里更加艰难了。人们只好白天在山里隐蔽，夜里悄悄跑回屯子，在破房框里避寒，这时鬼子集中了二、三百人的“讨伐队”进山，到处翻粮食，董万功和区小队就在他的后院埋上了地雷。天气寒冷，敌人只顾挤在一堆烤火，三匹马拴在后院，只听一声巨响，地雷爆炸了，大洋马被炸飞上了天。

敌人吃尽了地雷的苦头，就变了花招，他们在进山“讨伐”时，便赶上一群牛羊，或从围子里掳来一群妇女、儿童，在前开路。为了不让群众受损失，董万功也变换了斗争方式，他们乘黑夜摸到敌人的警察署门口埋上地雷，敌人一出门就挨炸，吓得一天不敢出屋。以后又在树林里挂上吊雷，这种种形式的土地雷，使敌人大伤脑筋。

土地雷的效果得到公认，不久，上级在羊岩子里边的水泉沟正式成立了土地雷工厂，并举办训练班，培训了五十余名土地雷手。绥中西部山区人民向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地雷战。

董万功由支援抗日到亲自参加武装斗争，鼓舞和影响了

当地群众，很多人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凌青绥工委召开会议时，三县的领导同志在一起汇报情况，都认为董万功的事迹很突出，交口称赞这位老英雄。从此，在凌源、青龙、绥中这一带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董老英雄”这个响亮的称呼就传开了。

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董万功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单家独户地和鬼子斗争，坚持蹲山头，不进围子，直到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把自己所有的都献出来了，为的就是胜利的一天早日到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了，人们捣毁了围墙、岗楼，回到各自家乡重建家园，欢呼声响彻山谷。董万功下山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跑到锦州去看望信修同志。信修同志看董老英雄来了，非常高兴，亲热而幽默地说，“啊呀，我的老帐主来了。”董万功被弄得莫名其妙，说：“什么老帐主？”信修热情地拉他坐下说：“欠你的骡子钱还没给你呀！”董万功恍然大悟，说：“算了算了，我可不要钱，你要是还我钱，不就是把我这一片心意贬低了吗！”信修理解了老英雄的心情。的确，董万功当初为抗日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绝没有指望有一天能得到偿还。事实上，在价值的天平上，也没有一个金钱、物资的砝码，能与老英雄那颗高尚的心取得平衡。他所要的，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最后，信修同志拿了一块青士林布，一顶帽子和一个军用饭盒，说是送给他的，老英雄才算接受了。接着，

老信谈到：“斗争并未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又来抢人民的胜利果实了，我们还得拿起枪杆子保卫胜利果实。”俩人就这个话题，打开了话匣子。这也是老英雄来锦州的主要目的。

他心里只有共产党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蒋介石便企图在中国建立反革命独裁统治，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以“和谈”为掩护，密令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妄图强占抗战的胜利果实。

一九四五年冬天，国民党军队乘着美国军舰在秦皇岛登陆，沿着沈山公路进攻东北地区，绥中地区的主力部队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让开大路，占据两厢”，十一月间大踏步地撤至朝阳（三个月后返回）。一时间，绥中地区的汉奸走狗、地痞流氓乘机摇身一变，和国民党军队勾结起来成立了保安队，各地的花子队也相继成立，到处抢劫平民百姓。

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绥中秋子沟的保安队阚怀正、刘文印一伙突然闯到董万功家，让他把枪交出来。他们知道董万功的二儿子董长斌从部队带回来一支枪。眼看着这伙人虚张声势，董万功付之一笑，对他们说道：“枪是有，不过我和你们说清楚，解放军不久还回来，如果说解放军真的一个也没有了，到时候我再叫几个吹鼓手给你们送去。”邪不压正，董万功正气凛然，这帮家伙被震慑住了，只好空手而归。

又一天早晨，董万功一家刚刚端起饭碗，忽然从外面闯进一帮人来，一个姓黄的手提匣子枪，阴阳怪气地说：“那

个是董长斌？把枪交出来，外面有个人你们认识不？”他们向外一看是李殿刚，被五花大绑地捆着。

原来李殿刚和董长斌是一起从部队回来的。这次他穿着八路军灰棉袄到秋子沟赶集去，被保安队张德林手下几个兵发现给抓住了。

李殿刚被弄到秋子沟的时杖子，由于熬不过拷打，便说出董长斌从八路军那里带回来一支枪。就这样，张德林派人连夜赶到离周岭沟四里地的李大庄，住了一宿，次早便把董万功家包围了。

那个姓黄的一挥手，这帮家伙便翻箱倒柜，把枪和子弹以及信修给的帽子、布、军用饭盒全都抢走了。最后把董长斌也给抓走了。由于事前没有一点儿准备，加之寡不敌众，董万功只好压抑着心头的怒火。

为了弄清这伙人是哪儿的，头子是谁，董万功待他们走后，便暗中尾随他们，一直跟到秋子沟。

到掌灯时分，董万功进了村，不料被哨兵发现了：“谁？干吗的？”董万功答道：“找你们队长有事儿。”实际上，董万功并不知道队长是谁，有没有队长。

哨兵把董万功带到队长的住处。进屋一看，原来是早就认识的张德林，正在炕上抽大烟呢，以前张德林往关里跑密运（即秘密运输物资供应八路军），是董万功给介绍并做的保。再者，张德林和董万功的内侄贺如金又是磕头兄弟，张德林也叫董万功大姑父。

董万功说明了来意，张德林假惺惺地说：“早知道是你老就不去了。”然后让手下人放开董长斌，把枪还给董万功。最后，张德林劝董长斌和他一起干，说保证错不了。董

万功当即拒绝了。并说：“过去我送儿子参军是打日本鬼子，现在让我儿子打解放军，我还不作这个孽！小子，走道儿要一步一个脚窝儿。”张德林弄个没趣儿，在“恩人”面前又不好发火，无奈，只好把他们放走了。

为了表彰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功的民兵，更好地开展今后的地方的武装自卫工作，热东专署于一九四六年冬在分区要路沟召开了英雄大会。董万功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热东专署奖给他一面黄地红字的锦旗，上绣“人民柱石”四个大字，还奖给他一头黑毛驴。在这次大会上，董万功还接受了组织地方民兵自卫小分队的光荣任务。回来后，董万功把民兵自卫小分队由过去的十几个人扩大到三十多人。他任队长，受县委直接领导。

一九四六年末到一九四七年初，老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一些地主富农和在土改中受冲击的人先后组织了花子队。

一九四七年旧历正月初四晚饭后，花子队头子王锡伶、宋福吉等领着一伙人来，把机枪、小炮架在董万功家对面的小山梁咀儿上，打了一阵之后，便喊让交枪。董万功等枪响过后问道：“你们是谁？”停了一会儿对方回答说是王锡伶、宋福吉。董万功一听是他们，便骂道：“好个混蛋小子！我这儿还没听见过机枪、小炮响呢！你们再打打！”

这两家伙一听便说：“大爷，对不起你老，我们不知道是你老哇！”说完，便领着队伍溜走了。原来王锡伶被我公安局抓去过，是董万功给保出来的，宋福吉又是董万功女婿宋福林的弟弟。

在解放战争这二年里，董万功和花子队交战十余次，

如：在周岭梁上和王锡伶、宋福吉一伙，在北沟北梁和杨中印一伙；在南劳洞、上洼子和王锡伶、宋福吉一伙；在西杖子和郭廷宝一伙；在邱家窝堡和绥中的花子队阚怀正一伙……。

在黎明前的黑暗里，董万功没有被困难的岁月征服；没有被多变的形势左右，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个人的恩怨，他心里只有一条，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是人民唯一的希望。

出生入死，有功不居

一九四七年秋季，国民党五十三军约万余人由绥中出发，去承德增援受困敌军。董万功小分队三十多人接受了牵制敌人的任务。

董万功得到通知后便带着队伍到了秋子沟的小羊角沟，匆匆吃了点早饭就绕到了腰岭子。向下一看，荷！黄乎乎的一片望不到头。敌众我寡，相差悬殊，董万功异常镇定，他指挥着把三支大抬杆架好，然后一声令下，向敌人开火了，三支抬杆发出沉闷的吼声。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炮”打得晕头转向，他们不知道遇上了什么部队，是些什么武器，有多少人。当晚不得不龟缩在秋子沟的东杖子。

这一阻击战打完之后，董万功率领小分队迅速转移，次日，又在敌人必经之路——加碑岩的东稍树装好了大抬杆，敌人一进秋子沟沟口，山梁上的大抬杆又轰响了，与此同时，手榴弹、步枪子弹也一齐向敌人泼去，敌人遭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忽忽拉拉地往山上乱跑，时值秋季，山上的野草丛生，树木繁杂，敌人有挽着裤腿儿的，还有穿着裤衩

的，被山上的杨蜡子螫得嗷嗷叫，边跑边喊：“解放军下药了，解放军下药了！”董万功和民兵们在山上看着这些人的狼狈相，暗暗好笑。

就这样，董万功率领的仅仅三十几个人的民兵自卫小分队，拖住一万余人的敌人达两三天之久，为我军顺利地解放承德赢得了宝贵时间。“董老英雄”的称号越传越远，名望越来越高。一九四七年九、十月间，他的民兵队伍已经发展到四十多人了。此时，我军冀察热辽某兵团正挺进蒋军内战动脉——北宁线（今沈山线）。在沿线军民的配合下，对蒋军开展强大攻势。董万功率领这四十多人配合部队活动，抬担架，扒铁道，挖电线杆，运物资，先后到过前卫、荒地、葫芦岛、锦西、杨杖子、朝阳等地。一次还配合县支队在前卫扒铁路，捣毁装甲车一辆，俘敌军三十多人。

一九四八年，东北获得彻底解放，我军挥戈南下。董万功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县人民政府进驻绥中县城。于仲明县长把他接到了城里。于县长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老董啊，高兴吧！”董万功激动地点了点头，于县长又问：“你老是愿留在县里还是住在区里？有什么要求？”董万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老了，不能再领着队伍干了。我是庄稼人，我得回家种地去。”他谢绝了老上级、老战友对他的关怀。用他的话说：“我呆不住，干惯了的身子骨，不干活浑身都难受。”

全国解放后，在一九五四年，董万功被选为市（锦州市）、县（绥中县）第一届人民代表。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浮夸风也刮到了董万功居住的山沟里。粮食产量多报，有几个劳力也被抽走炼什么钢铁去了

他看不惯这种现象，还是那股倔脾气，他说：“粮食太少啦，整天大锅喝稀粥。人是不少，就是没有干活的，小队办食堂，吃大锅饭非饿死不可。”

一九六二年至六三年，董万功已经七十多岁了，生产队没有队长主持工作，他还站出来，张罗生产队的一些事情，安排生产，而且整天和青年人一样出工干活。

十年浩劫，这位有赫赫功绩的老英雄，也成了专政的对象。红卫兵抄了他的家，老英雄也被带到大队隔离审查。

由于多年积劳成疾，董老英雄右眼失明了，一卧再也没有起来。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二日不幸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老英雄离开了人间，他的一生历尽艰辛，在他病危之际，连要求点儿细粮都没能得到满足。这也是十年动乱留给后人的一件憾事！

董老英雄的光辉事迹将永远鼓舞后来人！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 写作本文时参阅了姜富彬整理的《董万功回忆》

回忆一九四六年的秋征工作

周治章

一九四六年秋，县政府下达了征公粮任务，区政府根据任务，也都分别下达已经建政的村和国统区的乡、保。我这时正在四区工作，记得在征粮任务中有一段国统区乡、保不交公粮的故事。

四区永安一带山区在一九四六年已建立了村政权。可是山南是归国统区的乡、保管辖，尚未解放。解放区的群众都能主动地按照政府要求，将公粮送到指定地点。靠解放区近的一些乡、保也都在夜间偷偷地送到指定地点。唯独李家堡西南的一些乡、保，他们依仗李家堡有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以为八路军不敢到他们那里去，所以迟迟不交。为此，四区区委书记李联胜和区长徐士贵同志商量，认为公粮征不征是小事，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让他们靠拢解放区为我们服务是件大事情。经过区里研究，决定在正月十五日晚抓地主老财和乡保长，采取一次强征行动，完成征粮任务。正月十五中午，区小队十九人，加上我们地工干部两个人，共二十一人，从边外出发，下午四点钟赶到破山洞村，战士们都在休息，我和李建忠同志准备到敌区写壁字。因为当时条件很差，根本没有笔墨，我们只好在老乡家弄点锅底灰，然后用饭米汤熬成浆糊，用麻扎成刷子当笔用。黄昏时分，我们二十一

人一同出发了。路经李家堡山南，大陶堡子，石家岭，夜间十一点左右到苗台子。屯东头有个四合大院，这家姓方，是个地主。我们开始在大门外墙上写壁字，区小队战士准备进院，一推门，发现大门已上了锁。正在这时，方老五提着枪从屋里走出来，刚一出大门口，被区小队的的一个战士开枪击毙了。屋里听到枪声，随即也响起了手枪和步枪声。与此同时，从山海关方向也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尽管明知是无的放矢，但我们由于地形不熟，而且不知老方家有多少枪，地点又靠近驻有国民党军的李家堡，如果他们把李家南山封锁了，我们就有被截击的危险，因此决定撤退。临走前我们又打了几枪，向方家院内又投了两棵手榴弹，然后以每小时二十华里的速度抢过李家堡南山，当晚赶回边外村宿营。

三天以后，我在村边遇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个认识的包廷贵，日伪时期曾和我一起当过店员。他见了我后，说明了来意。他们说：“我们是金丝乡的，苗台子保长叫我们来问问，正月十五晚上你们去苗台子有啥事。那天晚上正好遇上金丝乡乡长刘万义（也是自卫队长）带一名卫兵在老方家过元宵节，他也带来话叫我们来打听打听。”我听完便把他们三个人带到区长徐士贵住处，区长告诉他们转告乡、保长及地主老财们，限三天内必须把公粮送到区政府。这三个人回去后，第二天就背着钱褡子来了，里面装满东北九省流通券来缴公粮。因为送粮不方便，所以照粮数折成现款送来。我们这次不仅完成了征收公粮的任务，还给后来区里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马家大岭痛击保安队

李绍奎 维新

自一九四七年冬绥中县新建六区以来，在北石门、秋皮沟及铁厂堡等地发动群众，定阶级划成分，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参军的热潮。六区武工队由原来的三十人扩大到五十多人。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武工队长李绍奎和副队长叶德全率领全队成员，经常在大堡子、娄家沟和铁厂堡一带，与敌保安队及还乡团王朝宝等部往复周旋相持。由于武工队人精干，装备整齐，主动出击，敢于与小股反动武装生打硬拼，保安队，还乡团被打得惊慌失措，非常害怕。我武工队则越战越强。敌人眼看解放区不但巩固，而且日益扩大，便处心积虑阴谋窜扰破坏解放区，掠夺人民取得的胜利果实。他们改变了策略，采取联合偷袭战术，袭击六区多次得手，而且得寸进尺，进而偷袭老区永安堡、背荫嶂等地。老区东部、中部深受其害，两区干部多人惨遭杀害。

一次，马家大岭保安队联合国民党山海关驻军的一个搜索排，共三百多人，向我四区西部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四区队分析情况后，在锥山岭设伏，出其不意给敌人以有力的还击，使他吃了大亏。从此，敌人变攻为守，在马家大岭修筑坚固的工事，准备伺机反扑。敌人这一措施，妨碍了六区工作的开展，威胁着四区的安全。为了扩大解放区，巩固人民

政权和更好地开展工作，经上级再三研究，决定把马家大岭这根硬钉子彻底拔掉。

保安队在马家大岭驻有一个营，营长叫肖洪泉，下辖两个连和一个小炮班，另外收编了还乡团一个连，连长王中臣，连副张士尧。每连除长短枪外，还有三挺轻机枪。前沿阵地有一个连的兵力，其余随营部驻在马家大岭庄内。

这次战斗由我人民解放军蒙汉联军出动三个营的兵力，准备一举全歼守敌。为了配合作战，六区区委主任宋恩洪、区长郭海楼与武工队长李绍奎等，被调到四区小山口，和联军首长共同研究作战方案，并进行了两天的敌情侦察。经研究决定，采取分兵合围的方式，三个营同时进击，每个营配区武工队一个班，以为向导。一营由武工队长李绍奎带路，途经李家堡、王家峪直扑敌人阵地，作为主攻部队；二营由曹成海带路，绕过周家沟去兜敌人的后路；三营由刘德富带路，途经马营子、大堡子，准备就地聚歼逃跑之敌。指挥部设在周家沟后山。

马家大岭的战斗是在一九四八年旧历六月十三日夜十一点钟打响的。

当我一营主攻开始的时候，敌营长亲自指挥一个连的兵力迎击。敌人遭到我重武器猛烈攻击之后，发觉是大部队到了，慌了手脚，于是急忙下令撤退。按我们的判断，敌人溃败之后，必然奔向周家沟，到周家沟被阻时，一定向大堡子方向逃跑。果然不出所料，敌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口袋阵。这是多么好的战机呀？但是，由于三营未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出了空隙，敌人乘虚逃跑了，一直跑向南海方面。

战后发现，敌营长被击中三枪，当场毙命。打死班长一

名，士兵三名，生俘十名，缴获步枪二十多支，弹药二十多箱。

这次战斗，没有达到全歼敌人的预期目的，甚为可惜。尽管如此，终于拔掉了这根硬钉子。这为以后发展新区、巩固老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战斗结束后，部队把缴获的二十多支枪全部给了武工队，又给了三箱子弹。从此六区武工队装备加强了，活动地区也进一步扩大了。逼得敌人在山海关，长城脚下，不敢越雷池一步，最终这股敌人在相隔两个月之后，被歼灭在上中坨。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敌人的可耻下场。

1984年8月

• 本篇所述与王士平《保安队败走马家大岭》一文为同一战斗。二者并存，以飨读者。

保安队败走马家大岭

王士平 供稿

陈瑞麒 整理

一九四八年三至六月，我招募官兵四十余人，携带长短枪二十支和一些手榴弹，到国民党一八七七部队独立营当营长。上级下命令叫去张家口集训整编，官兵一致拒绝整编。连夜逃至山海关外，投奔河北省保安队第十团三营。该营营长肖洪泉和我早就相识，又同是国民党员。到达马家大岭后，我了解到，保安三营在北山高地设有岗哨和了望台，通向九门口的要冲也设有岗哨，南山筑有简易工事。总兵力有两个步兵连，一个小炮班，一个机枪班，共有三百多人。

旧历六月十三日，是传统性的农民青苗会。常家沟村保长杨兆昆中午宴请肖营长，我也被邀在座。我虽佩戴中尉军衔，实是一名附员，无职无权，跟随营部行动，没有任何任务。酒后归队，因气候炎热，不愿早睡，我同李副官去十一连随便看看。夜十一时返回营部途中，忽听鸣枪三声，知有情况，赶回营部报告。肖营长命令号兵紧急集合，跑步进入阵地。兵力部署为左翼一个排，右翼两个排，正前方命令一个排冲上去，其余为预备队。冲上去这个排仅上去二百米就接上火了，因为对面的高地已被八路军占领，只十数分钟就败下来了。据侦察，蒙汉联军出动三个营的兵力，三面合围，

人数多，火力强。又据报北山岗哨被活捉，左侧已被包围，右侧再要包围我们将陷入绝境。因此我建议肖营长迅速撤到石牌坊高地据守。这一建议未被肖营长采纳。就在这时，左翼那个排哗啦一下子也败下来了，我见事不妙，寡不敌众，带了几个亲信不辞而别，不料身后跟下来的有一个排。接着，郝连长全连向常家沟村方向逃跑。这次战斗约四十分钟。肖营长当场被打死，十二连一班班长阵亡，负伤七人，被俘五人。被八路军缴获长短枪十二支，弹药两千余发，手榴弹百余枚。其后，国民党保安队十团三营龟缩到山海关城北阎家岭青石沟一带，犹如惊弓之鸟，不敢活动。不久调往九门口里驻石门寨。就这样，马家大岭的据点被八路军没费吹灰之力彻底拔掉了。

1984年4月8日

夜袭黄家

曹玄庆采访整理

一九四六年六月，驻绥中的国民党军，除正规部队外，还大量收编伪满军警拼凑成地方的保安队，勒令地方组织伙会，为他们进攻解放区服务。这些部队窜扰频繁，轮番欺压掠夺，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渴望八路军来为人民除害。

国民党五十三军十二旅一部，于一九四六年农历腊月二十一日进驻绥中北部黄家一带。二十六日，十二旅撤走，又换来了于大川部（保安支队），该部所属部队分别在黄家、箭厂沟和北毛上坡子各驻一个营。保安支队部设在高台堡。

于大川部是土匪队伍，兵员除伪满国兵、警察外，还有许多是兴城县黑山科一带逃亡的地痞流氓，不少人有两支枪，一支步枪一支烟枪。他们白天出来，到各家各户串，有鸡抓鸡有肉拿肉，甚至把农家少得可怜的一些值钱衣物也抢走，搅扰得老百姓家家过不好日子。一到黑夜，他们就龟缩进各户，左一群右一伙地聚在炕上抽大烟，推牌九。至于“防务”，他们就交给了伙会。

伙会美其名叫自卫队。黄家的自卫队长由乡长郭子文兼任，副队长黄书林，下面有分队长刘长江，张庆云，李向荣等。根据于大川的命令，各地自卫队都要集中。于是黄家自

卫队一百来人集中住徐德福家和赵殿香家，配合保安支队站岗放哨。

于大川部驻黄家这部分，派一个连占据小孤山高地，第三连驻西头黄国顺家。鱼鳞坝上设岗哨，把树都放倒，横在地上，树不够就铺秫秸作为屏障。在小孤山和老黑沟上脑设有军士哨，配备有机枪。

戒备如此森严，把黄家附近几个村落防守得铁桶相似，于大川自以为万无一失了，八路军再也不能过来了。因此，当自卫队的副队长黄书林向他报告说，“解放军大部队可能要来，千万要小心”时，于大川勃然大怒，斥责黄书林是惑乱军心，造谣生事。立即把他押送到高台堡司令部去了。

最初，事实仿佛也证明于大川想的是对的。腊月三十日以前这几天，周围一片寂静，平安无事。除夕大年夜，当这帮匪兵都在大吃大喝之后赌牌耍钱的时候，突然从西南两面响起了排枪声。这一来吓坏了各级军官，连忙集合队伍，奔赴各屯边沿事先布置好的阵地。又冷又怕，忙乱了半宿，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成了一场虚惊。

正月初一夜，又是一阵排枪声，又是一场虚惊。

正月初二夜，又是一阵排枪声，又是一场虚惊。这三场虚惊闹得官兵上下个个人困马乏。

正月初三夜，不管于大川的保安队还是地方伙会，从官到兵，几乎没有一个不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事了。这几天不过是土八路到这里走走罢了。

不错，这三天火力侦察正是驻烧锅杖子的我县支队派人侦察的，不过除了侦察之外，还起到了迷惑敌人、麻痹敌人的作用。我解放军冀察热辽军区十八分区十七团，从热河赶

来，决定歼灭驻黄家之敌。指挥部设在距黄家十五里的黄土坎子。初三夜十点，部队由慈愍庵出发，派一个冲锋排配合县支队，从黄家的西面迂回到白枣林南山、黄家南山，控制南窜的敌人。又派一连兵力守小孤山北面，以防敌人抄后路。主力则从黄家北面攻打黄家屯和双泉寺（在小孤山南坡红石砬下）。包围圈形成，只空着东南角一面。

各路解放军由当地积极分子（如裴如林、裴殿武等）带道，半夜十二点，首先从西北方向拿下了学校北面鱼鳞坝上的岗哨，悄悄进入郜玉林家。敌人在屯西北仅有一个班的兵力。当我军到达黄国宾家门口时，敌哨兵问了一声“口令”，我军扔过一个手榴弹去，这个哨兵跑到驻在乡公所的连部报告去了，其余全班被堵在屋里，缴了械。

自卫队分队长得到消息，带人到村里各地去巡查，这才发现解放军已包围了全村，特别是西半部已完全被解放军占领。于大川部的第三连除连长带去执勤的外，驻在赵树学家周围的士兵全部交枪投降了。自卫队代理副队长张庆云妄想钻出包围圈，从南跑到北，又从后山梁逃奔大沟东山，在那里死于我军炮火之下。

一部分敌人要从毛家沟突围，正好受到我十七团阻击，十多个于大川兵和二十多个自卫队员被打死在黄家南地里。曾枪杀我农会干部的丁继操也死在炮火中。

原布置在老黑沟上脑的敌机枪，我军到那里一下子就拽过来了。军士哨敌兵慌忙起炕应战，不多久就被解除了武装。

双泉寺很快被我军占领了。

天亮时，于大川派了两辆装甲汽车载援兵开往黄家，我

军一阵机枪射击，一辆汽车轮胎被打穿，瘫痪在就地，驾驶员被炸死。另一辆见势不妙，掉头奔河套跑了。

这次战斗，由于我军计划周密，行动迅速，又是夜间出其不意地围歼，迫使敌军仓促间无法抵抗。外援不了解村里敌我情况，无从下手。因此，驻在北毛的敌军第三营虽占据犄角之势，为了保命，不敢支援，一枪不发地连夜往东逃跑了。远道赶来的绥中交通警察部队两卡车援兵，晌午赶到叶红旗北山，得知黄家早已结束战斗多时，盲目地打了一阵枪，也回去了。

这次战斗击毙敌人约四十多名，生俘保安队一百多人，有一小部分从东南逃跑了。当地群众都说：解放军这可给咱们报仇解恨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

绥中县保安队被歼黄家

张玉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强占战略要地，组织了与人民为敌的地方武装一保安队。他们到我解放区奸淫烧杀，无恶不做，见钱即抢，见物即拿，成为历史上十恶不赦的罪人，最终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一九四六年农历十二月中旬，以于大川为首的国民党保安队四百余人向我解放区宽邦、葛家、大王庙和黄家屯一带进犯。十二月二十三日，敌人到黄家屯安营扎寨，大队部设在四家沟徐家地主大院内。驻下后，到解放区向群众要猪要粮，没有，轻者绑，重者打，抓住村干部就不放，有死无生。当时，北部有驻建昌县和尚房子的国民党军队围剿，南部有保安队进犯，对我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开展工作十分困难。

为了摆脱敌人，保存革命力量，二区主任宋恩洪同志决定，暂时转移，避开锋芒，等待机会再开辟工作。区小队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十一点左右由秦家沟出发，经过建昌和尚房子，到达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自然屯——白家屯。这时已清晨三点左右，宋主任下令停止前进，就地宿营。

早晨，宋主任在队前宣布，这个地方山高林密，有利于作战，我们暂时住下不走了。部队住下后，还要回秦家沟一

带展开工作。当时宋主任派我和林仲山（已去世）到砖杖子烧锅杖子一带，侦察敌人活动情况（同时另派两人到和尚房子侦察）。我到烧锅杖子，该屯村干部已全部撤走。我找几个基本群众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然后，于二十五日午前又回到秦家沟屯，向宋主任做了汇报。宋主任说，去和尚房子的侦察员已全部被俘。敌人活动猖狂。对敌斗争，应按毛主席战略战术办事，也就是，敌进我退，敌住我扰，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宋主任把如何对敌斗争的意见向县委做了报告后，得到县委同意。为了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巩固根据地，扩大解放区，于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晚，县委派县支队由东洼子出发，直奔毛家沟包围敌人南面，二区队由大王庙直奔四家沟北岭，包围敌人后面，以期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计划晚十点统一行动。不料和敌人一交火，区小队战士刘文富胳膊就受了伤，全队随即撤回石山沟屯。区小队一撤，县支队失掉战机，也撤回东洼子县政府去了。这时，正好军区刘南生政委在县政府办事，经县委把敌人猖狂活动情况作了介绍后刘政委决定，由军区直接出兵，消灭这股顽敌。同时要求地方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配合。

经过紧张的战前准备，部队由梨树沟门出发，正月初一晚十一点多钟到达黄家、红庙子、孤山子、四家沟一带，把敌人四面包围，不使他漏网。初二日夜三点左右，和敌人交了火，经过三天两夜激烈战斗，敌人只跑出八十多人，其余三百多名全部被击毙和生俘。战斗结束后，清扫战场，发现四家沟西梁上遗尸四十七具。黄家屯花子队头子张庆云打死在路大沟南山炮楼内，保安队中队长朱德武的堂兄弟（名不详）死在路大沟口公路南侧地里。有一名副大队长被击毙，死在

孤山子屯。这次战斗还缴获了大量的各种武器和弹药。

经过这次战斗，保安队吓破了胆，有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一提到八路军大有谈虎色变之势，从此以后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一日

太阳山战斗

王兴朝

一九四七年冬，绥中山区解放区，在县委领导下，组织了农会，学习了土地法大纲，很快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随着贫下中农获得解放，翻身做了主人，一个参军热潮又掀起来了。以县支队为基础，加上新参军的农民子弟，组成一个独立团，从这里开出，加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场。县支队剩下兵力共约三百六十人，编成两个连，第一连由我任连长，第二连连长是王祥同志。留在明水下屯练兵。

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地主、富农纷纷逃跑，大、中地主跑到县城和铁道南去了，小地主和富农也跑到了城边子。他们不甘心于本阶级的灭亡，靠着国民党的后台，先后组织起一批地主武装。其中以王希伶、宋福吉为首的还乡队勾结上中坨的反动武装和盘据在东南方的于大川、窦海山匪徒，妄图从东西两面夹攻我人民政府（在东洼子）。他们的口号是：“打八路，灭穷党，抓住农会干部就听响，大姑娘，好物件，还有牛羊一齐抢，不能拿的就烧光。”针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县委决定给予严厉打击，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武工队和我连根据县委指示，进一步研究了作战计划。我们在周围地区选定了六个要害地点，计：沙河站杜家窝棚，刘把屯

的太阳山，前卫的小胡口，张子沟的刘户岭、马路岭和炉砢沟岭。决定就在这几个要害处打伏击。关于打法，指战员思想都明确：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敌人不到跟前不打，等手榴弹够得上时，步枪上刺刀，机枪开槽，跳出战壕猛打猛冲，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不能取胜的仗决不打，在敌人眼皮下行动，必须神出鬼没，声东击西，使敌人摸不清头脑。为了打好这样的游击战。要配以两个措施，第一是散发传单和标语，扩大宣传，给敌人以最大的精神压力，第二是经常派出侦察员，对敌人的兵力、兵种和行动都要了如指掌。

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一天，晚上六、七点钟，全体指战员轻装前进，夜十一点钟到刘把屯后山太阳山，放好岗哨，队伍休息待命。谁知，等了大半夜也没见敌人上来，早晨七点多钟，农民都下地干活了，敌人还是没有动静。当时我派侦察员梁纪营、佟二愣去刘把屯，一人留在屯边放哨，有情况鸣枪，我们好做准备。

两个侦察员刚走到一个小山包，就发现迎面来了一伙敌人，准备立即回报。但是，敌人已发现了这两个人，他们见有带枪的八路军送上门来，喜出望外，竟妄想生擒活捉。一面紧追，一面“抓活的！缴枪不杀，跑不了啦”地疯狂喊叫，等这伙不知死的敌人大部分进入我埋伏圈时，两把军号一齐吹响，战士们猛虎般地冲出战壕，手榴弹爆炸声震天动地，机枪扫射声，喊杀声，以及白晃晃的刺刀寒光闪闪，这一切把敌人吓破了胆。立时，大部分敌兵都跪倒在地，缴枪投降了。少数顽固分子还想逃走，被战士薛春堂一枪放倒一个，王振江刺倒一个，霎时间敌人溃不成军。这时我发现有两个敌人还在顺着大道逃跑，我立即放下机枪，拣起两块石头向

敌人追去（当时我顶替机枪射手，手枪交给通讯员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一石头打掉了跑在后边的小个子手里的枪。在我身后的战友抓住了他。我继续追跑在前面的大个子。这家伙一拐弯跳进大沟里去，甩下大衣紧跑，我在沟上边寸步不离，一直追到匡家沟，才把他追上。这时他已发现我手里没有枪，便转身把枪（狗牌橧子）对准我，口喊，“不许动，动就打死你！”但是我看得很清楚，他右手食指已经勾了两下，枪也没有响。我不等他改变主意，飞起一脚，踢在他肚子上，随后一拳，打在他下巴颏上，紧接着一个绊子把他撂倒，骑在他身上。夺下他的手枪，发现子弹卡壳，我退下卡壳子弹，往空中打一枪，很好使，我就用他的枪逼着他往回走，这个家伙是谁呢？原来他就是吴二沟还乡队头子吴殿久，不一会儿同志们也冲上来了。于是一同押着俘虏回大庙。

太阳山战斗结束了，清查一下战果，计生俘二十一人，俘获长枪二十三支，手枪两支，子弹二千七百发。另外还有敌人几具遗尸和几个重伤号。我军则没有一个伤亡。因为这个地方距离高台堡敌据点不远，周围敌人很多，逗留过久会生意外，就迅速整理队伍，押着俘虏转移了。

这中间还有一支插曲，俘虏中有一个叫邢士恒的，同我连战士邢士和是堂兄弟。邢士恒偷偷对邢士和央告，叫给讲情，千万别枪毙他。邢士和骂他说，“谁叫你参加花子队？不叫你去你偏去，死也活该。”但实际上在把俘虏交到公安局去的时候，还是把邢士恒的情况对他们说了。为了教育他，公安局依法枪毙吴殿久时，叫邢士恒“陪绑”，然后释放了他。谁知，邢士恒受到人民宽大，不知改悔，又跑到花子队

里去，倒被花子队认为是“叛徒”，枪毙在绥中了。

李家堡保警队被歼

维 新
王士平

李家堡是九门口外军事要地。它位于山海关北三十里，距解放区前沿不足二十里，是北宁路辽西走廊国民党的第一个长城外围设防据点，是扼制北部解放区的咽喉之地，也是地主反动武装还乡团的养息站和庇护所。李家堡据点的存在，威胁着四区安全，关系到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八路军从北部转战回来，在扩大解放区过程中，曾数次围攻未下，最后在一九四七年旧历八月间一举拔掉。战斗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经历过的战斗中最激烈的一次。现叙述如下。

一、设 防

临榆县保警大队于一九四六年农历七月间进攻四区永安堡，遭到我人民武装的有力还击之后，退据李家堡。从秋到冬，精心修筑工事，驻有保警大队两个中队。地址在屯西高地“李家堡大庙”，营地较为宽阔，前殿关帝庙，后殿娘娘庙，东西有配殿，可容纳一个中队宿营。庙前脚下新建营房一栋，除一个中队住宿外，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张余，警察分局长王克昌及巡官以下七人都驻在这里。地主武装还乡团也常在此

地过往居住。在紧靠新建营房的西边，即据点中间，筑有大炮楼一座，高十五米，四周有射击孔，顶上安放六〇炮一门，炮楼下有地道，可通百米外的中队部、区党部、警察分局。

据点外围设有木桩架设的铁丝网，周长三华里，四周设有碉堡。铁丝网外两米处设有秫秸路障，与路障衔接处，修筑工事形成战壕，宽二米五，深两米，每隔五米有掩体射击孔。五十米处有机枪掩体，用木石水泥筑成。战壕内修有交通沟四通八达，进退自如。工事战壕外布有地雷网，可谓工事坚固，戒备森严。

二、包 围

保警队经一年多修建工事，妄想抵抗解放军进攻，出于它的意外，一九四七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夜突然被八路军一个营围得水泄不通。包围以后，我军先将电话线割断；为了控制敌人，将住户后院墙打开缺口，形成通道。用两挺机枪封锁住敌人门前的水井。营部设在屯中，与敌相距有三百米，相接最近处只有八、九十米。另在据点前沿住户屋内设有监视哨，监视敌人行动，围而未打。

天亮即中秋节，敌人几次取水，都被打回。据点内由于缺水，敌人就慌神了，解放军随即开展政治攻势。首先派保长进入据点送信，陈说利害。

接着组织家属喊话，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并告知家属安全无恙。接着又喊：“八路军的大部队住满村屯了，你们已被包围，千万不能自找苦吃”。敌人顽固，拒不投降，竟开枪

威胁。第三次又组织乡绅劝降，敌副官杨小光和陈连长回话说：“打着看。”并以大队部名义扬言：“有本事你们就打，没本事你们快走，何必枉费唇舌”。经几次说服劝降，毫无效果。

保警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一九四六年在没有备好工事的情况下解放军两次围攻未下。这回工事坚固，易守难攻，解放军也不过与前两次一样，佯攻一下了事。所以他们妄图用勒索来的猪羊大过其中秋佳节。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佳节并不佳，在敌人决心负隅顽抗之时，也正是我军下令攻击之始。

三、进 攻

八月十五日，四区队和区里部分干部，通过边门驻军的联系，就赶到了李家堡与营首长接了头。营长说：“敌人负隅顽固，看来非打不可了”。区里去的同志非常兴奋，经常派人打听消息。

晚饭后，营部派通信员找区里的带队人。营长说：“刚接到司令部命令，做好打仗的准备。除原有一个营做主攻部队外，还调来一门山炮，三十七挺机枪投入战斗，部队已整装待发了”。紧接着又来了电话：“以炮声为令。五分钟占领阵地，三十分钟结束战斗，伤亡不得超过二十名，去担架十付”。营长很客气地说“请区里再帮助十付门板”。区干部刚布置好，屯里就戒严了，任何人都不准随便行动。

这时是晚上八点钟，炮从迷山（距李家堡东北二里多）打了过来。头一炮西南角碉堡盖子掀掉了；第二炮东南角碉

堡也完了；第三炮东北角碉堡又被摧毁了，连打四炮打下三个碉堡。大炮楼连遭两发炮弹，没掀动。机枪随着炮声从东、南、北三面射来，子弹仿佛是打场扬高粮，枪炮声象是爆豆一样，听不出个声来。最初，敌人还还击几下，几分钟后机枪就哑了，据点内只有零星枪声。这次战斗看上去令人非常痛快，在炮声枪声响过不久，多处冲锋号吹响了，有的用长钩钩地雷，有的战士搭跳板，眼看着人往上冲。只见东北角碉堡破口处，喊声阵阵，接着一拥而上，阵地全被占领了。大庙内喊杀声，“缴枪不杀”声连成一片。又隔十来分钟，枪声全停了。接着，我军押着俘虏带着获得的战利品往外走，到指定地点去集合。

敌人只跑出一个排，二十多人，是由二连连长陈连生和排长郝连玉带队从西北角跑走的。伤亡四十多人，其余二百多人全部被俘，这批俘虏集中在大庙前空地上点名。营长见到四区队领导说：“司令部有令，枪支不准给任何单位，统交上级处理。被俘人员中民愤极大的你们可以留下。”大家一听立即忙乎起来。

四、尾 声

四区队和干部分别在被俘人员中寻找那些过去有罪行有民愤的人。他们十分惶恐，有的扭脸躲避，有的弯腰不起。部队干部指示说：“大家要维持好秩序，除把地方上留下的人带走外，其余的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害怕。”这时被俘人员才稳定下来。留下的人有原一连连长姜旺春、便衣特务佟振声（外号铜子儿），还乡团头目杜怀新等二十一人。

在区队看押时，有个姓蒋的特务假报告说，他有支手枪保存在家里，愿意取来交区政府立功赎罪。区干部王希勤同志信以为真，带着他去取枪。这个人刚进屯不远，就向南大河方向逃跑了，追上他时还要反扑，被当场击毙。

战斗刚结束，八区主任李联胜同志（兼四区主任）到现场一看四区多数干部都在，他说：“这我就放心了。”当场命令，赶快把部队牺牲的同志掩埋好。这次战斗共牺牲二十几位同志，有一位排长在东北角攻击时冲在前面英勇牺牲。当掩埋时，营长走到近前眼含热泪说：“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哥儿们，由冀中打到这里，今天永别了。”说话时已泣不成声。走时命令部队把敌人碉堡营房全部毁掉。

区工作人员与老乡正在掩埋的时候，部队下令立即撤退，将未完成任务当场交给当地保长去办，并警告他说：“如日后发现掩埋不好，要追查责任。”保长连连点头答应。当部队刚转移到马营子村的时候，从迷山撤下来的山炮正拉着前进，山海关敌援兵已到李家堡南山，枪炮声响成一片，直向大河的北山被摧毁的据点大火处轰击。接着敌人很快过了河，追到大堡子西山大牛厂。我部队利用有利地形还击，经二十分钟激战，敌伤亡二十余人，才掩旗息鼓狼狈而回。

这次战斗是我们二人亲眼所见。王士平原系李家堡乡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常往来于李家堡据点，对该据点的情况比较了解。维新当时任四区副主任，曾亲自带区小队和警分干部赶到阵地支前，也是这次战斗的参加者。今春县政协召开文史资料座谈会，经过我们两人共同回忆，合写出这篇回忆录，以供参考。

铁厂堡突围

张士岐

整理

刘守鑫

一九四七年秋，李家堡据点被我独立八师拿下后，为了巩固老区，积极开辟新区。县委指示将四区南部（李家堡、铁厂堡一带）划为六区。六区建立后，从四区抽调一批从朝阳支前胜利归来的武装民兵，以叶广全、刘德富同志为骨干组成了一支精干的武工队，李绍奎（原四区武装助理）任队长。在区委主任宋恩洪、区长郭海楼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武工队与山海关、李家堡一带的国民党保安队、地主武装还乡团在常家沟、娄家沟、东娄台等地进行过多次激战。敌人对我武工队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一九四八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战场上败局已定，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为了扩大解放区，有力地打击敌人，迅速解放全东北，我六区武工队积极在本区开展活动，狠狠地打击敌人。二月十一日，李绍奎率领武工队二十余人，加上土改工作团及贸易组长关科（原名赵永臣）等三十多人，在李家堡到铁厂堡一带活动。这天夜里住在铁厂堡后山老林家。当时，关科认为都住在一起不妥，为了防备万一，就带贸易组高丰山等四人转移到距铁厂堡北二里的西松岭屯住下。与铁厂堡武工队形成犄角之势。

铁厂堡逃亡地主还乡团王朝宝、娄德山得知我武工队行动的准确情报后，便马上与山海关还乡团杨午桥部、保安团白光来部、小毛山自卫队杨福升部联系，共纠集匪徒三百余人，连夜向铁厂堡赶来。至拂晓时将铁厂堡东、西、北三面包围，只留南面，并把三挺机枪分别架在山头上，妄图将我武工队一举全歼。

是夜我武工队已在庄头设岗。拂晓时，排长叶广全派队员金长福去换岗，走到中途，发现大批敌人端枪上来。金立即回到老林家门口连放两枪报警。李绍奎起身问明情况后，告诉同志们不要慌，一切听指挥。

为了摸清敌情，先进行火力侦察，发现已三面受敌，情况紧急。经二班副范长明提议，决定从铁厂堡往娄家沟方向突围。战斗打响后，李绍奎率武工队边打边撤。当时夜色朦胧，尚未破晓，双方短兵相接，遇在一起，难分敌我。武工队趁机迅速甩掉十倍于我之敌，突出重围。突围中，二班长王百山（西沟人）因走错方向，当即阵亡，王××（山洞人）不幸牺牲在娄家沟口。王宝会（四区交通员，王台人）未能随队冲出，躲在秫秸垛里，被敌人用火烧出惨遭杀害。敌人在对铁厂堡实行三面合围的同时，向西松岭子屯关科住处派出小股部队进行搜索。恰巧遇上清早赶毛驴往南山地里送粪的村民郝××。敌问郝：“屯中有没有八路军？”郝说“没有”（其实他真的不知道）。郝××与敌人的谈话被另一村民听到，当即向关科报告了敌情。关科带同志们迅速向后山（松岭子）撤退，不料被敌人发觉。敌人认为郝×说慌，当即把他打死，并向关科等人开枪，关科连开几枪还击。

撤退中，高丰山、李春华二人负伤，关科等三人先冲上

山梁，组织接应，将高、李二同志救出；转移到四区调治。

武工队在开辟四区、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屡立战功。这次遭到十倍于我的兵力包围，绝大部份同志能够安全脱险，这种胜利突围的战例，将永远载入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

1984年5月18日

* 本文根据李绍奎、金长福，高丰山口述整理。

县支队对敌斗争故事两则

刘志岐

一、王岗台逮保长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绥中县支队住在鲍庄子和南岭小胡口一带，当时我任副支队长。为了统一行动，把所有的八个区小队全部调上来配合县支队五个连去打前卫据点之敌。前卫有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另外红眼队几十个人，两股加在在在一起，也就是二百多人。他们经常派出部队，到附近村庄以“扫荡”为名骚扰百姓。王岗台是他们往返必经之地，这里距离铁路、公路和前卫据点都很近，所以我们就选定在王岗台打伏击。部队夜间由鲍庄子出发，路过三山营、冯屯，到达王岗台村。到后立即把警戒派出去，然后利用各家院墙做工事，一切准备就绪，战士已经进入阵地。可是不凑巧，这天正是二月十九日，王岗台的庙会，大清早老乡们就三三两两地前来烧香。我一见到这种情况，心就凉了半截。我想，封锁再严密，有这么多人赶庙会也会把我们暴露出去。当时我和主要领导干部研究以后，决定撤出王岗台。正在这时，巧得很，由前卫方向过来十三台大车，已进入王岗村，车上装的是花生和苹果。我们一了解，全是北山逃亡地

主的大车。当时我派七、八区区小队把大车押送东洼子县政府处理，随后我们队伍也很快地撤出了王岗台。为了迷惑敌人，我叫队伍分散行动，漫山遍野地向北面撤去。又命几名司号员吹起号来。正在这时，侯屯保长错把我们当作国民党军队了。他跑得满头大汗，迎上来说，“报告长官，我是侯屯保长侯玉坤，方才区小队劫去了不少大车，我带你们去追，还能追得上，也只不过走出一、二里地远，官长你们赶快追吧。”当时我听了非常气愤，但还沉着地问：“能追得上吗？”侯回答：“能追得上！能追得上！”就在这时王右年连长向我笑了笑。我叫王连长把侯保长绑上点，“看他把咱们带到敌人那边去”。侯说：“官长！我带你们追八路去，还绑我干什么呢？”王连长说：“走！少说废话。”一直把他带到背荫嶂，部队进房休息。我叫通讯员把侯保长带来，侯进屋就跪下了。通讯员说，起来，八路军可没有这个规矩。”我问侯保长：“你不是中国人吧？”侯说：“报告支队长，我该死，我有罪，我眼瞎了。”我又问：“你认打还是认罚？你要认打，马上拉出去枪毙。你要认罚，罚你一百挺机枪，十万发子弹，两条道由你个人选择。”这下子可把侯保长吓坏了。“报告支队长，我侯玉坤就是骨头研成渣子也搞不出这么多机枪和子弹来。”我说：“那好，你先回屋里去，好好想想。”侯走后，区长刘国珍同志给我来信说，侯是两面人物，要利用他为咱们做工作，请你把他放回来，由我们对他进行教育。当时我们将侯放出，对他说明刘区长来信，才放出去的，并劝他要多给我们政府做工作，然后把他放回去了。

二、割电线扒铁道

一九四七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军分区向我支队要一部分电线。我接到分区通知后，马上召集班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分区指示。我说：“上级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向敌人去要。总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起道钉扒铁道；二是放倒电线杆子割下电线。目标高家洼子。一连警戒绥中方向；二连警戒山海关方向。破交及割电线任务由三、四、五连和区小队共同完成。三、四连由高家洼子向东，五连和区小队向西，工具由你们自行准备。任务完成后，各连听桥梁爆炸声一响就撤退，不再另行通知。”散会后队伍休息，待命出发。夜间，队伍由小山口出发，直奔高家洼子，警戒和破交割电线分头同时进行。待破交队伍到达铁路线上一看，有很多老乡在铁道上站岗。我们就把老乡带到高家洼子屯，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叫他们不要给敌人站岗看铁道。在这时，只听公路上电线杆乒乒乓乓直往下倒，铁路上也叮当乱响，非常热闹。战士们累得汗流浹背，有的战士正在爬上电杆砸碎瓷瓶拉下电线，就在这紧要关头，炮楼里的敌人开枪了，不断向公路、铁路上射击。这时我警戒人员向敌人喊话：“你们听着！你们再打枪就把你们王八窝给炸掉。”话音还没落，就由绥中方向开来一辆装甲车，很远就停下了，在车上乱打机枪，但不敢前进一步。当即遭到我警戒部队的有力还击。装甲车进退两难。前进，怕车下道；回去，又不好交差。就在敌人进退维谷的时候，只听桥梁上一声巨响，装甲车连忙逃之夭夭。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部队安全撤回永安一带。这

次搞到电线七百余斤，送交给军分区司令部了。

1984年5月8日

砬子山战斗

张玉林

一九四五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清晨两点左右，突然有二百五十多名八路军大部队进驻了砬子山。部队纪律严明，态度和蔼，武器装备齐整，每个战士配备大枪一支，子弹两袋，手榴弹四枚。在村里吃的饭。

部队刚一进村，伪牌长朱之甫趁人不备就溜出去跑到印脚沟伪甲公所给报告了。这时正巧有山海关日本守备队由绥中经黄家返回山海关。他们接到报告，立即由黄家屯通过水泉沟往砬子山西北部包围过来。当时部队首长正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政策，部队进村后在南山最高处和河东各放有六名监视哨。监视哨发现讨伐队和日本兵扛着枪抬着炮，杀气腾腾正往砬子山南山逼进。即时开枪和敌人交了火。监视哨从山顶上边打边撤，到山中间有一名战士负伤，后被敌军俘去。当时情况很紧急，部队首长下令，河东监视哨不撤，留下一个排，两挺机枪一门迫击炮，其余全部撤到北山待命。首长亲自带领这个排，在后山大柞树底下架上机枪和迫击炮，对南山顶上的敌人开火，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硝烟四起，看不见人。战斗一个小时，打死日寇五名，敌人吓得把日本旗都丢在山顶上了，后被王国臣捡着。八路军完成打击敌人目的后全部安全转移到北山。

我军撤退后，日寇由山上下来进了砬子山屯，按户搜查，将群众集中押到地主大院的槐树底下，然后架上机枪，把被俘的战士带到群众面前。开始先问冯连山：“你是八路军？”冯说：“我不是八路军，是老百姓。”鬼子抽出战刀吓唬说：“不老实的砍头！”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河东墙外六名监视哨，为了营救被押群众，向鬼子开了枪。鬼子听到枪声，惊慌失措，机关枪也不要了，拼命往街上跑。被押群众乘混乱之机也各自逃跑了。敌人中了我军调虎离山计，群众脱险了，监视哨随即赶到北山和部队一起撤走了。

日本鬼子经过这场打击，再也不敢呆下去，急忙跑到山上抬走被打死的鬼子尸体，带着被俘的战士，当夜赶到魏家屯宿营。临走时把我和朱正礼、王希文也给逮去了。

第二天早晨，房东谢忠信被勒令把我们三个人带到日本鬼子面前审讯。鬼子先问王希文，“你是八路的？”王希文说：“我是农民，不是八路。”鬼子抽出战刀叫王希文把上身衣服脱下，恫吓说：“不说就砍头。”王说确实是老百姓，又说有心口疼病。接着问朱正礼。朱正礼伪满时在长春日本商店干过事，拿出一张证明书。鬼子说：“你的大大的好人。”鬼子没问我。他说：“八路军来了你们报告不报告？”我们说：“报告。”鬼子说：“如果不报告，砍你们的头。”然后就把我们放了。后来听群众说，部队一名战士在屯北河套被敌机枪扫射牺牲了。敌人撤走后，群众把烈士的尸体给掩埋起来了，后来并给立了墓碑。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根据朱之甫的罪行和广大群众的要求，依法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生产，监督改造，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1984年8月13日

绥中县四区人民支前二三事

张士岐、刘守鑫、陈瑞麒整理

一、小松岭子沟破交

一九四六年三月，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某部奉命在绥中境内铁路沿线集结，目的是阻止国民党部队继续向东北运兵。为了配合大部队作战，县委指示，四区动员民工五、六百人去前所、高岭一带支前，主要任务是扒铁道，抬伤员。

当时国民党军队占领高岭西与前所东小松岭子沟之间的一个铁路桥的两个碉堡。东边碉堡由一名连长亲自带人把守，西碉堡由一个排长带人把守。碉堡分三层，地面一层，依地势地下两层，都用水泥加固，并设有电网。守敌依靠坚固工事，加上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易守难攻。我军与敌激战一昼夜，两个碉堡全被拿下，敌人伤亡大半，少数被俘。我方一个突击排触电死在碉堡周围电网前。

在战斗进行中，我区民工突入火线抢救伤员，每两人一个抢救组，由火线上抢救下来，再交四人一组的担架队，送往明水塘门。牺牲的就地掩埋。

桥头堡守敌被歼后，在区委主任（书记）李联胜、区长徐士贵的带领下，开始破坏铁路交通线。由于经验不足和缺少工具，只能用石头砸，斧头丁，大镐撬。撬下的道轨有的一节，有的两节连在一起，由几十个人抬往石柱子。枕木

扒下后堆在一起烧毁。白天时常有敌机前来轰炸、扫射。敌机一来，民工们利用地形就地隐蔽。敌机一走继续破交，昼夜不停。三天时间就把陡坡台附近的铁道大部破坏，使东北与关内的交通运输瘫痪。同时民工还砍断了高岭至前所一带的电线杆，使敌人电讯中断。

二、民兵爆破组去朝阳

一九四七年农历八月初一，根据上级指示，从四区境内各村挑选精干民兵三十人组成爆破组，去朝阳配合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作战（第二次解放朝阳）。我区编一个排，由高自尊任排长，刘德富、王××任班长。全排人员集中到张家房子后统一去东洼子县政府。全县组成一个团，由王兴山（当时任县武委会主任）任团长，下编三个连，我区一个排隶属一连，由王海山任连长。全团在县集训五、六天，出发前每人发两棵手榴弹，两棵地雷。四个人发一把大锤，一个铁撬棍，准备破交用。

农历八月初八，全团随部队出发，途经高岭、绥中、兴城等地到达朝阳。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保证安全，多是夜间行军。由于路途遥远，有的人脚都走出泡了，磨破溃烂，就用盐水洗，坚持行军。全团随部队沿铁路线活动，协助部队破交，分段进行，我四区的一个排负责将高岭至荒地一段近四十里长的铁道全部扒毁。一路上人民解放军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每战必胜。爆破组除担任爆破外，还负责抢救伤员、抬担架、看押俘虏。在战斗中需要抬担架时，第一线由部队往下送，第二线由爆破组交送老乡再送往后方医院。部队至杨杖子附近的燕窝埃打一仗，歼灭守敌一个师，获大批俘虏和枪支弹药。杨杖子打下后，又回师锦西、高桥、首山，

守敌均被消灭。然后又折回梨树沟门，经旧山去朝阳。

我军打朝阳共动用三个师又八个团，集中优势兵力，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全歼朝阳守敌一个师，再获大批俘虏和枪支弹药。俘虏下来交给爆破组看押，然后转交给二十六师。朝阳解放后，部队从战利品中拿出一部分枪支弹药发给爆破组，每人一支枪，一百来发子弹。爆破组随部队原地休息待命。五、六天后，返回绥中。为庆祝配合作战胜利归来，县委副书记王炳田、县长王实先给每排两只羊表示慰问。民兵爆破组去朝阳往返计五十一天，为人民解放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他们返回四区后，经区委研究决定，将这批经过战争考验的革命意志坚强的爆破组全体成员改编为区武工队，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随军同去的还有一个运输大队，由县长王实先负责，我区文教助理王文斌被调到县运输大队具体负责组织工作。四区运输队去五十多个驮子，由王希勤同志带队。每到一地，为部队运粮食、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朝阳解放后，部队把从敌人手中获得的大批战利品，如枪支弹药、皮革和焦炭等，拨给地方一些，都由运输队运回县里。以后又在县内从康家房子、塔子沟先后两次往东洼子县政府运粮。

三、军人后援会兵站处

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我军展开全面进攻，国民党反动派已处于全线崩溃的境地。为配合大部队作战，支援前线，经绥中县人民政府指示，四区成立军人后援会兵站处。区委主任维新同志兼任处长，区委宣传干事张永江负责兵站处具体工作。成员有王宝昌、刘洪模、胡万森、王宝凤等人。兵站处没有固定办公地点，活动于全区各村。

主要任务是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一旦前方有战事，上级来任务，兵站处即按需要向各村分派人员和驮子。当时全区共组织起担架一百五十付，运输队三个分队，共二百多个驮子。

一九四八年秋，兵站处组织运输队五十多驮子从塔子沟往北边甘沟运粮。还有一次从明水塘门运往甘沟。每次往返需要五天时间，途经谭杖子、秃耳朵岭、狼牙岭。第一次我区由王宝昌带队（全县共参加一百五十多驮子），突然遇到地主武装约二十多人，在狼牙岭要劫运输队粮食，县支队闻讯后，及时赶到那里。土匪见情况不妙，连忙逃之夭夭，运输队得以安全通过，完成任务后即返回四区。

此外，兵站处还曾组织驮子去兴城往回驮弹药。还组织过一百来人的担架队经和尚房子向锦西方面支前。

兵站处的积极活动，使得敌人惶恐不安，还乡团常到四区骚扰。兵站处同志为避开敌人不得不转至康家房子、背荫嶂一带山区活动。有时还在野外露宿，坚持斗争，完成任务。

随着形势的发展，到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全境已解放，兵站处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绥中地下工作片断

周治章

解放战争时期，山海关是东北的西大门，邻近绥中解放区，是国民党军窜扰我解放区的基地。绥中县委在解放战争初期只设一个政治处，处理日常工作。后来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经研究增设一个地工部（也叫城工部、国工部），由县委副书记王炳田同志兼任部长。凡靠近国统区的区，都配有地工干部。八区我和王树勋、陶士民三个同志，与县委地工干事兰彬同志保持联系。

地工部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分化瓦解敌人，二是配合部队消灭敌人。分化瓦解敌人方法很多，据我所知，一派遣，二拉关系，三利用关系，四政治宣传，五对敌军投诚人员教育与招待。至于配合部队消灭敌人，就是要准确地掌握敌情。

派遣，就是派一些人到敌区搞地下工作，或到敌人内部进行活动。比如地委地工部曾派吕焕章同志到山海关工作，同时又责成我们和他接上关系。吕焕章在山海关以跑行商为公开身分，经积极活动，不久就和国民党交警第十三总队参谋长挂上了钩。我县缺少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就靠吕焕章进行活动。这时候缺少外线，就是搞到枪支弹药也无法运出来。于是我们又找到蛇山台王永明的哥哥，通过他用送土

粪的驴驮子驮出来。吕焕章曾从敌参谋长手中弄到两支新的二号手枪，这两支枪到手之后，县委书记李树仁、副书记王炳田每人佩带一支。吕焕章还从敌人那里弄出子弹数千发，弄出水银用自行车胎带回来。还有大布数十匹。山海关的敌情他掌握得一清二楚。我们还派李信、郝连玉等人到山海关保安队当兵，通过他们给弄过子弹，掌握山海关敌情，对部队作战起到一定作用。一九四七年六月，有一个从国民党五十师高岭驻地开小差来投诚的士兵，经过教育，我派他又回到前所当兵。半年以后，他带领一个班十一名士兵携械投诚。当他们跑到狼洞子前山时，国民党军队就追赶上来了。我八区区小队迎接上去，这十一名同志顺利地到达了解放区。同年，七区地工干部李建忠曾派田宝富（曾用名张朋飞）到前卫车站六十师当兵，半年左右时间，他带领国民党一个班士兵携械投诚。

拉关系，凡是国民党开小差的士兵及国统区和解放区有亲属关系的人，我们都千方百计地拉上关系，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叫他们供给我们情报，为我们服务。例如我们从敌人逃兵口中得知，高岭、前所驻守的士兵多是从安徽、浙江、四川抓来的，他们非常厌战，思乡情绪严重。有个算卦的孙先生，我们利用他给国民党士兵算卦的机会，来涣散敌兵的士气。对所有来算卦的国民党士兵，孙先生都说，“从卦中看，你们父母在挂念你们，你们有贵人，贵人在东北方或西北方。”说贵人在东北方西北方就是指解放区。由于各战场的胜利捷报频传，国民党士兵开小差的日益增多，开始时只一两个，以后三、五个，到一九四八年时就成班成排地向我解放区投诚。一九四八年初，驻绥中六十师一个排长带

领全排携械投诚，同时将自己的妻室也带到了解放区。据当时记忆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国民党士兵开小差或携械向解放区投诚的有八百多人。

利用关系，我党经常印刷一些宣传品，传播胜利捷报。这些宣传品我们就靠敌方人员传递。比如前所北白庙子有个姓郑的，他在前所乡当雇员，我们就靠他把宣传品带到前所城内散发。我们还利用前所自卫队特务腿子瞎老岳和高岭自卫队特务腿子安德森等人。这种人两头起作用，他们到解放区来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就利用他把宣传品和胜利捷报带入国统区，同时也向他们索取情报。

搞壁字宣传，我们经常利用壁字宣传我党的宽大政策，优待俘虏，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道理和欢迎蒋军官兵投诚。我们凡到国统区都要写壁字，走一处写一处，使敌军知道我党的政策，给敌人指明了道路，有的投诚，有的一接火就交了枪。

地工部还设有招待所，开始设在明水，以后，又迁到汤口、鲍庄子、胭脂窑。招待所的任务是：把开小差和投诚的蒋军官兵生活安排好，更重要的是教育好，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愿意参加的可编入部队，愿意回家的给开路条，发给路费。经过上述方法，取得了瓦解敌人的成果，有力地配合部队作战取得胜利。

一九四七年农历八月初十，县委副书记王炳田同志给我写信，让我连夜将前所敌情搞清楚。我看完信后，顶着毛毛雨，从潘家沟西沟直奔马圈子，到了关系人家中已是夜间十二点了。把前所敌人兵力、武器、火力点、地形地物弄清楚后，连夜又返回背荫嶂，向王炳田同志做了汇报。到旧历八月十五日晚，我独立八师攻打山海关以东几个车站，解决了荒

地、前卫、陡坡台、高岭、前所、万家屯等地驻守之敌、打垮了五十师一个团，并将这一段铁路搞了个大翻个。

一九四七年腊月二十五日，县委副书记兼部长王炳田把我们几个地工人员找到一起，叫我们在二十九日以前搞清陡坡台大桥守敌的情况。我通过关系人安德森，将陡坡台大桥驻守的一个连，三个炮楼，三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每人一支中正式步枪，以及火力点，连排班长姓名特征，地形地物，都搞得一清二楚，并画了草图。在腊月二十九日，向部长做了详细汇报。部长说：“你们完成了任务，明天过年吃点好的，好好休息，明天晚上还有任务。”第二天，晚上五点钟左右，部长说：“你们地工人员今晚要在十点钟以前赶到高岭车站后山坡炮楼附近，向敌人喊话，内容是宣传我党的宽大政策，优待俘虏，不给蒋介石卖命等。”当晚七点钟我们出发，到指定地点向敌人喊了半个钟头话。驻守在高岭车站的敌人一听喊话，就向前所和陡坡台敌军据点通了电话。我们临走时说：“蒋军弟兄们注意，我们打两枪就走了。”敌人知道我们撤走了，又向前所、陡坡台通话说：“只有几个区牙子叫了一阵就走了。”于是他们毫无戒备地过起了除夕之夜。有的炮楼在吃喝，有的炮楼在耍钱，搞得乌烟瘴气。这时我县支队两个连赶到了，把三个炮楼团团围住，每个炮楼去一个突击组，往射击孔里扔了手榴弹，紧接着枪声、喊杀声连续不断。敌人惶恐万状，举手投降。只几分钟战斗就结束了。我军毫无伤亡，敌一个连全部缴械了。

地下组织“裕民生”※

魏福刚 整理

一、组建之前

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对峙和反攻阶段，国民党蒋介石为挽回败局，对我八路军加紧疯狂进攻，对解放区严加封锁，捕杀我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阻挠和切断解放区和白区内部的联系。在国民党统治的大、中城市里，人民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风起云涌，争取解放的潮流势不可挡！

为了迎接绥中的解放，搞清盘据在绥中城内的国民党军事部署，掌握敌党政机关和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一九四七年秋，热东十八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公安处处长李如皋，行政科长张丙政派常杰同志到绥中城内开辟地下联络点，为我军提供情报。

常杰的老家在绥中城南，对绥中比较熟悉，当年秋后，他回到了绥中，为筹建地下组织作准备工作。

当时绥中县城的形势是，国民党军队警察特务布满全城，横行霸道，市面混乱。城内驻有保安队四个中队。国民党六十师师部设在道德会院内（现绥中三中）。东街设有警察

局,谍报队、国防部二厅情报组。另外还有县政府、县党部、三青团。当时城门上挂着三个大牌子,即:通匪者杀!勾匪者杀!亲匪者杀!其恐怖之状,可想而知。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地下工作,可真不容易。

二、“裕民生”的组建

常杰来到绥中之后,首先找到他的好友罗世贵。

罗世贵家住双台子。他初中毕业,精明干练,忠厚耿直,接受新事物快。当常杰找他谈话,说要建立党的地下组织时开始他感到很突然,经过常杰的解释,又谈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趋势,罗世贵深受教育,他果断地欣然接受了。接着,常杰又找到卢连祥。他们既是朋友,又是亲戚。常杰对他没敢直说,因为卢连祥不比罗世贵,那时他正在警察局当督察员,人心莫测,不得不防。但出人意料,卢连祥也早就看出国民党腐败无能,不得民心,倒台就在眼前。他表示决支 持和赞成,愿意参加。又打开一个渠道,而且是个“内线。”再通过卢连祥找到贲长田(卢连祥的姐夫),通过罗世贵找到罗世维(警察局司法科雇员)。

常杰到后方把发展的人员情况向上级领导同志作了详尽汇报。张丙政同志同意,派常杰同志赶快回来筹集资金,找落脚点。

常杰回来后,说明了上级的意图,大家一核计,决定凑款集资,开个杂货铺。

常杰拿三十石玉米,卢连祥出十石,罗世贵、贲长田各出五石,共计五十石玉米(计两万多斤)。在东大街找到两间

门市房。

这个地方算得上是要害位置了。它的对面路南是警察局，路北德盛庆油坊，后面住着国防部二厅情报组，紧挨油坊后边是烧锅，住着谍报队，看来，要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搞情报，可真得担十二分风险。

但是，他们也从另一方面考虑，越是看来危险越有保险的因素——易于给人造成一种假象，麻痹敌人。只要保密工作作好。更便于开展工作。在敌人腹地，也容易更快、更准确地得到情报。

一切准备工作完毕，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小铺正式开张营业，既然是个小铺，就得有个字号。起个什么名好呢？经研究最后确定叫“裕民生”。取“三民主义”的最后一条“民生”。这样既可对敌人解释，又体现了“裕民生”是让人民生活快快富裕起来这个深刻的含意。

商品经营项目，他们也动了脑筋，以烟酒糖茶，糕点、果品之类为主。这些东西全是生活所需，警察特务有钱的没钱的，他们都给方便。不出所料，到后来警察特务们常到这里连吃带拿，明里是赊，实际上就是白吃、白拿。“裕民生”从不难为他们。

三、开业之后

“裕民生”杂货铺开业后，他们做了简单的分工，罗世贵同志名义上任经理，抓全面工作，实际负责往外送情报、运物资，接收上级送来的宣传品。贲长田同志站柜台，常恩荣（常杰的哥哥）是帐房先生。卢连祥和罗世维在警察局负责

搜集敌人内部的情况，常杰在店里不担名，他负责传达上级指示，指导工作。“裕民生”的主要任务是：

收集国民党部队在锦州—山海关的军事部署情况，了解敌人地方党政机关和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以及警察局、谍报队、花子队人员名单；散发传单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往后方运送纸张文具和盐、布等。

“裕民生”与后方联络地点在双台子罗世贵家后院菜园子里的一间大仙堂。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罗世贵同志把情报送出去，把宣传品带进来，然后发给大家，利用各种机会张贴出去。

（一）撒传单

“裕民生”开业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共产党的传单便遍布县城各个角落，人们窃窃私语，敌人也不知道城内有多少解放军，同时，县长刘杰、征兵科长王世昌以及所长李经伦等人不断接到我军的信件，搞得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敌人也加紧了封锁和警戒。到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连出城进城都困难了。

面对新的情况，他们开动脑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机会，他们发现哨兵对学生盘查的松，便把宣传品放入在城里念书的常恩祥（常杰的弟弟）的书包里。李世荣（罗世贵表兄）还曾经用草帽子往城外带过情报。他们有一条计策十分巧妙：在出城进城的人数多，拥挤混乱的情况下，他们出城时佯装往城里跑，进城时佯装往城外跑，因为哨兵往往都是把那些往外走的人往里拽，往城里去的人往外推。这样，他们每次出城，都是哨兵往外推，进城往里拽。

敌人的严密封锁，并没有使城里的传单、信件减少。于是，敌人便组织了“刷子队”，每天天不亮，便把贴在墙上的传单全都刷下来，不让这些传单和群众见面。同志们一看“贴”不行了，便采取另一种办法，撒！但这个办法较危险。既然是撒，就得到人多的地方。弄不好容易被敌人发现。罗世维同志便穿着警官服，有时也穿着长袍，腰里掖着宣传品，到公共娱乐场所，把传单撒在厕所里，要不就趁人多拥挤的时候，顺着衣服抖落出去。谁也不会怀疑这国民党警察官还能干这样事儿！

(二) 逢凶化吉

有一次常杰到太和隆商号，被一个姓金的认出来了，原来他在解放区的中央军招待所住过，那时常杰是所长。他一看到常杰便嚷嚷：“常八路来了！”这时卢连祥从屋里出来，对姓金的说，“你嚷嚷什么！他是我的亲戚，从解放区跑回来的。”姓金的一看是卢连祥，便不敢吱声了。为防备意外，卢连祥第二天又找到姓金的：“你这小子以后再不许瞎说，你的底儿我全知道，你也是从解放区那边跑过来的！以后常杰有个一差二错，当心你的脑袋。”

平时，卢连祥、罗世维在警察局就注意结交那些军警头头们，以便从他们口里弄到情报，更好地开展工作。绥中明水塘门一战，使花子队大败而归，就是“裕民生”送出的情报，那是有一次卢连祥和花子队中队长朱德武喝酒唠嗑，朱德武两盅酒下肚，便对卢连祥说：“到北边玩玩去，明天到明水塘门扫荡！”卢连祥不动声色地问：“几点开拔？去多少人？”朱答：“八点，去一个突击队”。

卢连祥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常杰，常杰又火速转告给张丙政，由于我们有了准备，这次战斗，花子队遭到惨败，落荒而逃。

一次，“裕民生”接到搞一批大布的指示后，由罗世贵和罗世维二人前去锦州购买，用火车发回绥中。常杰和罗世贵赶着大车，上面装着秫秸，把大布放在底下，直奔双台子罗世贵家。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们把大车赶到罗家门口时，看见花子队正在罗世贵家，这时要把车赶走是来不及了。他们便果断而沉着地把大车赶到院中，随后和花子队打起招呼，杀鸡、买肉、打酒、做饭，让这群家伙乐呵一场，就这样敷衍过去了。两天以后，张丙政带了几个人，用骡子把大布驮走了。

（三）积极做好营救工作

罗世维同志在警察局司法科任雇员，敌人审讯“共产党嫌疑”时，他都担任记录。因此对这方面的情况知道得比较多。解放前夕，李世荣被当作“共产党嫌疑”抓到警察局，关在谍报队那里。罗世维知道后，便到谍报队，把他给放出去了。

一九四八年夏天，绥中国民党县政府密令警察局逮捕爱国学生。罗世维得到这个消息时，已有三名学生被捕了，还在搜捕爱国学生会主要成员的陆振雨。罗世维告诉卢连祥，要赶快通知他隐蔽起来！

卢连祥听罢心急如火！秘密查找陆振雨的住处。最后终于找到，并把他带到自己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卢连祥把陆振雨送出城，让他投奔山海关他大哥那里去。这

样，陆振雨平安地逃出了虎口。

卢连祥的舅父常纪国是县参议会副议长，有名的绅士。

“裕民生”地下组织认为利用好这个人对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好处。为此，常杰参加了常纪国儿子的婚礼。以后常纪国还真起了一点作用。有一次卢连祥在半夜里刚贴完传单，就来了一个人。卢连祥赶紧走开。那个人在看墙上的传单时，来了四个巡夜警察，把那个人给抓住了，说传单是他贴的。那个人就指着卢连祥的背影说：“是他贴的”。卢连祥听得真切，但还不敢跑。四个警察追了上来，一看是卢连祥，问是怎么回事儿，卢连祥说我根本不知道贴传单的事儿。警察又问那你半夜三更出来干啥？卢连祥说犯烟瘾了，买合烟抽。说这话的功夫，那个人已经没影了。卢连祥这下有了主意，说：

“你们几个小子没安好心；把贴传单的人放走了，还不给我快追。”

卢连祥回到家便和老婆说了，“我去买烟，硬说我贴传单！赶快告诉你舅一声。”正说着，四个警察就来了。说李经伦所长有请，原来这几个小子回去报告了。

卢连祥来到警察所，说啥也没承认，李经伦拿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没捺住手，况且出证的那个人也不知那儿去了。

后来常纪国找到卢连祥，以长者的口气告诉他，这事经说合算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惹是非。此后，警察局行政科长董占恩受到了怀疑。

董占恩是北边建昌人，这些天城里闹得这么凶，传单都是从北部来的，头头们在讨论此案时分析可能与他有关，常纪国一心想开脱外甥女婿，便也添油加醋。结果这个董占恩暂时做了替罪的羔羊！解放后这小子被我人民政府给逮捕了。

（四）嘉 勉

为了表彰“裕民生”的贡献（功绩），十八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给“裕民生”颁发了“嘉勉状”，高度赞扬他们：“身处虎穴，倍尝艰辛，坚决英勇忠实为人民服务，可谓隐蔽战士中的楷模！”

（五）城防要图的作用

在绥中解放之前一个月，上级指示“裕民生”搞一张绥中县城的“城防要图”供我军准确地打击敌人，顺利解放绥中。

常杰把上级的指示传达给“裕民生”全体成员。并指示卢连祥在督察室多留点神，想办法搞到。因为城防图只有督察室有。

卢连祥接受任务后便利用值班之机，把城防图盗了出来，连夜送到“裕民生”，复制了一份，第二天又给送回原处。这份图对解放军解放绥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六）巧取档案

一九四八年九月，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困守孤城。我军一包围锦州城，绥中的敌人便惊慌失措了！他们已感觉到末日来临，开始了紧张的“善后”工作。

上级党组织指示“裕民生”，在敌人溃败之时，一定要保存好敌伪档案。

当时警察局认为价值不大的档案全部烧掉了，把有价值的装了三大麻袋，这三大麻袋档案往哪里藏呢？罗世维见机行事，提议抬到对门“裕民生”他大哥的店内。这帮家伙连连称好，由罗世维引路全部抬到“裕民生”杂货铺“保存”。这些档案有行政科的，总务科的，司法科的，督察室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户口簿。就这样，“裕民生”没费一枪一炮，连人力都没出，便从敌人手里把敌伪档案接过来了。至今这些档案保存完好。

（七）完成了使命

一九四八年阴历八月二十五日，我军攻入绥中，从此结束了漫长的黑夜，迎来了东方的曙光！

为防备局势有变，上级指示“裕民生”暂不暴露，贲长田和常恩荣暂时留下维持店面，照常营业，常杰、罗世贵随部队到锦州市公安局，卢连祥暂时留在绥中，罗世维同志则以警察逃跑的名义来到锦州市国民党警察局。

全国解放了！“裕民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一九八三年二月

※中共绥中县委于1982年12月22日召开了“裕民生”座谈会。此文根据当年在绥中搞地下活动的“裕民生”全体成员，常杰、罗世贵、贲长田、卢连祥、罗世维等五名老同志在会上的发言整理。

绥中土改前的三个运动

常文玉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我党政军于八月下旬即进入绥中县城。进城后成立了政治处（即县委）和县政府。信修、王杰二同志先后任代理政委，王炳田同志任副政委，华玉民同志任县长。当时主要任务是：摧毁敌伪政权，接收敌伪物资，维持地方秩序等。

我县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两个多月，国民党军队即从秦皇岛登陆，于十一月中旬开始向东北进犯。为了保存实力，寻求有利战机，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绥中县委及县属各机关团体（包括县支队）暂时撤离绥中，转移到朝阳。

一九四六年二月又从朝阳回到绥中北部山区，在秋子沟西杖子正式恢复了县委和县政府机构，坚持工作。县委主要领导成员有：政委李树仁，副政委王炳田，县长华玉民，建联会主任王杰，公安局长于仲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复仇、增加工资、减租减息运动，发展与巩固根据地。

清算复仇

清算复仇开展的具体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二月到中共中央发布的“五四”土地改革指示七月在我县传达为止。

当时在北部山区有八十九个村庄开展了清算复仇运动。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汉奸、特务、叛徒、土匪等。各区都成立了清算复仇委员会，对六十二名罪大恶极的奸、特、叛、匪等进行了清算斗争。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的全部或大部，分配给受害群众和贫苦农民。据统计有一千五百九十九人程度不同地分得了一些财物。在群众强烈要求下，对罪大恶极分子执行了枪决。其余四十八名在大会上坦白认罪，赔偿损失。参加清斗大会的群众达五千零七十一人。清算出的果实有：土地五百亩。粮食二百零二石，现款三百十三万元。这些物资除清理退还给过去受害的贫苦农民土地五百亩，粮食八十五石二斗，现款三百零八万五千元外，用于救济粮九十五石二斗，救济款一万元。其余粮食二十二石，现款三万五千元收为公有。三区在黄家村召开了清复公审控诉大会，对伪满黄家村协和会副会长徐冠三进行了清算斗争。徐是孤山子大地主，有土地一千三百余亩，自己经营三百亩，出租一千亩。他帮助日本鬼子“移民”、“集家”，强行摊派，搜刮民财，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支援日寇侵华，为虎作伥。为彻底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发动群众起来复仇，政府先行把他扣押起来，继而发动群众控诉、公审，对他的罪恶进行清算。附近十个村一百六十二户“移民”起来，向徐冠三算帐，控诉了“移民”去北票、下煤窑、住席棚、吃

不饱、穿不暖，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情形（这十个村在北票死亡大人三十五名，小孩四十八名），揭发徐冠三欺骗群众说去北票如何如何好等等。移民户临走前把马、骡、驴六十一头，牛羊一百三十七只，房屋二十八间草草处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要求徐冠三给予赔偿，经过多次斗争，由徐的家属送来现款六十万元。为了彻底清算，又把他家的粮食三十石和衣物等约值百万元的物资全部分配给受害群众和贫苦农民。最后，在群众强烈要求下，将徐处决。五区在西杖子也召开了清算复仇大会，对白枣林子村伪“配给”所长耿庆武进行清算斗争，分了耿家的钱、粮、衣、物等。此后各村都纷纷起来，清算复仇的烈火越烧越旺，贫苦农民扬眉吐气。清算复仇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当时斗争的情形。

绥中县清算复仇情况统计表

单位：亩、石、万元

区别	被清算人数	参加斗争人数	斗争果实			果实分配						枪决	
			土地	粮食	现款	土地	粮食		现款				
							清退	归公	救济	清退	归公		救济
一区	5	210		12			10		2				2
二区	10	169	350	99.7		350		22	77.7				
三区	26	2,389	150	74.9	277	150	74.9			276		1	2
四区	8	1,082		12.3	12		0.3		12	12.5			5
五区	13	1,220		3.5	24				3.5	20	3.5		5
合计	62	5,071	500	202.4	313	500	85.2	22	95.2	308.5	3.5	1	14

当时采取的斗争方式有以下几种：

1、政府先把斗争对象扣押起来，再发动群众。这是在运动初期群众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并且存有种种疑虑的情况下采用的办法。

2、县、区干部亲自动手将汉奸、特务、警察的部分或全部财物分配给受害群众和贫苦农民，这是我们扩大根据地初期立足未稳所采用的方法。

3、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分掉汉奸、特务、警察的粮食和财物，是有组织领导进行的。但是在运动的初期，积极分子和领导骨干大部分不敢在群众中公开，活动的方法是较隐蔽的，在根据地的边沿区一般都用这种方法。

4、有领导地通过积极分子带动广大群众分掉汉奸、特务、警察的粮食和财物。这一般是在根据地的中心区，通过积极分子个别串连，启发群众自发自觉，逐步走向有组织有领导地召开清算复仇、坦白自新、公审控诉等群众大会。会后通过清算委员会将汉奸、特务的粮食、财物分配给受害群众和贫苦农民。这种在大会上同汉奸、特务等进行面对面斗争的方式，在较巩固的根据地提倡运用。

分配土地、粮食、财物的原则是：区别在伪满时生命财产所受损失的大小，损失大的多得；损失小的少得。注意区分贫富，贫苦农民多得；日子较好些的少得；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多得些，得好些。

增加工资

黄家对徐冠三的斗争，多是移民代表出面，随着斗争的需要，移民代表逐渐变为农会组织成员，此后黄家红庙子等

十五个村首先进行了增资，正式成立了工会或工会小组。增资斗争在北部山区很快开展起来。据当时统计，全县五个区有雇主三百一十五户，雇工四百五十五人，有的工资是货币，有的工资是粮食，原工资总额七十七万六千元（伪满币），粮食二百九十八石，经过增资斗争货币增加三十五万一千元，增长46%，粮食增加一百四十六石四斗，增长45.2%。

农村雇工工资普遍较低，有货币和实物两种形式。货币工资一般年资为四千元左右，实物工资一般为四石粮食左右，因此增加工资也就采用增加货币和实物两种形式。增加工资的幅度一般为增加原工资的30—50%（个别的增10%高的增80%），雇工本人的穿衣、用鞋，根据不同地区习惯和不同工种规定数量，由雇主付给雇工货币或实物。其它形式很少。

比如：在原工资基础上加30—50%（无论实物或货币）；另外一至五双鞋、两身单衣、一套棉衣两双袜子（共折粮食三石一斗，折钱三千一百元）。

但也有另外加养家口一个半人，作为增资的一项内容。折合小米一石八斗，钱五千四百元。

佟家店雇工原工资五千元（合米二石五斗），另要求鞋子十双，袜子三双，半尺布，养一口半人（合粮一石五斗），连原工资在内总合计伪币八千七百一十元。这样，如果按钱算即增加原工资的74%（纯增加三千七百一十元）。

腰岭子、拐子沟等地原工资五千元，增六百元，只增原工资的12%，但也有增10%的地方。

在增资中采用的斗争方式大体有两种：

1、召开雇工会议，进行阶级教育。在提高觉悟后，即组

织工会或工会小组，由工会主任或小组长领导增资斗争。遇到顽固不化的地主、富农不予增资时，就组织全村所有雇工进行罢工，一直到增资胜利为止，这是较普遍采用的方式。

2、召开雇工、雇主参加的联席会。在会议之前进行两方面教育，一是教育雇工在会上怎样发言，怎样斗争；二是动员较开明些的雇主，使其在会上起增资带头作用。但这种办法不是普遍提倡的。

在增资斗争中运用的几个策略：

- 1、打击最顽固及封建性最大的地主、富农。
- 2、先突破在伪满作过事的大、小汉奸。
- 3、利用较开明的地主、富农自动增加工资影响其他。

附增加工资统计表一份，从表中数字可以看出概括的情况。

增加工资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石

区别	雇主数	雇工数	原工资		增 资 数				备 考
			货币	实物	货币	十%	实物	十%	
一区	80	82		258			129	50	
二区	40	126							
三区	135	188	62.4		22.8	36.5			
四区	51	49	15.2		12.3	80			
五区	9	10		40			17.4	43.5	
合计	315	455	77.6	298	35.1	49	146.4	45.2	

说明：1、将原表中不可比因素作了调整，如原工资是货币，增资又是实物者。 2、货币折合粮食是按当时历史资料每百元一斗折算。 3、增资比例一档是后加的。

减 租 减 息

绥中山区土地分散，租佃关系较少，但租金较高，剥削的分量较大。减租减息继清算复仇、增加工资斗争后也普遍展开。但我县只在减租上作了一些工作，减息工作未进行。据一、三区五个村的统计，有地、富二十七户，佃户四十二户，出租土地五百八十六亩，原租额为一百二十八石，减去租额三十六石三斗，实减28.3%，减租的原则是：

1、按“二五”减租。但由于租额较高，按原租额减去25%之后，余下的租额仍然超过常年产量37.5%，因此采用了减租额可以超过25%、减到租金不超过常年产量的37.5%为准（如葛屯刘德山出租地十亩，原租额五石，减去“二五”后，应交租三石七斗五升，但总产量七石，租额占产量的53.5%，如按不超“三七五”计算应交租二石六斗二升）。

2、减租时地主向佃户退回上一年应减的租额，有的地方群众强制地主退二年的也就默许了。

3、保护佃户的承佃权，打击地、富的夺佃行为。

4、佃富农租入的土地，一方面按“二五”减租的规定减租，一方面将其佃入的土地转让给贫农租种。

5、属于地主阶级的孤儿、寡妇出租的土地，同样按“二五”减租，但应照顾他的生活，在退租方面可以酌情少退或不退。

总之，通过清算复仇，增加工资，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提高了干群的觉悟，由畏首畏尾到敢于发动群众；由拉拢上层到依靠基本群众；由不坚决到坚决。广大群众真心倾向

党，知道共产党是给穷人办事的。给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有力的基础，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广大贫苦农民开始抬头，翻身。工会、农会组织普遍建立，据五个区四十八个村的统计，建工会组织三十八个，农会组织二十四四个，工会会员四百二十八人，农会会员四百五十六人。广大贫苦农民开始统治过去统治自己的人。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绥中县的土地改革

常文玉

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多少年来地主富农就是用占有的土地、生产工具来剥削与压迫贫苦农民，贫下中农要想翻身求得解放，必须彻底粉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地方各级党委的具体指导下，绥中县土改工作从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开始，到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结束，历时三年零八个月。

老区土改

老区，即北部山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我党我军消灭顽匪打击敌人的根据地，即解放最早的地区，群众也叫“中心区”。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全县开始土改，大量工作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七月五日到七月底。七月五日县委在下屯召开了会议，七月底在佟家店召开第二次土改工作会议。当时已接到了中央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和工委“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有关指示，县委作了几次研究，决定利用“清算借粮、借款、退租退息”等方式达到分散土地的目的。

第二阶段，从七月底到八月末。地委会议后，根据七月

底县委佟家店会议的精神，八月十六日在东洼子又召开区书联席会。在这一阶段里，各区普遍举办了训练班，训练群众，培养骨干。受训的都是在旧社会最贫困的受苦农民，训练和当前实际斗争相结合，让他们参加小型的流动的斗争会，在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并给予回村领导具体斗争的任务，这样使骨干和积极分子的思想得到解放，使分散土地的斗争很快开展起来。一区办四个班训练二百一十人；二区办三个班，训练五十六人；三区办一个班，训练二十二二人；五区办三个班，训练九十六人。全县共办十一个班，训练三百八十四人。

组织积极分子工作团，到各村进行土改。一方面解决县、区干部的不足，另一方面让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仅一、二、三区就组织工作团四个，共九十九人。其中一区两个团，二十四人；二区一个团，十三人；三区一个团，六十二人。工作团主要任务是帮助启发带动群众，而不是包办代替。经过工作团一段工作，给发展党员和培养提拔新干部创造了条件。在此次土改斗争中全县共建立起三十七个党支部，二十个党小组，发展党员四百八十九人，这些党员分布在全县一百二十九个村庄。提拔了党、政、群团、武装等干部三十九人。

在训练积极分子组织工作团的基础上，召开农会会员大会，村民大会，对地主、劣绅、恶霸等进行斗争，清算他们的罪恶。清算内容，一、清算高利盘剥及地主、豪绅、恶霸等霸占的土地和隐瞒的黑地。二、清算过去伪满时期村、甲、牌长的贪污。三、清算过去按户摊派的各种“出荷”负担。四、清算劳工、移民、检问班、修路、筑围等的劳务负担。

五、取消对汉奸逃亡户的土地代管，把土地分给农民。在斗争中要先确定好斗争对象，明确斗争目的，交给斗争方法，把群众发动起来，防止包办代替和审讯式的斗争方式。

另外，还组织先进村积极分子去帮助落后村，发动先进村的群众去落后村进行斗争或组织联村斗争，都是很好的办法。

对土地的分配和果实的处理。根据得地户原有土地加上斗出土地，按人口平均算出应分得的土地数。在分配中考虑土地的远近，土质的好坏，有无劳动力等因素，决定得地多少。抗属除分得平均土地数外，还另给以优待，最多的二区照顾五亩。树林确定为公产，供将来公共建筑事业用。果树要统一管理，秋后卖果款作为合作社基金。

分配土地的方式，一般为村农会干部将各户应得的土地先算出个数字，然后在农会会员大会上宣布，让大家讨论通过，这样既团结群众，又防止个别农会干部要好地多要地。

总之，这一阶段工作进度快，群众发动的充分，使土改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第三阶段，从九月初到九月末。九月六日山嘴子会议，县委提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复查运动，解决明分暗不分的现象。与此同时开展武装保卫秋收运动，发展与巩固基层组织，以县支队为骨干，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打击进扰边沿区的保安队和还乡团，发展巩固根据地。当时在一百二十七个村庄建立了民兵组织，发展了少年队、青年队、壮年队、老年队、民兵基干队等一万多名，拿起了红缨枪、土枪、土炮、土地雷等，打击来犯之敌。有一百二十四个村建立了农会组织，发展了一万二千多名农会会员，绝大部分

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

有的地方出现明分暗不分和地富到被斗出的土地上收秋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贫雇农慑于地主、豪绅、恶霸的威胁，心有余悸，害怕他们报复。有的外逃的地富、恶霸竟组织起反动武装“伙会”，“还乡队”，与地方保安队相勾结，到我解放区武装抢收，对我干部和群众进行血腥镇压，计杀死我农会主任四名，抢劫我解放区一百七十一个村庄，掠去牲畜十八头，衣服七百零八件，布匹折款八千四百元，现金四千四百三十元，四户家俱被打坏抢光，一户房屋及财产被烧。通过多次血的教训使广大干群认识到：土改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农民在经济上要翻身，在政治上也要翻身，这就要用统治力量去统治过去压迫自己的人。针锋相对，我们也用武装来保卫秋收，组织群众进行抢收，在小叶红旗、龙屯等地发动三百余人抢收庄稼四百七十四亩，农民得到粮食三十六石。带动了大叶红旗等村庄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抢收，保田保粮，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

一九四六年夏的土改，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国民党军队进攻承德，把土改这个中心转移到战争上来，因而有的村的土改斗争搞的不深不透，有些夹生，在一九四七年又开展了消灭夹生饭的运动。

从三月开始到八月初，全县共搞了五十四个村，占上年土改村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三。各村的胜利果实都较去年有所增加，据六个区二十八个村的统计，新果实有：土地九千零九十二亩，粮食五百四十三石，房屋三百一十四间，山十架，梨树六百四十六棵，棉被和毛毡二百二十一床，衣服二千九百六十六件，布一万三千九百四十尺，棉花九千八百四十

四斤，黄丝九十五斤，骡马五十八匹，驴五十七头，牛一百六十七头，羊八百二十八只，猪一百四十五头，大车二十六台，家具一千五百五十八件，首饰一百三十四件，现款三百四十五万二千六百六十六元，食盐二万零四百六十七斤，火油一百一十七斤，纸五千二百张，麻一千零五十八斤，步枪二支，子弹四十三发，土枪四支。

从上述不完全统计中可以看出，经过“消灭夹生饭”，胜利果实大大增加，参加斗争的人数比去年更为广泛，据二十九个村的统计，参加斗争人数达六千零六十九人。其中男四千零五十七，女一千二百七十七，儿童七百三十三人。政治觉悟也大有提高。表现在不只对汉奸、恶霸、地主进行了斗争，而且给国特以打击，并侧击封建统治的不良习惯，反对搞破鞋，反对扎洋针，真正实行了清算复仇，表现了农民对地主封建势力的革命正义的报复行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地委扩干会议决定，集中力量，较大规模地、大面积地展开彻底平分土地运动，要求熟中求快，又好又快。在方法上，大量组织工作团，大块搞，有重点地点面结合，对许多村贫雇农集中训练，组织力量，把平分政策迅速传达到群众中去。我县根据上述决定，从十一月三十日起至一月二十日止，在一百二十四个村庄开展了这一运动。

各区都先后召开了有一百五十人至五百人的贫雇农大会，会后普遍扣押了地主、富农，查封并接收他们的财产。在较边沿的村庄随接收随分配，大规模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据开展平分的一百二十四个村统计，贫雇农得粮六千六

百石，花生三万二千六百八十斤，棉花九千一百一十九斤，马三十六匹，骡三百七十六匹，驴六百四十五头，牛一千三百九十七头，羊五千二百五十只，猪一千四百五十头，农具八千一百五十六件，大车三十二台，衣服被褥毡子等五万八千一百三十四件，大布三千五百九十一块，柜一千九百五十四口，缸二千零五十个，锅四百三十一口，黄丝五百六十一斤，大烟土二百五十二两，现款二千五百九十二万元，银元三千零三十七块，首饰二千九百七十二件，枪八支。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不但超过过去两年的果实，而且初步解决了贫雇农缺乏生产资金、农具和畜力问题。三区头道河子村，二十九户贫雇农中有十七户没有牲口，这次分得驴每户一头，骡子两户一匹，后又由县调给二匹马一匹骡子三头驴。大部分村粮食能吃到明年七月。在分配中采取满足需要，缺啥给啥，缺多少给多少的办法。五区魏杖子村一百一十九户，得到果实的五十一户。其中雇农十七户，七十四口人，共得到骡子四匹，驴八头，牛三头，粮食两石六斗，衣服六百二十六件，布六十一块，被三十三床，毛毡二十三领。贫农二十四户，一百二十九人，得到骡子五匹，驴五头，牛一头，粮食一石六斗，衣服四百二十七件，布四十九块，被二十四床，毛毡十四领。下中农十户，四十一口人，得粮食五斗，衣服一百零八件，布十块，被七床，毛毡三领。

果实的分配各区方法不同，归纳起来有六种。

自报公议。自报所缺，公议决定，这种方法既能满足需要，又能物尽其用。三区东洼子村有六十户贫下中农分得果实就是这样办的，大家都感到满意。

只自报不公议。就是自报缺什么多少，不经过大家讨

论，缺啥拿啥。由最穷的先拿，然后按穷的程度依次挑选。

只公议不自报。由少数几个头前人，根据各户所缺，定出哪些户给啥，给多少，然后由大家讨论决定。

分摊抓阄。一区西边村分浮财时把东西平分二十八堆，由二十八户贫雇农抓阄，谁抓上哪堆就拿哪堆。

按人口均摊。西边村在分现款时，二十八户贫雇农按人口每人分七千元。

按户分等。四区小河口把贫雇农分为三等，在分衣服时一等三件，二等两件，三等一件。

总之，通过这次平分土地运动，贫雇农在经济上开始翻身，在政治上开始当权。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地主仇恨，斗争坚决。在挖浮财中四出调查，日以继夜，挖出了不少粮食衣物，有的从羊圈里挖出银元首饰。妇女和儿童也都积极参加这一斗争，贫雇农子弟踊跃参军参战。一区从十二月到来年一月参军新兵就有三百七十多名。三区三天就有一百五十名。贫雇农积极靠近党和政府，使党与贫雇农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边 沿 区 土 改

由于中心区土改运动的影响，边沿区广大贫雇农纷纷起来要求平分土地。为此，一九四八年一月县委决定向边沿区推进。当时县委组织了二百余人的工作团，在县委委员带领下，分三路压缩敌占区，开辟新地区。王炳田同志带一路在高岭、前所一带，李树仁同志带一路在前卫一带，于仲明同志带一路在高台堡、黑水台一带。有县支队三个连和区小

队民兵等密切配合。到边沿区后，武装斗争紧密结和除奸反霸，镇压坏蛋，由分粮分浮财到分房子分地。行动猛，分配快，坚决依靠贫苦农民，抓捕了一些地主、保长、谍报员等。随着大抓捕的行动，就组织发动群众分配粮食和财物。从一月九日至三十一日仅二十天的时间，在九十二个村庄，共分了一千零六十七户，分粮食五万多斤，衣服六千多件，牲畜二十头，满足了贫雇农的部分要求，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区小队，巩固了根据地。

在分粮、分房、分浮财斗争中都有武装保卫和配合。地主的反动武装——“还乡团”、“自卫队”天天出来破坏和扰乱，抢贫雇农已分得的胜利果实。随着平分运动和边沿区扩大的要求，各区都加强了区小队的武装力量，一般都发展到九十至一百人。对他们加强了游击战术和纪律的教育，区委书记亲自带领小队作战，打击敌人，坚持边沿区的斗争，保卫了平分运动既得的利益。

新 区 土 改

新区进行土改的十一个行政区和四区山南的八个村，共计三百零三个村，四万二千二百六十二户，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八十万零三千四百九十二亩地。六、七、八、九、十、十一区与四区山南八个村，大部是我们过去的边沿区，一九四八年一月平分运动中进行过搬石头①与分浮财运动；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城厢区在绥中解放前是国民党政权统治区，老区与边沿区的一些逃亡地主、富农，也多寄居于此。因此，新区的封建势力较老区尤为严重。

新区土改工作团共有九十人，一般是脱离生产素质较高的干部，是从县党政机关和老区抽调的，还有就是新区新参加尚未分配工作的训练班学员。根据各区原有干部多少，素质高低，把工作团分为若干小组，分配到区，由区委统一领导。

各区参加土改的干部共一百八十七人。各区都先后举办了贫雇农训练班，在搞试点后，抽调了一批劳而又苦的贫雇农积极分子，计二百零六人。六区还吸收了三十二名小学教员参加。土改开始前，工作团经过整顿，将出身历史不好和不安心工作的动员回家三十二人，因此参加新区土改的工作团和积极分子以及县、区、村干部共有四百八十六名。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召开区书、区长会议，部署新区土改与老区发照工作，十五日至十七日工作团开始到村，联系实际进行搞点，再次举办贫雇农训练班，培养群众中的带头骨干。这样，每村二十至三十天就可完成分地任务并结合搞了送粪和春耕准备工作。

政策执行中的具体规定有这样几个：

新区土改打击面，根据东北局指示，以区为单位，打击面户数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八，人口不超过百分之十。根据这一原则，各村在划阶级成份时，要经区委审查批准。遇有特殊村超过以上规定时，由区委报县委审查批准。全县打击面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点七，人口占百分之九点六五。新区打击面最大的是十四区，占全区总户数的百分之十点五，人口占百分之十三点一。打击面最小的是六区，占全区总户数的百分之六点一，人口占百分之七点三。在评阶级定成份时，贫雇农团和积极分子先作好准备，吸收中农参加，也吸

收地主、富农参加，让他们发表意见，以求阶级成份定得真实准确。反对乱扣、乱打、乱斗。在掌握斗争对象上，地主、富农有区别，大、中、小地主有区别，奸霸与非奸霸有区别，有破坏活动和无破坏活动的也有区别。孤立打击极少数罪大恶极，民愤最大的地主与反动富农。

丈量土地和分地的原则是，中农的土地不丈量，但为了在春耕前很快地把地分下去，也可普遍丈量。七区三山营村一面划阶级，一面丈量土地，选出贫雇农丈量小组十六人，每组一盘弓，二人拉绳，二人核算记账。一天半的时间把全村地主富农与贫雇农的一千三百七十四亩土地全部丈完。经过群众讨论，干部掌握，仅四天时间评完产量，分配土地即结束。丈量、评产、分地前后共六天。分地原则，贫雇农土地一般原产不动，缺多少补多少。原产坏的补好的，原产好的这次配些次的。自家地远的，这次分些近的，自家地近的，这次分些远的。劳力强的分远地，孤寡无劳力的分些近地。烈军属无劳力的分好地近地。佃户租种的土地基本上还分给原佃户。富农的土地拿出来跟贫农一块分配。地富分得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坟莹地一般留下。分配以行政村为单位，属于哪村人就在哪个村分地。

从一月十五日到三月二十五日，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有二万四千二百零二户，十二万四千二百多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共得土地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亩，粮食一万五千八百零九石，马骡驴一千六百四十三头，犁、镐、锹、锄四千四百五十件，胶铁车五百四十四辆，衣服被褥六万七千一百二十八件。

此后又进行一次土改复查工作，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二

月十七日起，至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全部结束。这次复查，因有三个区材料未报，按九个区统计，共查出漏划地富五百一十四户，三千五百一十七口人，抽出土地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六亩，房屋一千四百七十三间，马十匹，骡子五十二匹，驴一百零九头，衣服六千八百三十三件，被褥六百五十八床，粮食一千二百零一石八斗，农具一千一百五十九件，柜箱四百九十八口，黄金十五两一钱，白银十斤一两，流通券一千五百五十九万元，大车十台，另外还有金镏子八个，银镯子三付。

在土改基础上，广大贫雇农中农政治积极性非常高。一方面努力生产，一方面积极支援战争，青年参军上前线，壮年出战勤抬担架，老弱劳力妇女儿童搞生产，站岗、放哨、送情报。广大群众拿出最好的粮食、布匹、牲畜，支援战争。据统计，在三年解放战争中，绥中全县人民供给部队小米五十八万斤，军鞋五千多双，马料二万多斤，被七十五床，军用电柱八百多根。总之，土改后的广大群众和民兵，对支援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注 释

①解放战争时期，我根据地人民政府有计划地派出武装到敌占区捕来地主、恶霸、特务分子等，勒令出钱出枪，支援人民武装力量。这种行动当时叫做“搬石头运动”。

立木沟修械所概况*

张士岐
陈瑞麒 整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派十三军石觉部由大毛山口进入我区。敌人所到之处，陷人民于水火之中，摧残我地方政权。为了打击敌人，巩固人民政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经上级决定，我县建立了修械所，修理枪支，制造手榴弹和地雷，以供应我地方武装的需要。

修械所于一九四七年春正式建成。在组建过程中，得到热东分区崔科长亲自指导和有力地支持。地址在今永安乡立木沟的西青沟，有工作人员三十多人。张国扬任所长，受县武委会直接领导。

修械所分枪支修理，手榴弹、地雷制造两部分。具体技术由崔科长负责指导。由于条件所限，修械所土法上马，因陋就简，自力更生搞原材料。比如缺少用煤，就自己上山烧炭代煤。以后曾从朝阳运来三车焦炭，解决了一时的急需。制造手榴弹、地雷所需的铁料是由各村收购来的废铁。炸药从县里直接调拨，另加硫黄和芒硝等物。制造手榴弹和地雷的方法，是先翻砂制造外壳。翻砂，是用一个大铁桶做成的土化铁炉，内壁用黄粘土、木炭末、沙子、缸碴子末混合涂

抹、加固而成。然后将废铁装入炉内，加温化成铁水。用大勺舀出，倒入模子里。冷却之后，装上炸药、雷管和导火索，安上木把，手榴弹即告完成。生一次火可做手榴弹、地雷壳四百至五百个。每月大约可生三次火，手榴弹生产的数目所占比重较大些。地雷是圆形的，有二大碗大小，约有七、八斤重。作好的手榴弹和地雷，由县武委会王海山同志负责分配到各区，各区持介绍信来此领取。

六月间，由于地主还乡团频繁窜扰，情况紧急，工作不便，将修械所迁至塔子沟妙峰寺院内。是年六月，县里又派来吴占印为修械所所长，张国扬改任副所长。以后鉴于工作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修械所曾两次迁址到秋子沟的大河南和小杨树沟。

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全境解放，绥中也全部解放了，修械所当即撤销。

立木沟修械所成立两年，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制造出数以万计的手榴弹，地雷，修理了无数的大小枪支，有力地支援了全县各区的武装斗争，对于巩固根据地、扩大解放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它的辉煌业绩，至今仍为当地人民所传诵。

• 本文根据张国扬、金兆余口述

绥中县驻四区贸易组*

维 新

一九四七年，为从敌占区获得军需物资，我县成立了贸易公司(又称贸易局)，何智任经理，韩飞任副经理。下设三个贸易组，是贸易公司的派出机构。四区贸易组由关科(原名赵永臣，抚宁县台头营人)负责。工作人员有李文玉、高丰山、王成斌、于占河、李森、郝德禄等人。业务和人事直属县公司，与区上只是横的关系。党的生活由区委负责。此外一区还有一个组，常在棒槌沟一带活动。八区有一个组，常在跳石沟一带活动。

四区贸易组的任务主要是从山海关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军需物资。鉴于敌人严密封锁，我方工作人员直接入关不易，贸易组便通过多种渠道打通关系，建立内线。一是从解放区派人直接打入，二是从国统区物色可靠对象发展关系人。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间，贸易组联络的关系人最多到三、四十人。通过他们从国统区购进或换取大批五福牌白花旗大布，双钱牌胶鞋，金星笔、纸张等多种军需物资，为支援解放区的武装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贸易组派来四区后，县委副书记王炳田曾亲自找区委主要领导(区委主任维新、区长温华锋)，讲了贸易组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区里要给予大力支援和配合。故此贸易组常与

区干部、区小队及武工队一起活动，互相帮助，互相照应。当时经贸易组遴选，取得区委同意，曾派花户庄的曹成宪（贫农成份，当过伪甲长，关内有亲属开商号）进入山海关，乔装改扮挑水的由西水门进城。因城内查夜很严，不能存身，只住一宿即返回九门口里的新杨口，到他的表弟（姓杨）家。经联系他的表弟做了我们的关系人，多次帮助我方运物资。一次驮两驮子胶鞋，又一次运来两驮子大布。以后，贸易组直接在铁厂堡和牛家沟分别建立了贸易点关系户。

缺口打开了，但是单凭一两个人还远不能适应需要。为了扩大内线关系人，一九四七年秋从南部铁道沿线国统区抓些地主、乡绅到四区，给他们上课，教育他们认清形势，多为人民做事，以便取得人民的宽大。然后，将有名望有能力的人放回，交与任务，留下少数人做人质。这些放回去的人有十几个成了我们的关系人。其中有王瑞伍，费××，王×山等。他们回去与山海关城内一个姓曹的联系。姓曹的认识国民党军队师长，通过他可以巧妙地购买和换取我们所需要的物资，然后秘密运到解放区。后期又得到我地工部协助，关系人越来越多，他们曾先后背运物资来解放区，主要以暖泉子一带为接头点。在送物资来之前，先派人联系，后发信号，白天山头上立一木杆，上绑松枝。晚上点火为号，给信号方可进入我区。第一批在曹家房子接收，来八、九个人，背来二十多匹布（每匹大布十一丈）。大约有三十多人由贸易组同志带到北河老高家，交货过数，共八十多匹大布。他们中有些人因与贸易组同志接过头，见面很熟，不仅提名道姓，而且吃喝存栈毫不拘束。因早有准备，贸易组对这些人招待十分热情。这些人有的是山海关的警察，甚至还有分所

长，有的是地方保长。饭后即返回国统区。

关系人队伍不断扩大，物资源源运来解放区，仅一九四七年冬就运进大布三百多匹，还有双钱牌胶鞋，水银，金星笔、纸张等大批物资，从此打破了国民党封锁解放区的幻想。

由于贸易组的积极工作，敌人把它看作眼中钉。一九四七年秋和一九四八年春，曾两次分别出动一二百人在破山洞和西松岭子围捕贸易组，我贸易组均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转移。

一九四八年入夏不久，关科叛变投敌，将我关内关系人全部出卖给敌人，破坏了关系网。又兼高丰山，李春华二同志于西松岭子突围时负伤，离组休养，剩下李文玉等同志难于活动，不久调回县里工作。

驻四区贸易组由于关科的投敌给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在同志们的积极努力和多方大力支持下，仍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 本文撰写时曾得到高丰山提供情况

破山洞突围*

刘守鑫

一九四七年初，为了从国民党统治区获得军需物资，绥中县成立了贸易公司（后称贸易局），下设三个贸易组。一个组在一区棒槌沟，一个组在八区跳石沟，一个组在四区北河一带活动。派驻四区的贸易组由关科负责。工作人员有李文玉、高丰山、王成斌、于占河、李森、郝德禄等人。在四区区委和区小队的配合下，贸易组通过各种方式，在山海关建立内线，开展秘密活动，购进和换取大量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的武装斗争。

敌人对贸易组恨得要死，曾多次围捕，妄图一举消灭。

这年冬季的一天，贸易组所有同志分别在安马堡、涝豆洼一带活动。入夜，关科、高丰山宿在破山洞村西老王家。同住的还有土改工作团娄广俊、曹德宝、于××（小河口人）等三名同志。住下后，关科让高丰山写信通知在涝豆洼工作的李文玉、李森赶回破山洞。信写好后，封皮上标有“沿村转”字样，并插上鸡毛、火柴，表明火急勿误。信转至杨屯王景才（外号穷六）手中（这个交通员早已暗中变节投敌）。王接信后如获至宝，当即把信交给了山海关“还乡团”骑兵队长徐德贵。徐见信后，喜出望外，急忙纠集三十多人，连夜进击。恰巧，李文玉、李森二人虽未接到信，却也来到了破山

洞，与关科等会合住下。

后半夜两、三点钟，忽听村中狗叫，关科机警地说：不好，有情况。紧接着，大门外就有人喊：“贸易组同志在屋吗？我是安马堡村长谢景田，给送布来了。”原来这是敌人冒充谢景田以骗取开门。

关科派李文玉同志出去查看，并命令其他同志作好战斗准备。

李文玉到屋外问：“什么人？”外边回答说：“我是谢景田，给送布来了，出来呀。”李文玉一听声音不对，并见门外有人鬼祟地行动，知是敌人，连开两枪报警。关科听到枪声，判断已被围，即命令全体同志分头突围，到永安堡集合。这时敌人已将前后门堵住。我工作团姜广俊同志打开后门，猛地推开挡在后门上的秫秸，左右开弓，连开数枪，一个箭步冲出门外，迅速消失在夜幕中。未等敌人明白过来，高丰山又一跃冲出后门。敌人在黑暗中分守门两边，虽见冲出二人，也不敢打枪，怕伤自己人。当于××同志冲出后门时，才开枪，但他臀部负伤，也冲出了重围。与此同时，前院李文玉、曹德宝二人至大门口甩出两颗手榴弹，借爆炸时敌人慌乱之机，迅速冲出包围。敌人刚抬起头来，关科大摇大摆地从屋中走出来，高声对敌人说：“你们这些人真笨，还趴着不动，人家都从后头跑了，还不快起来去追。”敌人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关科说：“我是这家的人，在外边做买卖，前天才回来。”敌人见他穿长袍，大分头，高大身材，与买卖人相似，信以为真，忙蜂拥而去。关科趁机走脱。

这时屋内只剩下李森一个人未能走出。他见同志们已先

后冲出，敌人又已逼近，再突围来不及了，就躲到西屋。西屋有干草垛，他随手拽一捆干草立在北墙角，自己藏在后面。手中紧握手榴弹，心想，一旦被敌人发现，便同归于尽。敌人进屋后匆匆搜索，未发现有人。排长命令两个士兵翻干草垛。一个兵打手电，另一个往一边倒草，一捆一捆地把倒过的草立在北墙角。这一来，反倒把李森同志掩盖得更严了。草垛倒完了，一无所获。及至天微明，敌人忙碌半夜落一场空，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山海关。

先冲出包围的六名同志按约定到达永安堡。大家正为李森同志担忧。不一会儿，李森同志安全返回，出现在大家面前。同志们一见面，又惊又喜。李森叙完脱险的经过后，高丰山同志风趣地说：“你不该死，真是天不灭曹哇！”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

* 本文根据维新、高丰山二同志口述整理

旧县级政府组织沿革

丁树宣

在前清时代州县衙门，除知县师爷之外设有三班六房。三班是皂班、捕快班、壮班。皂班管站堂行刑，捕快班管缉捕盗贼，壮班是州县的武装力量。三班统称衙役。总头目叫三班老总，人称总爷。六房是按中央六部的编制，分吏房主管人事，户房主管财政税收，礼房主管教育，兵房主管军事，刑房主管司法，工房主管建筑交通等事。各房主管称经丞，办公人员称房先。

辛亥革命以后，在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为了装点民国体制，对前清州县衙门组织加以变革，取消州的名义，一律称县，废除三班六房的组织，知县改称县知事，后期又改称县长，有一个时期称监督，师爷改称秘书，直属设立两个科，第一科主管行政，第二科主管财政收支，后又增设总务实业两科。外设劝学所主管教育，后又改称教育公所，设巡警所主管地方治安，后改称警察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东北三省及热河，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帝国，县级政府在日本军阀主持下，又做了一次变革。

县长是中国人，另设日本人为参事官（以后改叫副县长），以下分设总务、财政、警务、实业、产业、经济、教

育、行政各科。总务科有文书、人事、庶务、出纳四股。财政科有财政、理产两股。警务科有警务、司法、保安、特务四股。实业科管理工商业。产业科管理农业、林业、渔业。经济科管理资源调查及开发。教育科有教育、礼教二股，外设县视学一人，视学员若干人。行政科后改为民生科，将教育科撤销并入民生科为教育股。外围组织有金融合作社办理贷款，兴农合作社负责农业技术指导及征粮等事。国税有税捐局，不归县里，归省税务监督署管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战败轴心国的德、意、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侵略军撤离中国，蒋介石的军队抢先接收，他们对县级组织又做了一次变革。

县长多半是由接收军方委派，由省呈报中央内政部登记了事。县级组织设立五科三室。五科是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军事（原设有总务、地政二科，不久即撤销），三室是秘书、会计、军法。秘书室设主任秘书一人，秘书二人，管核稿及特交文件草拟，设四股分管文书、人事、庶务、出纳。会计室设二股管预算决算。军法室管审讯共产党嫌疑、惩治国民党逃兵，下设看守所。民政科设三股分管乡保行政、户籍卫生、合作事业。财政科设二股分管财务、税收。建设科设二股，管建设、交通、测绘、防汛。教育科设二股主管学校、社教，外设视学一人，管查学审核考绩。军事科设二股管兵役、保安。外围组织有兵役协会，辅助征兵事宜。外设警察局，分总务、行政、司法三科。保安大队是县的武装组织，大队长由县长兼，副大队长负责训练、城防、治安等，还有田粮管理处管田粮。税务稽征处掌管省税县税，业务归省管，税收因有县税，受县长监督。国税另有税务查征所，不

属于县管辖之内。另设有军民合作站，负责供应军需，如车辆人伕等。

以上所述，自戊戌政变以来，县级政府因政权更迭共有三次变革。清末民国的县政权组织是根据我屯卢殿文生前所谈的，他在这两个时期，在县里当过房先和科员，伪满时期我当过教员，东北光复后，国民党接收绥中，自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我在县政府当过秘书，亲历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经过回忆写出来。但仍难免有遗漏之处，略备一格，仅供参考。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国民党军对宝庄乡的掠夺罪行*

白东海

我是在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接收绥中以后担任宝庄乡乡长的，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去职。在这一阶段时间里，绥中县军民合作站在宝庄乡为国民党反动军队筹集军需物资，借机巧取民财，敲诈勒索和强迫老百姓修筑城防等罪恶行径罄竹难书，在此略述梗概，供参阅。但因事隔多年，有回忆不清之处，有待知情者给予补正。

历任军民合作站的官老爷们绝大多数都依仗反动势力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损公肥己，无恶不作。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是张汉宗了。自从他担任副站长以来，专横跋扈，贪得无厌。摊派物资，口出口入，全无凭据。对宝庄乡送交的物资，吹毛求疵，故意挑剔。说送交的肥猪膘瘦不合格，让拉回去。为了这件事到军民合作站去评理，军民合作站把评理的人送到警察局关押一天。

一九四六年春，正在农忙季节，摊派的大车本乡如数送到。但军队不敷应用，要求再增加几辆，军民合作站不但不为百姓说话，反而暗示国民党军队可以自己去找。

这样一来大伙可就遭殃了。军队深夜在大钟鼓一带抓走大车十二辆，搞得鸡飞狗跳墙。由于人畜车辆被抓走，人们种不上地，耽误了农时。

一九四六年十月份，国民党骑兵营借口海防训练，在宝庄乡小李、白龙、四方、团山子等地住有二十多天。人吃马喂全由本乡负担，而张汉宗若无其事，应要物资还是照样摊派。经人去该站据理交涉，张汉宗却蛮不讲理。军民合作站对宝庄乡的残酷掠夺数不胜数。

张汉宗每逢年节都亲自向各乡索取财物给上层机关人物敬厚礼。我记得，一九四七年的春节向宝庄乡索要大(粳)米二吨，肥猪十口，公鸡一百二十只，粉条一百斤，苹果五百斤，凡是过年应用的东西样样要到。同时还给县长刘杰的随从护兵要押岁钱四万元，他用这些金钱物资来讨好那些官老爷们，我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一九四六年十月份，县警察局谢督察长结婚，婚礼由张汉宗经手操办。他向宝庄乡要去肥猪四头，海鱼一百斤，劈柴若干。他是拿野猪还愿，用我们的钱，向督察长献媚，为他个人讨好。

修筑城防工事是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开始的，前期小型修补，后期正式开始修筑，直到我乡长卸任为止。在这一年零五个月的时期中，光宝庄乡的修筑城防费用，总计消耗东北流通券二千八百万元。

宝庄乡分担的修筑段落，从南门口往东到三皇庙，大约长一华里。城上炮楼四座，城下大小碉堡七个，还挖战壕和交通沟多处。所用的工料款项均由本乡承担。搞得老百姓走投无路，痛苦不堪。特别使人不能容忍的是，官兵卖料，没人过问。把已送去的砖一次卖给东门外梁敬之家八千块，木料卖给城里东二道胡同马家。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国民党军队备战心切，掠夺更急，所需砖、石、木料、水

泥、钉子没有了，就派兵下乡拆墙扒院，搜查材料。他们也混水摸鱼，趁机搜刮民财。扒去了大钟鼓屯刘善堂的院墙，砍去永安寨关树林的树木一百余棵，一转手卖给南园子李家。

全国解放后，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老百姓才真正过上了安居乐业有吃有穿的美好生活。

一九八四年八月四日

• 宝庄乡是国民党政府设置的，包括今小庄子乡和塔山乡一部分村屯。

苏联红军小分队在绥中

常文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迎来了祖国光复的伟大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我县来了苏联红军小分队，历时两个月，到十月二十八日撤出。

苏军小分队进绥中

苏军小分队由一个上校部队长尼古拉和少校营长伊万诺夫带领，约一百余人，经林西、赤峰、叶柏寿、凌源、建昌等地来到了绥中县城。

当时因我军尚未到达绥中，由原绥中伪满县长姜英藩，大汉奸张凤阁以“治安维持会”的名义率伪职员及市民数百人在西门里夹道欢迎苏军。

苏军到县当晚，即接收了邮电局，切断通讯联络（取下设备上的真空管），收缴日军武器，把日本男人拘禁在伪县公署院内（后转到上帝庙及西郊苗圃等地）。

就在苏军来绥中的同日，我冀热辽十六军分区先遣小分队（十二团五连）在副参谋长罗文带领下，来到绥中，进城

后即与苏军取得联系，并联合接收了绥中火车站。这天晚上罗文派人给我进驻前所的部队曾克林司令员，唐凯副政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绥中的苏军拟于三十日清晨派出小分队西下，与我军在前所会师。”

前所会师 解放山海关

山海关是伪满洲国的国境，南倚渤海，北靠群山，地势十分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伪满时，日本政府为加强其统治，曾将山海关东罗城划归绥中县管辖，除日军驻有重兵外，伪满海关、国境警察署等都设在这里。这次我军为了迅速挺进东北，曾绕道九门口，回师山海关。

八月二十九日冀热辽军区奉延安总部命令，派曾克林、唐凯率领了十六军分区部队十二团、十八团出长城要隘九门口来到前所。当时前所车站驻有伪军四百多人，因慑于我军威力，打出了白旗，向我投降。

是日当晚接到副参谋长罗文从绥中的来信，为迎接苏军作好了准备。

三十日早饭后，驻前所我军曾、唐二位首长命令部队整队集合，在前所东公路上，排成四列纵队，迎接苏联红军。约九时许，远处传来军车马达声，苏军小分队从绥中方向开来。有五辆军车，三辆吉普车，共七十余人。苏军战士每人携带转盘枪一支，军车上配有两挺重机，另外，还有一门三七炮，一门五七炮，一门机关炮。

我军临时抽调一些司号员组成“军乐队”吹起了欢迎号。这时曾、唐二位首长和苏军相互握手，气氛很热烈。顿

时“斯大林万岁”、“毛泽东万岁”、“乌拉！”的欢呼声回荡碧空，响彻原野。

我军打下前所后，原定任务是迅速向锦州、沈阳进发，但为了给后续部队扫除障碍，决定回师先打下山海关，然后再继续东进。曾、唐首长对苏军说：“我们是受朱总司令命令到东北来的，任务是收缴敌伪武器，收复东北失地，接管东北政权。目前山海关还有日军战斗部队约一千人，日本文职人员和家属两千人，伪军、伪警、伪宪、伪政府人员约七千人，加起来共万余人，没有缴械投降，希望苏军和我们一起攻打山海关。”

苏军由于受《雅尔塔协定》^①的限制，迟迟不作答复，经过我方再三请求，才答应了我军的要求，经双方研究作战计划，最后决定由我军担任主攻，苏军配合。

战士们听到要打山海关，人人磨拳擦掌，斗志昂扬。苏军一部留在前所，有五十余人全副武装，携带大炮由上校部队长尼古拉带领乘坐汽车随同我军向山海关进发。曾、唐二首长带一个警卫排和机关参谋人员乘车先走，部队急行军向山海关前进。

在部队出发之前，曾、唐二首长和苏军协商，事先派分区侦察参谋董占林与苏军一名上尉连长两名战士，乘吉普车，与日军谈判向我投降。当他们到达山海关南门时，只见城门紧闭，一小时后日军大佐借口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下村定大将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武器要缴归国民党军队。同时又以山海关不归满洲国管辖为理由，拒绝向我军投降。苏军连长立即写了一封信，由董占林和苏军两名战士坐吉普车将信送给曾、唐二位首长，随后我军便跑步向山海关前进。

下午五点左右，部队开到山海关东山坡，各部队按照指定位置从东、南、北三面把山海关包围起来，并制作软梯作攻城准备。曾、唐二首长和苏军上校及十二团、十八团指挥员亲自侦察地形，布置兵力，选择攻城出击路线，从望远镜观察到山海关四门紧闭，城墙周围遍布堡垒和防御工事，城墙垛口趴满了敌人士兵，日军荷枪来回巡逻。曾、唐二位首长让警卫员拿出军用地图和苏军上校一起制定了攻城方案，接着分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了攻打山海关的战斗任务。但为了保护这个历史名城，悠久的古迹，分区领导决定：“尽量敦促敌人投降，实不得已再用武力。”我军和苏军再次协商，第二次派出代表向山海关日军送去了最后通知，命令日伪军立即投降。但日伪军仍然顽固不化，拒绝投降。于是曾、唐二位首长在三十日黄昏前果断地向部队下达了总攻命令。

十八团以“天下第一关”为主攻目标，十二团以火车站、桥梁厂为主攻目标，两面夹攻，苏军用火炮紧密配合。苏军首先向日军开炮，接着十八团集中轻重机枪封锁天下第一关制高点 and 长城垛口，打得城上砖石四处飞迸，城内城外火光冲天，我军战士冒着硝烟弹雨登上软梯，爬上城墙，把手榴弹投向敌群，炸得敌人血肉横飞，狂呼乱叫，敌军在一片混乱中纷纷下城逃跑。十八团胜利地占领了天下第一关，把红旗插上了城楼。不料苏军又误打一炮，使我攻城部队受一些损失。这时周家美、吴宗鹏、马骥带领的团指挥所也移到这个俯瞰全城的制高点，继续指挥我军直插市中心，追击敌人。这时我后续部队炸开了城门，我军和苏军一拥而入，对敌人穷追猛打。

回头再说十二团的战士在团长杨树元、政治处主任刘光涛带领下，兵分三路，沿着铁路向火车站、桥梁厂、山海关南门挺进，在苏军炮火掩护下，拿下桥梁厂，攻陷火车站，直插入城区。此时部分日军狼狈向秦皇岛溃逃，驻守在火车站的伪军缴枪投降。日伪县政府、海关、邮电、银行、监狱等要害部门完全被我军占领，伪警察，伪宪兵也被我军缴械，军火库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等悉数被我缴获。铁路、车站、机车、车辆、城楼等也完好地保存下来，晚上九点钟战斗胜利结束。

十二团、十八团会师后，计收缴长短枪三千余支，掷弹筒和迫击炮五十多门，轻重机枪五十多挺，各种子弹几百万发，还有大批军用物资。这次战斗除部分日军逃跑外，共击毙、生俘日军二百余人，打死打伤伪军五十余人，生俘伪军伪警察、伪政府人员几千名。其中有临榆县长陈维廉，奉山铁路警护队警护官董扒皮。延安《解放日报》于九月六日在第一版上用大字标题报道：“华北军事要冲山海关及沦陷十二年之久的榆关镇已于八月三十日为我军光复。”

山海关被攻克后，人民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载歌载舞，欢庆翻身解放。

我地方政府接收绥中

苏军除去前所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在绥中三完小，八月三十日，我军为苏军举行了欢迎会。

三十一日，信修、王杰、潘凯、李育民、郭海楼等县区领导同志及区小队一百余人到达绥中，代表共产党地方政府

进城接收。

九月三日，十二团副团长马骥由山海关乘火车来到绥中，从苏军手中接收了伪满国兵十七团的武器，组建我四十八团。

九月五日，张世毅、华玉民到绥中，信修调往锦州，华玉民接任县长职务。

九月十日，组建县政府的同时成立了绥中卫戍司令部，由马骥任司令员，在组建大会上，专员张世毅、县长华玉民、卫戍司令员马骥分别讲了话。

当时我军和苏军的关系尚好，苏军与我县党政关系也可以。在收缴日伪武装、接收敌伪资财、摧毁敌伪政权、组建我地方政权机构等方面互相协商，互相配合。但因苏军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强运物资以及军纪废弛等，我方也有意见，不过没达到公开化的程度。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一日

注 释

- ①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并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苏军对日作战的地区在中国境内只限东北四省。——编者注

克服困难，就是胜利

——记随军赴朝的绥中担架队

维 新

一九五〇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半岛为跳板，闯过鸭绿江，扼杀新中国。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伟大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祖国的英雄儿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和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搏斗。辽西省是接近前线的后方，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参加支前。省委根据实际需要，组成了辽西随军担架大队。

建 制

辽西随军担架大队包括绥中、兴城和锦西三个县的民工。大队部编制：大队长由兴城县副县长盖恩惠担任，政委由绥中县委宣传部长维新担任，组织干事李贵、宣传干事李铭江、文书李仲昆、管理员赵国喜、翻译、马夫、炊事员、通讯员等十三人。组成后集中在沙后所训练三个星期，准备出国。

担架大队在临江休息三天，把彰武县三个中队也编在一

起，命名为“辽西随军担架第五支队”。彰武原负责人刘启周任参谋长。全支队由九个中队组成，中队编制基本上是三三制，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小队，每个小队又分三个班，每个班五付担架，每付担架五个人。每个班有正、副班长，每个小队有小队长和指导员各一人，伙夫三人。每个中队有中队长教导员各一人，有管理员、文书、通讯员、翻译、医生、炊事员等八人。合计是一个班二十七人，一个小队八十六人。一个中队二百六十六人，九个中队共约二千四百人。

绥中两个中队，队员主要来自万家、前所、前卫三个区。第一中队长是李绍奎，教导员孙长增。第二中队长柴连枝，教导员朱长和。

出 国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担架队出国了。刚一出国，困难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首先是宿营没住处，加之语言不通，道路不熟，连找人打听个路途都要费很大劲。三天以后困难就更大了。上边敌机威胁，下边人心动摇，再加上天不作美，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七、八度，困难压得人出不了气。在这种情况下，暴露出我们队伍的弱点，思想工作不够，带队的领导同志没有经验，担架队成分复杂，甚至钻进了个别坏人，结果是，原来有爱国思想支持着来支前的热情巩固不住了，支队一度发生动摇，出现了逃跑的现象。

在暴风雨般袭来的困难面前，我们三个县的领导聚在一起开了个紧急会议。这时候，担架队员中悲观动摇的情绪也反映到领导人的身上，经过一番争论，统一了看法，一致认

为，只要领导不乱，有牺牲精神，敢于带头吃大苦耐大劳，队伍是能够带上去的。最后做出决定，为便于行军，各县分开带队，不论哪个县，万一队伍散了，可收容到一起统一带上去。决定后队伍分开行动了，我带着绥中担架队为前站，锦西由刘参谋长负责为后路。不料，这样走了三天，各县便完全失掉了联系。

整 顿

绥中担架队共四百多人继续前进，一边行军一边进行思想教育，经过政治鼓动，情绪有些好转，但是队员们的思想仍不稳定。原来有个别人不断在队伍中散布谣言，进行煽动，说什么：“咱们这些人不被打死也被吓死，不吓死也得饿死，不饿死也得冻死。”“别县的人都回家了，只有绥中担架队是亡命之徒”等等。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教育和鼓舞广大队员，处理了个别人，唤醒了少数糊涂人。于是，邪气压下去了，扭转了队伍情绪，而且越来越好。困难一个接一个地袭来，又一个接一个地被克服掉。

连日行军，有的同志有病，有的脚冻坏了，要掉队，怎么办？由支队到中队每个干部都背了几个背包，二中队队长老柴同志胃病犯了，手捂着心口走路，可是肩上仍背有五、六个背包。我这个政委把马让给重病号。自己在前面牵着缰绳当马童。全队上下同甘共苦，互相鼓舞，互相帮助，掉队的人数大大减少了。

时值严冬，雪下得很大，宿营常常成问题，往往是走了一宿，几百人只好住在三、五间房子里。挤不下，就排队进

屋，喊口令坐下。这样睡再搁不下，那就只好坐在雪地里打盹了。有一次我刚要入睡，听见外面有人吵吵，原来有个同志找了个窍门，把扁担绑在两棵树上，坐在扁担上睡，另一个同志看了很羡慕，就也坐了上去，一下子扁担压折，因为这事吵了起来。

防空是个严重的问题，最初，人们听到警报往老乡和先遣部队挖的防空洞里跑，后来就谁也不去了。因为天太冷，手脚露在外面半个钟头就可能冻黑。人们因此都呆在屋里消极防空。宁可牺牲也不乱营。实际上这样做，即使有损失也比在外面冻坏的要少。

自从与兴城、锦西、彰武的担架队分开后，经过后昌（最大的山岭），三不里，到下阶隅里住了三天，一来是同志们连日行军太辛苦了，特别是给养丢的丢，损失的损失，有两天没吃上饱饭，体质明显下降。二来是我骑的马是红色的，在大雪覆盖的地面太显眼，易被敌机发现，所以决定枪毙红马，让同志们饱餐一顿。

到长津

经过一段艰苦的行军，终于到了长津，这是出国以来的第十八天。当时还没联系上部队，给养没有了。为了与二十六军后勤部取得联系并领给养，我只好带三个人去找部队。三天没找到也就饿了三天，我们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这天下午，遇见一支队伍在开饭。我们走上前去也想吃点，一个同志问我们是哪个部分的，这样不讲纪律。尽管这样，这位同志把碗中的半碗饭递给炕上躺着的受伤的朝鲜老乡，接着又

把第二个半碗饭递给我们，我们四个人分着吃了，感到比饱餐一顿还香，还解饿。

部队找到了，后勤部葛政委非常热情地听汇报，问我们有什么困难。通讯员咀快，在旁边说：“三天没吃饭了。”首长说：“运送给养暂时还有困难，要千方百计度过难关。今天吃苦是有国际主义意义的。”他的话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我们回到支队，心想队员们不知饿得怎样了。谁知没等我们进屋坐稳，同志们给我们端上来半盆粥饭，这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公路上运大米的汽车撒的大米，同志们在敌机严密封锁下，冒着生命危险捡来的，解决了一些缺粮的困难。

到长津湖后，我们听到前方战士勇敢杀敌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都深受教育，有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坦克上，有的和美国佬抱在一起同归于尽，有的穿插敌人后方七天六宿喝不上一口水，不少同志牺牲在雪挖的隐蔽掩体里，人和雪冻在一块了。大家听到这些，都说前方志愿军同志吃那么多苦，我们这么点苦真是不值得一提。

奔 赴 三 八 线

担架队经过一段教育和整顿，继续前进，随同二十六军奔赴三八线。急行军，每天都要走一百二、三十里路，每到一处住下还要注意防空。为了做到不透光亮，要做许多繁杂的工作，同志们非常疲劳。有的同志在行进中睡着了。尤其是脚起了大泡的人，人家休息了他还在走。人家出发了他刚到。一中队教导员孙长增同志简直不是在走，而是拄着拐棍向前爬。叫他留下来，他还不肯。他说：“只要有口气在，我

就要跟上队伍。”最后把需要疗养的七名病号交给他护理，才勉强留下。两个月后他又带领同志们归队了。

这个时期（从二十六军接防，在第四次战役激战三十七昼夜到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我们没有制空权，敌机封锁公路，沿途被打坏的汽车到处可见，给养运不上来，部队一时少粮，缺油又没盐，有时连炒面也发生紧张，我们连续有三个月没吃到一点油，十八天尽吃淡饭，吃饭成了硬任务，不吃饭要挨批评。这时队员普遍营养不良，主要现象就是闹夜盲眼，两个中队几百人只剩下几个人眼力较好。一旦出发夜行军，就由这几个人轮流在前面领路，后面的一个拉着一个后衣襟，紧紧跟上。有一次，部队转移分几路走，中间有人打了瞌睡，错拉了另一路部队战士的衣襟，走出三十多里路才发觉，忙着往回走，到处打听找自己的队伍。

时间长了穿衣也成了问题，开春时大家把棉花掏出来穿夹衣，夏天又由夹变单，有的还把单裤改成裤头。为了夜间执行任务有衣服穿，白天在山林中隐蔽休息，多数人是不穿衣服的（当时没有女同志）。一次我去二中队开会，大家一丝不挂地集合到一起，看着我都哈哈大笑。原来大家不穿衣服习以为常，谁也不觉得奇怪，而我穿的裤子，屁股补了一块从枪毙了的红马马搭子上扯下来的大红布，成了笑料。给养补不上，队伍吃不上饭，只是那一小段时间较为紧张，穿不上也仅仅夏秋间一个时期。后来汽车很快把祖国人民支援前方的大米、白面和罐头源源不断运来，在一般情况下，供应是比较充足的。

炊事员立功

军首长十分关怀指战员的体质状况，要求各部队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有的炊事员想不通，认为给他们出了难题。但是经过教育，逐渐转过弯来了。有大米就能磨面，有面就能花样翻新。没有菜，挖野菜就可以有好多样吃法。后来有了黄豆，就更好办了，没有卤水点豆腐，就上山采小红酸丁来点，豆腐浆留下作卤水再点，这样做的豆腐越吃越嫩，仿佛是石膏点的豆腐脑。有的部队还到我们这里来学经验，炊事员大老刘荣立了二等功。

困难是不少，但是一个一个地都被克服了，没饭碗，没油灯就用老美留下的罐头盒做，没住处，自己挖山洞，挖地窖子。没有一个人去向上级叫苦。大家以苦为荣，苦中有乐，因为每个人都有个信念：为“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流血流汗是最光荣的；赶走大老美，打了胜仗是最大的愉快。

评 功

绥中担架队在朝鲜战场上，担负着第二线任务，做了许多工作。最初在战斗间隙中打扫战场，执行掩埋任务，以后大部份分配到二十六军后勤部的四个医疗所，做护理和转运服务等工作；还有的在供给处担当运输工作。整个出国期间，两次为支前人员评功，我绥中担架队成员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立了功，其中立一、二等功的有二、三十名。第二

中队二小队立了集体二等功。小队长王景祥带这个小队随供给处执行任务时，有个公路桥被炸毁了，上百辆汽车挤在不大的河岸边，既着急过不去河，又担心空袭。修桥吧，要器材没器材，要人没人，怎么办？这时王景祥接受了在一小时内修复的紧急任务。他立即带领十七名战士放树，挖沙土填道，只四十分钟，桥修复了。汽车司机开车过时，纷纷对这些民工竖起大拇指。

又有一次，运输任务很紧，往前方运弹药的汽车，有的缺油开不了车，供应站汽油又没有了。王景祥接受了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把前几天敌机空袭时我军车掉在河里的汽油桶捞出来。这时正是旧历年前的严寒时节。二小队队员们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奋不顾身地勇往直前，终于从寒冷刺骨的冰下水中捞出了两桶汽油。解决了缺油的困难。

回 国

组织上决定让我们这支队伍回国，这是在出国一年零一个月以后。听说要回国，好多同志写申请，还有的写血书，坚决要求留下来，继续配合部队打美帝。经领导再三说服动员才不再申请。首长送别时说：“你们辽西第五支队绥中担架队已经胜利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你们为革命吃了苦，祖国人民给你们记下了功劳。希望你们回去要继续保持和发扬抗美援朝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好作风，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临回国，部队后勤部给担架队发了入朝以来应有的菜金和成套的军装。人人穿的棉衣是新的，背包里装的是新

衣，在部队代表陪同下，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凯旋归来。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九日

勘 误

第23页倒2行:

区长应为区小队长

第57页14行:

曹成海应为曹成满

